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　第二十號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 第二十號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行

善後救濟總署之性質與任務

蔣廷黻

人力可以勝自然

在中外各國的歷史上，戰爭不幸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以往每次仗打完了就完了，並不想法去辦理有計劃的，有系統的救濟與善後。其結果戰後餓死的、凍死的，因瘟疫流行而死的往往反比戰場傷亡的人數還要多。以往各國政府總是聽其自然。

自然有自然的辦法，那是極浪費的、極殘暴的辦法。不但戰後饑寒瘟疫有其犧牲品。即不死於饑寒瘟疫者亦多爲貧窮所困。經過一代兩代以後，社會才恢復元氣，人民始感覺天下又太平了。

譬如：在十七世紀的前半，歐洲有所謂三十年戰爭，受害最深的是德國。經過那役以後，有五十多年，德國在歐洲的歷史上，簡直沒有地位，到十八世紀，德國始再抬頭。

與三十年戰爭差不多同時，中國有明末淸初的大戰亂。數年以前，中央研究院發表了許多明淸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四川某縣的人口報告。那縣的知縣說他的治下在年初原祗有九百七十餘人，而在一年之內野獸又吃了三百多人。這是康熙十七八年的報告，離順治元年已經三十多年了，而地方荒涼悽慘的狀況仍舊如此。

這一次，四十四個聯合國家，鑒於自然的浪費和殘忍，毅然決然設立聯合救濟善後總署，以求利用聯合國的人力物力及近代文化的科學和工程學，辦理有系統的、有計劃的救濟，藉使自然的程序縮短，自然的犧牲減少。

這一次，國民政府蔣主席早下決心要使淪陷區各鄉村各城鎮備受痛苦的同胞能提前回到家鄉恢復舊業，所以特令在行政院設立善後救濟總署，專門辦理淪陷區收復後，急振防疫及交通工礦農業水利漁業的復原。如果我們同心協力的去幹，人力一定可以勝自然。

聯總準備幫助各國人民去幫助自己

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簡稱 UNRRA 聯總)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成立的。

那年十一月九日，四十四國的代表齊集於美國總統府簽訂聯合國救濟善後公約。代表美國簽字的就是已故總統羅斯福。條約由國家元首親自簽訂的實不多見。羅故總統此舉在表示他對世界戰後救濟的極端關心。

公約簽訂以後，代表們就到大西洋城去開第一次國際救濟大會，而大會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成立聯總。

聯總的規模相當宏大，其機構也相當複雜。

最高的權威是代表大會，每個會員國派遣代表一人，每半年開會一次。預算、政策、機構概由大會決定，執行部向大會負責。

大會不開會的時候，緊急案件由中央委員會處理。這個委員會是中、美、英、蘇四強的代表組成的。

管理地方實施政策者有遠東及歐洲兩個區域委員會。參加遠東區域委員會的共有九國，即中國、美國、英國、法國、澳洲、新西蘭、印度、菲律賓及荷蘭，其主席是中國的代表。

此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委員會，與政策有關係：一個是物資委員會，以加拿大代表爲主席，一個是財務委員會，以美國代表爲主席。

除了管理政策的委員會以外，聯總還有五個技術委員會：(一)衛生，(二)農業，(三)工業，(四)福利及(五)難民。遠東區域委員之下也設有同類的五個小組委員會，其中衛生委員會以我國衛生署前任署長劉瑞恆先生為主席。農業委員會以我國中央農業試驗所所長謝家聲先生為主席。

這是聯總的立法和技術部門。

聯總的執行長官是署長李曼(Lehman)。他的總辦公廳設在華盛頓，李曼先生以前作過八年的紐約省主席，富有行政經驗，而他的政治思想又很與羅故總統接近。他現在脫離政治，一心一意的領導聯總為戰後的痛苦民衆謀福利。輔佐李曼先生處理聯總公事的有八位副署長，其中之一是我國財政部常務次長郭秉文先生。

總辦公廳分司分科，單位頗多，人約在九百左右。李曼先生想把聯總作為一個國際服務機關，各級人員，一進聯總，就不得再帶國家偏見去處理公事。

聯總得在各會員國設立辦事處。在中國的辦事處處長是凱石先生(Benjamin H. Kizer)。他在美國熱心提倡區域的經濟發展，有計劃的為全體人民謀利益的發展。以先他雖沒有到過中國，但是因為他是個通人而態度又正大，他在短期之內已經認識我們的問題和困難。他對我們的善後救濟事業的熱心不在任何人之下。辦事處的同事都是和他志同道合的。

聯總的機構大體如以上所述，他的事業怎樣呢？

事業必須要有經費。第一次大會通過議決案，請未被侵略的會員國各捐其一年的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一作為聯總的事業經費。照此標準，聯總的事業經費可到美金十八億至二十億。現在已經聲明願意捐助的有美國、英國、加拿大、巴西、印度、澳洲和新西蘭。

這些國家雖未被侵略，牠們都是參戰的國家，而且犧牲都是很大的。就是在富庶的國家如英美，國內賦稅之重，發行公債之多，及戰後財政經濟的困難，簡直出人意料之外。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願意慷慨捐助，這是被侵略國的人民應該感激的。

十八億至二十億美金本來是很大的數字，但是戰後世界的需要絕非這個數字所能應付的。所以第一次大會不能不通過各種議決案確定聯總的工作範圍。

救濟的範圍比較具體，而且比較容易規定。簡單的說：戰後在聯合國內不可發生飢荒或瘟疫，因兵災而流離者應設法幫助回歸故鄉，老弱殘廢無法自養者應設所收容。

至於善後，伸縮性較大，範圍不容易確定。大會有關的議決案可分幾項。第一、教育文化事業不在聯總範圍之內。第二、聯總不能幫助會員國建設新事業，祇能幫助恢復戰前原有的事業，而且必須是生產必需品者。第三、會員國如自有黃金或外匯充足，應該全部的或局部的自備善後經費，以減輕聯總的負擔。根據這項議決案，歐西的國家，如法國、荷蘭、比利時，已經聲明不要聯總的援助。

這種有計劃的、國際合作的救濟是歷史上空前的創舉，其成敗不但有關目前痛苦民衆的幸福，而且有關戰後世界的繁榮及聯合國相互的了解和合作。

行政院計劃我國的善後救濟

在第一次大會開會以前的一年，歐西的國家共同在倫敦設立善後救濟調查設計委員會，並公推英國財政專家李滋羅斯爵士為主任。該會的工作於大會前完成，其報告書就在大會期間提出。我當時深佩友邦處理善後救濟問題的方法，於是建議在行政院內設立同樣的調查設計委員會，並建議請聯總派遣三位專家來協助我們設計。

行政院調查設計委員會於三十三年三月開始工作，國際專家亦於四月初到達。政府雖然派我為主任委員，實際我在美國，不能分身，除以電信貢獻意見外，並未參加工作。主持會務的是中國農民銀行總經理顧季高先生。有關部會如糧食部、交通部、經濟部、財政部（花紗布管制局）、社會部、內政部（關於房屋營造部份）、農林

部、衛生署、水利委員會、振濟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均派高級得力人員參加，分九組調查設計。因我方人員工作努力而且竭誠合作，聯總三位專家亦均興奮從事。他們回國以後，發表不少極有利於我的言論。後來蔣季高先生赴美參加聯合國財政金融會議，會務改由行政院張秘書長主持，報告遂在他的領導之下完成。

報告內容分九門：(一)糧食，(二)衣料，(三)交通，(四)工鑛，(五)農林，(六)水利，(七)衛生，(八)社會福利，(九)難民。政府把這九種專門報告送到華府，要我就近約集我國在美專門人員重加檢討調整。我當時閱讀報告以後，對委員會顧慮的週到及其所用統計數字的完備，不勝佩服之至。不過我把經費數字統計以後，發現行政院善後救濟調查設計委員會估計我們的善後救濟共須美金二十五億及具有戰前購買力的法幣二十七億。初看，這種數字是很大的，其實也是很大的，等於戰前中央政府預算的十倍！但是想及我們抗戰之久，陷區之廣，難民之多，許多都市破壞程度之高，我又覺得這個數字還不夠。無論如何，聯總經費總數既然祇有二十億美金，我們不能希望牠給予我們二十五億美金和二十七億法幣的援助。

得着政府具體的訓示以後，我們在華府負責調整計劃的人決定大體上維持行政院調查設計委員會的計劃和預算，不過聲明希望聯總協助九億四千五百萬美金，其他部份由中國政府及人民自籌。

根據政府的訓示，我們首重交通事業的善後。在九億餘協助經費之內，交通佔三億三千萬。在抗戰時期，我們備受交通困難之苦。如不提前恢復運輸和電信，縱使聯總將來送我們許多糧食，衣料，藥品和其他物資，這些好東西勢必都堆集在上海、青島、天津、大連、福州、廈門、廣州各海口，於內地飢寒交迫的老百姓並無好處。若從長期的經濟建設着想，交通也應該有最高的優先權。

糧食和衣料各佔一億五千萬。世界糧食產量充足，如運輸不發生困難，供給應該沒有問題。衣料則各國均感缺乏，將來可能發生問題。

工鑛器材佔一億一千萬。

農業佔七千七百萬，其中人造肥料和改良種籽是主要項目。

衛生佔六千六百萬。假使這個計劃可以實現，國內醫院的病床可加一倍。

其他各項約佔六千萬。

此外還有漁業計劃及鄉村工業計劃，因須修改之處甚多，聲明保留。

我國的善後救濟計劃，經調整後，於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送達聯總。各會員國的政府亦由聯總分送。同時計劃書在美國公佈。

公佈以後，美國的輿論十分注意。當時各方的感想，兩句話可以包括：(一)數字何其大耶！(二)參酌中國抗戰之久和戰區之大，數字却在情理之中。

政府設立執行機構

計劃書送達總署以後，我就回國述職。

計劃雖好，如執行不順利，將來仍不能收很大的效果。倘若執行者有絲毫浪費，外將對不起捐助物資的友邦，內將對不起備受艱難困苦的同胞。在歸國途中，這個執行方式和機構的問題遂成爲我所焦慮的問題。「假使院長問起來，我應該怎樣答覆呢？」

我進一步的問我自己：「究竟這個執行善後救濟的機構應該具備那幾種條件呢？」

第一、我覺得這個機構應該辦事迅速。聯總在各國協助的時期至多不過兩年。倘若我們應該作的事不能於兩年之內作完，我們就不能取得聯總的協助了。這是物資上的損失。此外還有精神上的損失。有一次一個外國朋友對我說：「我們以秒分計時，你們中國人仍舊以日月計時。我們的行政雖然沒有達到飛機的速度，却作到汽車的速度。你們的至多是洋車的速度。」這一段話很使我慚愧，因爲我雖然能夠解釋，但不能否認。爲避免物資上及精神上的損失，我覺得這個執行

善後救濟的機構務必辦事迅速。

第二、這個機構與行政院所屬的其他各部會署應該竭誠的分工合作，不可起磨擦，尤不可起衝突。我在行政院政務處服務前後八年，深知機關長官難免好爭職掌。在美國的時候，發現美國機關長官亦復如此。美國的這種現像雖然給了我不少的安慰，使我覺得不分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仍覺得這種糾紛是無聊的，誤事的，應該避免的。

善後的部門比較容易劃分。交通屬交通部，工礦屬經濟部，農業屬農林部，衛生屬衛生署，江河堤防的修理屬水利委員會。這些都是無問題的。至於救濟，問題就複雜了。中央有振濟委員會和社會部。照組織法，振委會掌管天災兵災一類的緊急救濟，社會部則職司通常社會福利事業。事實上，以往兩個機關常感職掌不能分清之苦。根據經驗，我知道機關與機關之間，分工不易，合作尤難。這一次事業尤其複雜，因爲我們一面必須在國內辦救濟，一面又須在國外應付聯總及其所屬的大會，委員會和辦公廳。等到工作開始的時候，還須聯絡各地方的國軍及沿海登陸的盟軍。從這方面着想，收復區救濟的事業宜合不宜分。

第三、這個機構的公務人員必須廉潔。倘若不幸發生舞弊的案情，不但物資的損失可惜，政府在國際上名譽的損失尤爲可惜。我常想世界上的人可分爲三類：第一類不分有錢無錢絕對不舞弊，第二類不分有錢無錢遇有機會就舞弊，第三類本心願奉公守法，但到飢寒交迫不得已的時候，也就舞起弊來了。行政長官應該特別注意的是第三類，必須設法使其有以養廉。

此外，根據中外的經驗，救濟事業應該謹守兩個原則。第一、救濟物資和救濟款項不可輾轉於各機關之間，因爲多轉一次就多一層舞弊的可能。救濟的手續應該簡單和直接。東西一到老百姓手裏，舞弊的可能自然消滅了。所以東西愈早愈快到老百姓手裏就愈好。第二、救濟事業應該絕對公開。

迅速而又廉潔，善後應該分工合作，救濟應該統一辦理——這是我在歸國途中所想到的執行標準和辦法。

到了重慶以後，聽到朋友們的建議甚多。一派以爲最好由行政院蔣兼院長親自主持，以便指揮中央各部會署及地方各省市縣協同辦理善後救濟。我覺得這個意見很好，擬卽簽呈兼院長。後來又有人說：「兼院長實卽國家元首，親自主持，於體制不合。而且實行的時候，免不了派人代行。那末代行者反可挾上以臨下，別的機關受不了。」此議遂作罷。

第二種建議是設委員會。這種建議我差不多沒有加以考慮，因爲善後救濟牽涉政治或政策甚少，主要的是執行。倘以委員會來執行一種事業，很容易誤事的。

第三種建議是設部。我覺得部應該是經常設置的機構，不適於有期限的善後救濟事業。部是一種行政機構，而善後救濟應該業務化，不應該行政化。

見了兼院長，報告了接洽的經過以後，我就建議政府應該設立執行的機構，並且簡略的說明這種機構應該具備的條件。當時奉命起草組織法。

到了這個階段，我的思路比較的清楚了。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強有力的執行機構，少帶行政性質，多帶業務性質。於是決定採用「署」的名稱。

組織法草案有三種特點：(一)經過銓敍的人員與不經過銓敍的人員兼用。(二)內部單位分廳處室。廳有儲運，分配，財務，振恤四廳。處有總務，會計，調查，編譯四處。室有人事室。業務都在四廳，責任重大，故不能不提高地位。儲運廳將來要負責點收六億至九億美金的物資，並且要輸送或委託運務機關輸送這些物資到使用地點。分配廳要根據各省市縣及各種事業的需要妥定分配額數及先後緩急的次序。財務廳掌管物資出賣及賣價的運用，一則以協助政府其他機關平定物價，一則以籌備工振事業的經費。振恤廳要辦理緊急救

濟，幫助難民回家，及籌劃各種以工代振的事業。

四處之中，會計處的工作與其他機關的會計處完全相同。總務處須兼管聯總駐華辦事處的庶務並招待外國專家，故其責任比一般總務處的責任較繁。調查處負責調查各地的需要。這在戰時是不容易的，一則無法預計此後軍事的破壞，二則無法預料敵人此後在戰區榨取的方式和程度，三則戰區實地的調查諸多不便。編譯處的設立完全爲貫澈凡事公開的主張。國內外的人士對善後救濟事業均極關心。與其枝節對付，不如積極的、自動的供給社會正確消息。我們所怕的不是社會知道太多。我們所怕的是社會所知道的不詳或不確，因而發生誤會。至於人事室與其他機關的完全相同。不過我們要注意一點：辦理善後救濟的機關本身不能作爲失業人員的救濟所。

(三)組織法草案的第三種特點是設置五個副署長。我知道這是破例的主張，不過我想如以副署長兼廳，則廳長的地位自然提高了。

這三種特點，立法院採納了兩種，副署長減爲二名。

善後救濟總署的組織法，通過立法院以後，國民政府於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正式公佈（參看附件）。

這是國民政府所設立的機關，隸屬於行政院，其法律地位與其他各部會署完全相同。牠的職責是在收復區內執行救濟與善後。我們簡稱它爲行總，以別於聯總。

行總的任務之展望

在某種條件之下，救濟是必須的，然而我們應該認識救濟是消極的。救濟本身不能解決我們的經濟問題。

在什麼條件之下，我們應該辦理救濟呢？

第一、經過惡劣戰爭的市鎮必須有短期的救濟。這種市鎮很可能的經過一個時期的飛機轟炸，以後又經過雙方炮火之戰，最後又經過巷戰。在收復之初，高度百分比的房屋被破壞了，許多人民連躲避風雨的地方也沒有。作戰的時候，糧食的供給或許斷絕：敵人必儘量搜括當地存糧以維持敵軍的給養。就是敵人退了以後，或因交通的阻礙，或因通貨的缺乏，或因鄉民的膽小，糧食仍舊不能恢復通常商業供給。市內的水電或者一時不能恢復，街道也要掃除。瘟疫很容易發生。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應該辦理緊急救濟。

緊急救濟包括糧食的供給。我們一面放振，一面還可以出賣糧食。此外，我們應該幫助人民預備住宿，或是利用廟宇學校，或是利用廢墟磚瓦建築臨時住宅，或是搭蓋帳棚草舍。電燈和自來水應該提前恢復。衛生防疫的工作應該與救濟的工作同時開始。

等到緊急救濟辦有頭緒，就應該開始推動以工代振。凡年壯力強而需要救濟者均應參加工振。

緊急救濟爲時愈短愈好。在推動的時候，用人必多，應請地方公務人員及民衆團體一齊參加。

緊急救濟是以一城一鎮或一鄉爲對象。城鎮需要緊急救濟的可能多，鄉村需要比較少。

第二、我們應該辦理老弱殘廢的救濟。

在這種救濟之內，最要緊的是無家可歸而又無人照顧的兒童。這種兒童，將來在收復區內究竟有多少，此刻不能預計。我們必須盡我們的力量去幫助他們。不過根據以往的經驗，這種救濟是不容易的。兒童在收容所或救濟院長大者容易發生不正當的心理。等到他們離開院所踏進社會的時候，他們常感覺社會的寡情而要回到院所。在另一方面，社會常發現這種兒童不守規矩，不懂事情，不負責任。這一次，我們希望可以改良。我們預備請中外專家共同努力，設法改良。

有許多人雖殘而不廢。要他們即時自養，事實上有困難。經過相當時期的訓練和學習，他們可以全部的或局部的自養。在公立院所受救濟的人多半不快樂，一則因爲他們感覺自己太無用了，於是喪失自尊心，二則因爲他們閑暇無事，不免感覺無聊。如果他們能學一技一藝，縱使是極簡單的技藝，不但公家的負擔可以減少，他們的生活樂

趣也可以提高。

第三、我們應該幫助難民回家。

在此次長期抗戰之中，不少的同胞扶老攜幼離開家鄉。有些逃離不遠，等到軍事過去了，又回到原有的田莊去工作。有些則不遠千里來到自由的國土，參加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假若這些人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應該盡我們的力量。

到後方來的同胞，有些已經有相當的職業和相當的社會地位。他們在後方已經生根了。我們自然不應該鼓勵這些人回老家，因為祖國各城各村都可以作我們的家鄉。此外還有些人雖然急欲回到老家，他們能自備資斧，無須我們幫助。窮苦的難民要回家鄉而又無法回去的，我們才應該替他們設法。

假若我們把以上三種的救濟都辦好了，我們的問題就解決了嗎？絕對沒有。

根本之圖在寓救濟於善後

戰前我國人民生活程度已經遠在國際水準之下。加上八九年的長期抗戰，除非我們拿人力去克服自然，戰後之苦可以不亞於戰時。平常有許多人迷信救濟，其實救濟是治社會經濟的最下策。拿我們中央政府戰前一年的整個預算去辦救濟 ， 我們不能養活全國人口百分之五。

我們的出路不在救濟而在建設。

在未建設新的以前，我們必須恢復原有的。等到我們恢復了原有的鐵路、公路、航運、電報、電話、工廠、礦場、水利、醫院，然後可以建設新的。這是聯總可以協助我們的地方，這也是行總主要的使命。

所以在行總籌備的物資之中，救濟物資僅佔三分之一，善後物資反佔三分之二。

我們相信善後就是救濟，而且是最好的救濟。

我們試拿津浦鐵路作例。等到我們把敵人驅逐於路線以外之後，交通部一定要恢復津浦路。行總除向聯總取得鋼軌、車頭、貨車、客車，及其他必須的器材以外，行總還可以運用一部份的救濟物資到路線上去，作為工人的工資。這樁事業在交通部算是交通善後，在行總算是救濟。等到工程完了以後，我們可得兩種結果。一方面，從天津到浦口的運輸可以暢通，河北、山東、安徽（一小部份）、蘇北的生產事業均可以發展，間接受益者是沿綫的一切人民。同時在另一方面，擔任修復工作的工人，不但在工作時間，衣食住均有着落，而且工作完了以後，口袋裏總可積有相當數目的工資，回到家鄉去買把犂，買點肥料種籽，租輛洋車，買套木匠石匠的器具，或修理房屋。這幾萬勞力者從此就可以自食其力了。

我們再拿黃河泛區作例。自從黃河在花園口潰堤以後，豫東、皖北、蘇北一部份的耕地被淹沒了。國府主席對於這個區域的同胞特別關心。水利委員會已擬有堵口和抽水的計劃。農林部也準備幫助鄉農提前恢復他們的糧食生產事業。行總已根據部會的技術計劃準備各種工程和農業器材。在開工以後，田地沒有復原以前，此一區域的壯丁可以到工程地點去作工，由行總照顧他們的工資。這樣的作法就把善後與救濟打成一片了。

以上兩個例子都是行總與中央部會合作的例子。根據這種辦法，行總也可以與省政府合作辦理省公路的重修，與市政府合作辦理水電街道碼頭的復原。

這種寓救濟於善後的辦法，就是普通所謂以工代振。其實這些名詞均不恰當，而且可以發生不良的影響。工人既為公家工作，公家應該發給正常的工資，根本談不到救濟或振濟。公家應該作模範雇主，不應該從勞工階級有絲毫的搾取。若用救濟或振濟的名詞，在執行者方面可以發生兩種誤會：（一）受救濟者祇要有飯吃就夠了，不必講究別的；（二）受救濟者在工作上可以馬虎。在工人方面，這種名詞也不好：優良工人並不願受救濟，他們富有自尊心，情願自食其力；差一

點的工人或者要想既然是受救濟，就不必努力了。所以將來工作開展的時候，我們都要避免施救濟或受救濟的名詞和態度。工人應該照常工作，同時也應該取得正常待遇。

以往政府辦理工程事業多採包工制度。在別的國家也是這樣。包工者雖負相當責任，對工人的管理亦有相當貢獻，不過他們所獲往往超過他們應得的成數。這種超比例的利得不是公家的損失，就是工人的損失。這一次，行總應該與工人發生直接關係。在行總方面，必須給工人公平的待遇。在工人方面，最低限度，爲公家工作，其努力的程度不應該低於爲資本家私人及包工的工作。此中有相當組織和心理上的困難，我們預備請中外的專家共同設計處理。

救濟與善後合一的辦法已經成了世界各國解決社會經濟問題主要方法之一。十餘年前，當羅斯福初任總統的時候，他利用政府的資金大興土木以吸收勞工失業者。一時批評的人雖多，說他是浪費，說他是社會主義者，或私人資本自由企業的敵人，現在一般都承認這種方法既合乎經濟原理，又是以促進社會福利。在戰後大規模建設時期，我們應該繼續利用這種辦法 。行總在這方面的試驗可能有歷史的意義。

耕牛問題怎麼辦？

機械化的事業容易管理，其有關的行政亦比較簡單。凡事涉及零星的，單位極小而又多的，利用人力獸力的事業，其有關的行政就困難了。

我國的農業須要改良的地方很多，戰後農民的問題必極複雜。說來說去，我們所能幫助農民的，可用一句話包括起來：幫助農民享受近代科學和工程學的恩賜。如何把科學和工程學運用到我們無數的小面積極小的田莊上去，困難確大了。這或者是我們現代過程中最嚴重的問題。

農業善後的責任，在技術方面，必須由農林部及其中央農業試驗所負擔。中農所的工作已得政府的承認和國際專家的敬佩。特別在改良稻、麥、棉種方面，全國的農民受惠很多。所以在技術上，我們已有善後的幹部。

農業善後的大困難多在行政。在這方面，行總準備與農部密切合作。

農業的善後，包括種籽肥料及農具的供給。在被災很重的區域，這種供給是無償的，在其他各地，則必須收價。所收價款，按照公約，將作爲救濟善後之用。

農業範圍之內，最大的困難是田莊上的動力。淪陷區各省的報告均說耕牛缺之，從河北山東一直到廣東廣西都是如此。北方大平原尚可利用機器，南方稻田則不簡單，非特別努力恐將不能解決，致成爲戰後糧食生產最大的阻礙。

專家最初的計劃，是要求聯總從印度購運十萬頭水牛。但印度並無專門經營水牛買賣的牛場或牛商。在印度如同在中國，鄉下人家養一頭牛，如生有小牛，則可出賣一頭。十萬頭水牛必須從全印度的村莊去張羅。這是很費力的。等到牛買好了，又有海洋運輸問題。輪船公司很少有運牛的經驗，究竟水牛在船艙裏應怎樣安排，很少人知道。等到牛運至上海廣州等海口以後，如何分配輸送到我們鄉裏去又是個大問題。我們的行政機構及業務機構能否善爲處理不無疑問。假使十萬頭牛到了我們的田莊上，結果又怎樣呢？據中農所的統計，福建一省有八十萬頭牛，湖南在戰前有一百五十萬頭牛。十萬頭印度牛所能補充的動力實在太小了。

專家的第二個計劃是到澳洲北部去捕野牛。這個計劃曾在雪梨遠東區域會上詳加討論。各國的代表，連澳洲的外交部長在內，均以議題新奇，大感興趣。澳洲的報紙，爲迎合社會的好奇心，大談特談水牛。管理動物園的專家，都說野牛天性不馴，用以耕田殊不可能。於是改變方向，想專捕小牛。現聯總在澳專家繼續調查研究。我猜想結果不會圓滿。澳牛如印牛一樣的難運輸，難處理。

南方耕牛的問題必須採用好幾個方法同時並進始能局部的解決。(一)在公路傍邊的平地，假使地主願意放水，可以利用機器。現在美洲澳洲種稻者全用機器。(二)在國內多設耕牛蕃殖場。(三)從比較不缺牛的區域買牛以供給極缺牛的區域。就是這樣，耕牛問題還是不能完全解決。

北方平原當然可以用機器耕種。幸而美國現在有製造廠專門爲小田莊設計了一套機器，其構造十分簡單，十四五歲的幼年經訓練後都可以駕駛。我在美國曾往參觀表演。設計者對我說道：「世界各國的農民都比較粗魯。爲他們設計一套機器，必須使其弄不壞，打不破。」雖然，駕駛員和修理員必須事前訓練。汽油的源源救濟必須準備。鄉村的人民必須合作。

人力仍是我們最基本的動力

在農業工業運輸業未機械化以前——機械化是要相當時期的——人力仍是我們最基本的動力。有一天，加拿大駐華的大使對我說：「人都是浪費的。我們西方人浪費物資，你們中國人浪費人力。」

我們浪費人力的方面很多，其中最要緊的莫過於疾病。人道主義暫置不講，老百姓的疾病是我們民族經濟最大的損失。投資於衞生事業，我相信，是我們最好的收穫，最大的投資。

第一次，辦理救濟善後，衞生我認爲是最基本的事業。行總預備與衞生署密切合作，辦理緊急防疫及全國醫院衞生院的充實。

善後救濟計劃中的衞生計劃，除防疫外，想把全國醫院的病床加倍。這個計劃的命運是有趣的。

提出以後，聯總最初的反感是不利的。他們說：「衞生雖是很基本的事業，我們祇能協助你們恢復原有的，不能建設新的。」

我們的答復是：「中國復原主要的力量是人力。在農業上，人力尤其重要。故衞生工作的推動可以幫助運輸、水利、工礦、農業的復原，尤其是農業的復原。加倍之後，我們尚未達到最低限度的條件。」

聯總的專家對於我們的衞生計劃還有第二種批評：「加倍之後，中國的醫生及看護士太少，無法完全使用。」

我們的醫生和看護士誠然太少，所以我們請聯總在戰後初期派遣六百名衞生人員來協助我們工作。同時我們必須加緊訓練，並請聯總派遣專家來幫助我們訓練。聯總結束的時候，我們可以酌留相當數目的外國專家，由中央及地方衞生機關出資，一直等到我們的專家可以替代他們。

假使聯總幫助我們建設新的醫院和衞生院而我們無法長期維持，那我們太對不起人了。我們都要記得：投資於衞生事業是我們最好的、收穫最大的投資，因爲現在人力仍是我們最基本的動力。

我們能趁機工業化嗎？

實業界的領袖多希望行總趁機促進國家的工業化。這種希望頗難達到。

聯總大會，鑒於經費的限制，曾通過議決案，把善後的範圍加上兩層的緊縮：(一)善後限於恢復原有的，(二)原有工業生產救濟物資者始能取得聯總的援助。所謂救濟物資實即生活必需品。

除大會議決案外，我們還要注意國際的空氣。十餘年以前，工業先進的國家頗不願意農業的國家工業化。現在經濟思想潮流已開始改變，開明的學者承認農業的國家不能握有大的購買力，因此無法輸入大量外國的貨品。假若工業化，購買力可以提高，輸進的品類雖有改變，輸進的數量必可加增。不過這種潮流尚未充分發展。工業先進國家的人士至今尚有不少的人希望我們不要工業化。他們希望我們的善後計劃中注重鄉村工業，家庭工業，手工業，不要注重機械工業，大工業。

鄉村工業在現階段的中國經濟自有其重要性，但救濟確不容易。原來以往政府及社會團體對於鄉村工業的努力多半是實惠不及於民。原來

這種鄉村工業規模很小，單位很多，分佈的區域又很廣，而內部的各種技術問題，又包含許多是我們知識階級所不了解的。縱使我們有最賢明的推動方法，必須積年累月始能收宏大的效果。這種工作似不宜於有期限的，求速效的行總。

因以上各種原故，行總與經濟部及其附屬的資源委員會決定在聯總所規定的範圍之內辦理少數的近代式的工業，包括：(一)糧食業，(1)麵粉廠，(2)榨油廠，(3)煉糖廠。(二)紡織工業：(1)棉紡，(2)毛紡。(三)建築材料工業：(1)水泥廠，(2)鋸木廠，(3)造磚廠，(4)玻璃廠，(5)壓木廠。(四)煤礦。(五)公用事業：(1)電力廠，(2)自來水廠。(六)金屬工業：(1)機器廠，(2)電工器材廠，(3)鍊鋼冶鐵廠。(七)化學工業：(1)肥田粉廠，(2)灰鹼廠，(3)燒鹼廠，(4)肥皂廠，(5)造紙廠，(6)橡皮工廠。

以上所列舉的各種工業有些是民營的，有些是公營的。將來如何分配，行總必與經濟部從長計議。不過有幾點應該事前聲明：(一)行總不負戰時損失賠償的責任，但廠家因軍事曾受重大損失者應有相當優先權利。(二)分配到民營事業的器材均是有代價的，其收入將充善後救濟之用，如以工代振及醫院救濟的維持。(三)行總和經濟部必趁機促進我國工業區域分配的合理化。

工業的發展有其必要的條件。一種是運輸的方便，還有一種是物價和金融的安定。在這兩方面，行總可能有相當的貢獻，也願意盡其最大的努力。

行總準備與財部合作以處理戰後的通貨和物價問題

目前我們的困苦之一是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這個問題很複雜，非這本小册子所能研討。不過我雖知道前途的困難，我並不悲觀。我的理由呢？

一、物價高漲原因之一是海岸的封鎖，致國外的物資不能輸入。舶來品如汽油和五金材料漲的最快最高，而輸出品如絲茶桐油豬鬃則漲得最慢最少。這是敵人封鎖我國海岸線的結果。一旦盟軍登陸，海口打通，舶來品必下落，而輸出品則必上漲。

二、物價主要因素之一是運價。戰後交通部和行總將集中力量提早恢復鐵路公路和河道的運輸。汽油來源可通，公路運價自然可以降落。

三、因主要稅源為敵人所佔領而國人吸收公債的能力又有限，政府不能不加增發行，以補出入的差額。等到敵人被驅逐以後，稅源可以恢復，國庫收入可以加增。經過兩三年的整理，政府的收支可期平衡。

雖然，戰後財政金融的困難尙不可過份樂觀。善後的經費就很大。據我們的估計，鐵路一項很可能的使通貨發行額繼續加增。戰前我國鐵路大約一萬七千公里。照目前的物價計算，器材不在內，復原費每公里須法幣一千萬，是則一萬七千公里的鐵路將共需復原費一千七百億。鐵路以外，其他復原的事業還多呢！

戰後通貨的發行額祇可以收縮，絕對不可以加增。

因此之故，行總要把救濟與善後打成一片。善後經費之法幣部門一部份應由行總負擔。

行總又有什麼辦法呢？

行總從聯總取得的物資可分兩類，救濟物資和善後物資。兩類之中都有幾分之幾，可以在國內出賣，其收入即可移作工振之用。這種辦法是最賢明的，而且已得聯總的同意。

善後經費法幣部門的主要項目是工資。工資在有些地方簡直可以逕發實物如糧食布疋，在有些地方則宜發錢。

不過出賣物資是件很麻煩的事體，政策和手續都不簡單。定價如過高，則出售不易，而且有抬高一般物價之可能。定價如過低，則又難免奸商從中漁利，而且不免妨礙國內生產者。試舉布疋一項為例：如行總定價過低，則國內紗廠將不敢放手出貨。我們必須有極細密的

研究。財務屬主要職掌就是審定物資出賣的價格和方式條件。

物價暴漲固然可怕，物價暴跌也是可怕的。十餘年以前所謂世界經濟恐慌就是物價的大跌，跟着發生工人的失業，以致一切事業的不景氣。理想的政策是物價的安定。

假使行總不能幫助財部在戰後收拾通貨的膨脹，行總的工作可說失敗了。

困難尙多

行總現在及將來的困難很多。

第一、救濟與軍事並進的時候，軍事仍舊是第一。物資及運輸盡勢必儘先由軍隊使用，救濟所能勻分者必極有限。在德國未崩潰以前的半年，歐洲有無數的難民，北美各海口堆積不少的救濟物資，然而因海上船隻及路上車輛均爲軍隊徵用，歐洲人民祇好繼續受苦幾個月。這是勝利的代價，非任何個人或機關所能負責的。我們已經踏入了這個階段。自國軍在廣西湖南反攻勝利開始以來，行總一方面接到地方長官及民衆團體無數的電報，要求行總開始工作，另一方面又得不着空運噸位或公路運輸噸位。將來海口初通的時候，這種困難還有相當時期的存在。

第二、國民政府雖已頒佈行總的組織法，規定行總的職掌，但是機關林立，求一個職責分明的機會去工作是件極不容易的事情。

第三、在目前政府規定待遇之下，行總極難得着相當數目的業務人員來參加。想到行總來作官的人雖不少，眞正在業務上有經驗的人士則不願輕於一試。

事在人爲

在善後救濟時期，我們固然需要物資的援助，同時我們也需要外籍專家來幫忙。有物資而無人，事業還是不成的。

拿交通部作例罷。在戰後兩年之內，我們希望協助交通部恢復鐵路公路及沿海沿江的運輸。ဖ區各省市，北自黑龍江，南到海南島，非各處同時大興土木不可。動員全國的工程師和運輸專家以後，人員還不夠用。所以行總決定代交通部向聯總聲請派遣三百名左右的專家來華服務。

再拿衛生署作例。緊急防疫及醫院復原，除藥品及設備外，必須有適當數目的醫生和衛生專家。國內的專門人員數目太少了，離最低限度的數目還差得很遠。所以我們決定代衛生署向聯總聲請派遣六百名醫藥衛生專家來幫助我們。

其他有關的部會如經濟部，農林部，社會部及水利委員會的情形大致相同。綜合起來，行總的業務全部開展的時候，外籍專家在我們這裏服務者將到一千五百名。

這可說是個大規模的試驗。這個試驗的成敗如何？影響如何？

我們的專門人員，在數量上雖然不夠，在品質上，水準尙高，而且每門都有特出人才，是國際同行所敬佩者。當前清同治光緒年間李鴻章開始任用「洋員」的時候，國內全無技術專家，而行政人員又不知道如何利用外人的專長，其結果可笑之處甚多，如蘇州兵工廠請英國一位軍醫作工程師，北洋海軍請德國一位陸軍軍官作顧問。雖然，我國至今尙沒有因用外國專家而致喪失主權的事情。反過來說：客卿對於我們有很大貢獻者尙不乏人，如英人赫德幫助我們樹立海關機構，美人羅士德參贊李鴻章應付馬關和議。現在我們旣有專家能與外籍人員共同工作，又有行政長官知道如何利用技術人員的專長，大規模任用客卿的時期已臨到了。

西洋專門人員富有事業的人生觀者爲數不少。他們固然要求有舒適和安定的生活，他們終身的目標並不在作富翁而在成大事。這些人生長於工業極度發達的國家頗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想。當羅斯福總統提倡區域建設的時候，不少的工程師及企業經理家情願犧牲在私營企業的高薪地位（每年二萬至十萬）去接收國營事業的低薪地位（每人八千至一萬）。這些人之中有不少數很願意來參加我們的建國事

業。他們甚至以爲在二十世紀的下半期，新中國的建設是全世界最偉大最有意義的事業。如能得機參加，他們認爲是無上之光榮。我在美國遇普遍，在加拿大及澳洲也遇着過這種可敬可愛的專家。我想英國一定也有這種人物。

專家，不分中外，所希望的是安定的、有保障的、相當舒適的私人生活。拿戰前的物價作估計，中國專家每月如能有八百至二千元之收入，已心滿意足，外國同等專家，因須計算將來回國休養，大概總比中國專家加百分之五十。欲望並不算高。如我們想完成建國的大業，這筆經費千萬不可吝惜。我們行政人員，爲整個民族前途着想，不可對業務人員生嫉妒之心。

除安定的生活以外，有事業人生觀的業務人員所希望的就是工作的機會。他們所求於我們行政人員的不過免除行政的麻煩。如我們硬要加在他們身上各種條文的拘束及追求業務經費的痛苦，久而久之，他們必致灰心。到了那種田地，他們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本身的官僚化，於是從一個有用的專門人才一變而爲廢物，寄生蟲，另一條是退而投身於私人企業，於是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終於無法實現。

在這種事情上，我們很容易因小失大。

事在人爲，因此我在這裏特別爲中外專家說幾句話。

善後救濟是短期的，不過接連着就是經濟建設。如果在此短期中，行總任用外國專家的試驗能成功，而與本國專家又能產生美滿的行政與技術的配合，行總在這方面精神上的貢獻或將不在其物質上的貢獻之下。

附錄一　善後救濟總署組織法(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公布)

第一條　行政院設善後救濟總署辦理戰後收復區善後救濟事宜

第二條　善後救濟總署辦理善後救濟事業得分別性質會同中央或地方機關辦理或委託有關機關辦理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條　善後救濟總署設左列各廳處

一　儲運廳
二　分配廳
三　財務廳
四　振恤廳
五　調查處
六　編譯處
七　總務處

第四條　善後救濟總署於必要時呈經行政院核准得設各種委員會及業務機構

第五條　善後救濟總署得於必要地區設分署辦理各該指定區域內之善後救濟事務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第六條　儲運廳掌左列事項

一　關於物資之點收事項
二　關於物資之倉儲保管事項
三　關於物資之運輸事項
四　其他物資經理事項

第七條　分配廳掌左列事項

一　關於器材之貸放配發事項
二　關於民用物資之散放配售事項
三　其他有關物資分配事項

第八條　財務廳掌左列事項

一　關於財務之籌劃運用事項
二　關於財務之出納保管事項
三　關於財務報告之稽核及編造事項
四　關於財務票據之處理及保管事項
五　其他有關財務事項

第九條　振恤廳掌左列事項

一　關於難民遣送及復業事項

二　關於難民福利事項
三　關於難民工振事項
四　其他有關振恤事項
第十條　調查處掌左列事項
一　關於流離人民之調查事項
二　關於戰區社會情形之調查事項
三　關於工商業之損害調查事項
四　關於汎濫區域之災情調查事項
五　其他有關善後救濟之調查事項
第十一條　編譯處掌左列事項
一　關於法規及報告之編譯事項
二　關於參考材料之檢討編譯事項
三　關於出版物之編譯刊行事項
四　關於圖書管理事項
第十二條　總務處掌左列事項
一　關於收發分配撰擬保存文件事項
二　關於署令之公布事項
三　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四　關於本署經費之預算決算及出納事項
五　關於稽核直轄機關之經費事項
六　關於本署財產及物品之保管事項
七　關於本署庶務及其他不屬各廳處之事項
第十三條　善後救濟總署置署長一人特任綜理全署事務監督所屬職員及機關
署長得出席行政院會議
第十四條　善後救濟總署置副署長二人輔助署長處理事務
第十五條　善後救濟總署置參事三人至五人
第十六條　善後救濟總署置秘書七人至九人
第十七條　善後救濟總署置廳長副廳長各四人處長三人分掌各廳處事務
第十八條　善後救濟總署置視察二十四人至三十人技正八人至十八人科長四十六人至五十二人編審三十人至三十八人技士二十人至二十八人科員一百二十人至一百四十人
第十九條　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參事廳長副廳長處長簡任秘書四人簡任餘薦任視察八人簡任餘薦任技正六人簡任餘薦任科長編審薦任技士八人薦任餘委任科員委任
前項人員於必要時分別簡派薦派或委派
第二十條　善後救濟總署職員經商得有關機關同意並呈准行政院後得調用中央及地方機關相當之職員或技術人員充任之
第二十一條　善後救濟總署設會計處長一人統計員一人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事項受善後救濟總署署長之指揮監督並依國民政府主計處組織法之規定直接對主計處負責
會計處需用佐理人員名額由善後救濟總署及主計處就本法所定薦任委任人員及雇員名額中會同決定之
第二十二條　善後救濟總署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薦任依人事管理條例之規定掌理人事管理事務
人事室需用人員名額由善後救濟總署就本法所定委任人員及雇員名額中與銓敍部會同決定之
第二十三條　善後救濟總署得聘用國內外專門人員
第二十四條　善後救濟總署得酌用雇員
第二十五條　善後救濟工作辦理完畢時善後救濟總署應即撤銷
第二十六條　善後救濟總署辦事細則由署擬訂呈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附錄二　善後救濟分署組織條例（國民政府九月十二日明令公佈）

第一條　本條例依善後救濟總署組織法第五條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善後救濟總署得於受戰事損害較重之地區設置分署，在各該指定區內，辦理善後救濟事務，並協助其他中央機關執行善後事務，前項指定區域，應爲一省或一市以上之地區。

第三條　善後救濟分署，設左列各組：

(一)振務組；

(二)儲運組；

(三)衞生組；

(四)總務組。

第四條　振務組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緊急救濟事項；

(二)關於難民安置及復業事項；

(三)關於救濟物資之貸售散放事項；

(四)關於工振事項；

(五)其他有關振務事項。

第五條　儲運組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物資之收轉接運輸送事項；

(二)關於物資之倉儲保管事項；

(三)關於物資之籌劃應用事項；

(四)其他有關物資經理事項。

第六條　衞生組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公共衞生及醫療設施事項；

(二)關於防疫事項；

(三)關於藥品經理事項；

(四)其他有關衞生事項。

第七條　總務組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財務之籌劃運用及出納保管事項；

(二)關於文書之收發撰擬保存事項；

(三)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四)不屬其他各組之事項。

第八條　善後救濟分署設工作隊，分赴區內各地實施救濟，工作隊之編制，由善後救濟總署定之。

第九條　善後救濟分署，置署長一人，綜理分署事務，副署長一人或二人，輔助署長處理事務。

第十條　善後救濟分署置秘書二人或三人。

第十一條　善後救濟分署置組主任四人，副主任四人，分掌各組事務。

第十二條　善後救濟分署置視察六人至十人，技正五人至九人，技士八人至十四人，組員二十八至四十二人。

第十三條　善後救濟分署署長簡派，副署長各組主任副主任簡派或由總署聘任，秘書一人，視察二人，技正三人簡派，其餘秘書視察技正薦派，技士組員委派。

第十四條　凡設善後救濟分署之地區，得另設各該區善後救濟審議委員會，其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由善後救濟總署就各該區域內政軍各界及社會負有聲望之人士中遴聘之。分署署長及副署長爲當然委員，前項審議委員會審議及輔導分署工作，對總署負責，主任委員及委員概爲無給職，審議委員會事務由分署職員兼辦之。

第十五條　善後救濟分署得聘用國內外專門人員，其員額不得超過二十人。

第十六條　善後救濟分署得酌用雇員，其員額不得超過五十人。

第十七條　善後救濟分署得於呈經善後救濟總署核准後，設各種委員會及業務機構。

第十八條　善後救濟分署，於任務完成時結束之。

第十九條　善後救濟分署辦事細則，由善後救濟總署核定之。

第二十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國際關係的近觀與遠景

吳澤炎

現代社會學上的教訓之一，爲說明社會的發展是一種有機的發展。所謂有機的發展，其中至少包括兩個意思：一是發展有其因緣，不能憑空而來；現狀乃是脫胎於過去，經演化程序而孕育的結果。第二，祇要有機體——超有機體——繼續存在一日，則發展的過程也繼續維持一日。根據第一點，凡是社會發展的事實，實在就是過去時間之流中各種因素相激相盪互爲影響的產物；根據後一點，這一個各種因素匯流總合的過程，是亙古長存永無止境的。在人類社會演化史上，祇有每一階程的相對的平衡，並無只有在想像中存在的絕對的平衡。在比較原始單純的文明之下，社會的發展都憑自然的推演，循抗力最小的路線而進行，受錯誤嘗試的過程的刷選。現代文化的功用，也就是社會學主要任務之一，即在於利用人類繼續增加的對自然與社會的知識，進而把這種自然的過程，作自覺的引導，置於人類控制之下，以達到由人類價值觀念規定的社會目標和理想。

這個在社會學上幾乎等於老生常談的原理，也同樣可以應用於觀察國際關係的演變。它可以使我們在波譎雲詭千變萬化的國際各種事變的浮面之外，進而瞭解構成這一幅浮面畫的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對交相迭起的各種事實的涵義，有適當事理分寸的認識。這種瞭解與認識的功夫，可以幫助我們預測國際關係演變的可能趨向，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也可以幫助我們消除一部分因舊金山會議以後國際糾紛迭起而發生的悲觀情緒。

無論在國內國外，目前有數不在少的人，對於國際關係中的陰影，尤其是實際上負有維持世界和平重要責任的英、美、蘇三大強國之間未能有明朗化的合作，抱有深切的憂慮。這種陰影之已經表現於外的，例如東歐及巴爾幹各國疆界問題的爭執，三國管制德國與奧地利的各自爲政，五強外交會議之因程序的爭執而至無定期的休會，蘇聯對管制日本的異議，遠東荷印越南殖民地擾攘不安等等，都曾引起熱心國際合作人士的焦灼不安。自從五強外交會議無結果而散會以後，蘇聯對於國際會議的觀念，似乎頗有由積極參加而轉趨靜觀究竟的傾向，例如國際教育會議蘇聯已經表示不參加，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已經舉行而仍在虛左以待蘇聯代表的光臨，這種傾向如果眞是代表蘇聯的政策，則今後國際間的關係自然將更爲微妙。在飽經戰亂憂患之餘的人們，尤其是聽慣了自一九四二年一月大西洋憲章以來一再申述的國際合作正義和平等調子以後，對於目前的演變發生悲觀的情調，原是在人情上很自然也極容易瞭解的反應。但是這種失望的情緒，實在有一大部分是因爲對於現實國際政治缺乏眞知灼見而後發生的；因爲他們忘記了歷史之非眞空，國際合作與世界和平原非一蹴可了。奢望愈高，則轉背也越容易失望。他們太強調了夾雜在戰時宣傳之中的理想主義，忽視了國際關係中各國現實的利害關係，小看了國際關係中各種現實因素的積重難返的惰性力量，所以一待面目嶄新的理想觸在現實的礁石之上之時，便暗不見與薪似的無視所已有的成就，發生渺茫幻滅之感了。

國際和平合作的理想，雖可以遠溯至中古時代的但丁(Dante)以及國際公法的鼻祖格老秀士(Grotius)，現代的國際法制度，已有三百多年繼續發展的歷史，然而在我們的時代中，國家依然是國際關係中的主角，和平與國際合作的人類利益，必須通過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有具體的表演。在一九三七年全世界大小國家有七十個之多，這七十個國家在政治經濟制度上，在社會文化的形態上，在歷史情態的因緣上，在獨特的地緣政治的地位上，造成了各國之間自身有時不免互相

牴觸的利益。在國際尚無真正有效的集體安全組織以前，尤其是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差別頗有變本加厲的趨勢的現日，各國勢所必然將以本身的利益置於其他的考慮之上，這是一層；即使各國對於國際公法的原則，有相去不遠的共同的認識，然而由原則應用之於實際之時，因各國各有由不同時空關係而構成的歷史背景，仍不免有各不相同的利害打算。舉具體的例證而言，在英美方面有一部分在政治上頗具力量的人士，主張為維持歐洲的平衡，加強英美與西歐國家的聯繫。這原是過去傳統的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中勢力均衡的一套；在區域的或世界組織尚未具體化以前，這一套恐怕仍將為國際關係中一個未可厚非的重要節目。反之，在受過近二十年慘痛經驗教訓的蘇聯，認為所有成立任何西歐集團的企圖，都是第一次歐戰以後成立的『衛生帶』的復活，意在於包圍孤立蘇聯。雙方所懷抱的恐懼，一部分是真實的，一部分也是出於想像上的。再舉例而言，英帝國對巴勒士汀阿剌伯與猶太人糾紛所採取的立場，顯然在於維持一九三九年白皮書的規定，英政府實際上已經拒絕美國所提准許十萬猶太人入境的要求。英美態度的歧異，並非由於雙方對阿猶民族的好惡有畸輕畸重之分，主要的關鍵，還是由於英國為保持其東地中海和中東的利益，根據地緣政治的理由，必須取得方興未艾的阿剌伯民族的友誼和善意。如果歷史的經驗是資考證的話，只要國家的絕對主權概念沒有發生實質的改變，這種利益的衝突是會繼續存在的。既有利益的衝突，各國勢所必至仍將出之於爭，求本身實在的或潛在的力量的擴充。最近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上將在每兩年一次的軍事報告中，強調擴充軍備的必要，主張『永久的安全政策』(Permenent Security Policy)，就是眼前風光的一例。這看起來似乎與和平的空氣不相符合，實在是現實政治題目裏應有的文章。

不過真正的問題所在，倒不在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利益的衝突，因為這是現實政治中勢所難免的；問題是在於爭執發生以後，將循那一種方式去解決；除了訴諸戰爭之外，有沒有一種為國家所共同遵守的解決國際糾紛的程序。換言之，國際政治家的責任，在根據國家的利益解決個別的爭執以外，尤其應該保持起碼程度的理想主義，為國際爭執糾紛訂定一個實際生効的和平解決的程序。二十六年前國際聯盟公約中的第十五、十六、十七條，結果都成了告朔的餼羊。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簽訂的聯合國憲章，第六章爭端之和平解決與第七章對於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及侵略行為之應付方法，是曾經接受國聯失敗的經驗而重行訂立的，它們是否能夠發生實在的効力，纔是決定人類能否真正避免另一次刼運的問題所在。過去如一九二四年日內瓦議定書中所規定的，訂約國家同意『除抵抗侵略行為或與國際聯盟行政院或大會協同行動』外，不得從事戰爭；以及大西洋憲章中的『世界各國，為了現實的和精神的理由，必須進而放棄武力的使用』，但這類的規定都類於一紙勸告。聯合國憲章中的規定要比較精密得多，然而究竟是否不至成為一紙具文，仍待看將來的事實。

目前的國際關係如以近視的眼光看，誠然極為複雜微妙，可以形成嚴重的對立與危機，然而却並不一定就因此引申出悲觀的結論來。強權政治的歷史太長了，決非短短的幾十年所能掃除蹤跡，新的國際秩序非單獨的一仗或一次國際的會議可以產生。祇要在現實政治中理想因素的比重是在增加，只要國際合作的推動力量是在擴大，則人類總有作樂觀希望的理由，雖則其間需要好幾世代的年限，這是就積極方面說。消極上如果有了有効的解決國際糾紛的一定程序，則國際間雖然仍有爭端，爭端有時不免很嚴重，終可以有一定的軌轍可循，作折衷的解決。所謂程序，本身就是國際組織的問題；國際的安全組織是體，自動或強制接受裁判國際爭端的程序是用。只要國際組織能成功，縱使其作始甚微，則目前的戰爭便不算白打了。國際合作組織又如何能成功呢？它靠兩個因素，理想主義與各國人民對和平的持久努力和熱忱，前者是歷史過程中推陳出新的動力，後者是決定各國行動的權力之根源。

英國工黨勝利的原因和意義

潘楚基

七月五日的英國下議院選舉，因為等候兵士選票的原故，直到二十六日方纔揭曉。除了十三個選舉區的結果尚須候些日子方能知道以外，在其餘六二七區中勞工黨得到了絕對的勝利。拿普選票總數說，在二千五百萬選票之中，工黨幾得了一千二百萬，保守黨只得了九百萬，自由黨二百二十餘萬。拿各黨所得議席說，則工黨之勝利尤足驚人。現在把一九三五年英國大選結果，及此次選舉前後三個時期各政黨勢力的消長情形表列如次：

	一九三五年	此次選舉前	此次選舉結果
政府派政黨	席次	席次	席次
保守黨	三八七	三五六	一九五
國家自由黨	三三	二六	一四
國家工黨	八		
國民黨	三	四	一
總計	四三一	三八六	三一〇
反對派政黨			
工黨	一五四	一六五	三九〇
自由黨	一七	一八	一一
獨立工黨	四	三	三
獨立自由黨	四	一	
超然派	四	三〇	一〇
共產黨	一	一	二
民政黨			四
總計	一八四	二二二	四一七

如上表所示，此次選舉結果，在六百四十名議席之中，工黨已得了三百九十，而保守黨僅得一百九十五，恰成了二與一的比例：以與選舉前的形式相較，恰成了「主客易位」的局面。

英國報界聯合會批評這次選舉結果，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驚人最重要的事件」。我想，這也算是英國歷史上空前的奇蹟吧！這個奇蹟，恐怕不僅非保守黨所夢想不到，也不僅非旁觀的我們所未能逆覩，甚至工黨本身恐怕也有「始願不及此」之感。

當然，就在選舉舉行以先，也有幾樁事情徵兆工黨的勝利：

(一)英國的國會照章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應當改選；但是因為當時歐戰正在緊張中，邱吉爾邀集了數黨組織聯合內閣，約定大選延期至抗戰勝利後方纔舉行。並且約定在這個期間如有議員出缺，只由該員所屬的政黨提出候選人，其他各黨不參加競選以維持各黨勢力的原狀。在這五年中，保守黨有三十幾個議員出缺，工黨遵守政治休戰諾言未曾競選。但是選民厭惡保守黨，故意投選超然分子及其他黨員，結果保守黨喪失三十一個席次，工黨增加了十一個席次。依照這個傾向，工黨本有勝利希望。

(二)著名的美國「民意測驗學社」在英國設有分社，也時常舉辦民意測驗，其關於選舉的測驗結果是工黨獲勝。

(三)紐約時報記者麥克唐努爾曾向英國駐防德國的軍隊作一測驗，其中絕對大多數人贊美邱吉爾是一個良好的戰時領袖，但是他們

不喜歡保守黨，他們希望有一個工黨政府。在九十人的測驗中，除無與趣投票的二十五人外，贊成工黨者有三十二票，贊成共產黨者有十一票，而贊成保守黨者僅有六票。麥克唐勞爾在該文的結語是：「英國軍人是在思想着——而他的思想是左傾的」。

然而在這次競選中，有一個因素是極於工黨不利的，那就是，歐戰方纔勝利結束，沒有一個不承認邱吉爾「勞苦功高」，而所有工黨的領袖，聲望都遠不及邱吉爾。紐約時報星期增刊說：「邱吉爾的把握民衆，在英國歷史上爲少有。無論他從被轟炸的倫敦貧民窟到遼遠的戰場上，他都是如同國王一樣受到民衆的熱烈歡迎。他不僅因爲做了政府領袖而獲得聲望，同時，許多人都喜歡他的常備笑容，V字手勢，大雪茄煙，奇形帽子以及其對生活的熱忱……不論工黨的政綱如何強有力，他們知道他們沒有一個領袖可以和邱吉爾比較尊嚴與聲望……爲了這個原因，在英國的最多數通訊員相信，雖則過去五年來英國有一個顯明左傾的趨勢，邱吉爾會率領他的保守黨獲得勝利」。

美國自由主義派的民族週刊也承認邱吉爾的「巨大聲望」，「邱吉爾是一個超等競選家……他是很難被擊敗的」。

選舉前數日，邱吉爾遍遊英倫各地，到處得到廣大羣衆的熱烈歡迎。他以「如果你們不選舉保守黨議員，則我無法繼續爲你們服務」相恐嚇，許多人相信這句話會很有效力，所以最穩健的觀察是說，假使保守黨不全得勝利，則兩黨所得的席次大概約略相等，而由自由黨出居「要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根深蒂固的保守黨，跟着了光輝奪目的邱吉爾金字招牌，竟被擊敗了——一敗塗地了！

我們怎樣解釋這個現象呢？

第一，這次英國大選中，成爲論爭焦點的，不是外交政策，而是戰後的內國經濟政策。再進一步說是政府管制政策還是私人自由經營兩大主張的衝突。

英國飽受了五年多的戰爭恐嚇，戰後的經濟問題是極端嚴重的。工黨認爲這些問題決非放任主義下的私人所能解決，所以他們主張國有國營燃料及動力工業，內國運輸事業（包括鐵路，公路，航空及水道運輸在內）及鋼鐵工業。他們主張把英倫銀行及若干土地收歸國有；主張國家監視獨佔事業及輔助輸出貿易；主張擴大社會安全，由國家保證人民謀得職業。關於住宅的建築，他們主張政府統制管制勞力及建築材料的價格，於以使一般平民得到住宅。

保守黨對於社會安全，雖也含混答應增進；對於煤礦工業也承認有若干改良的必要；但是要求即刻取消一切政府管制；其對於國有國營主張，更視爲「洪水猛獸」，「罪大惡極」。邱吉爾說，如果實現這類主張，英國人「連自由呼吸的權利也會被剝削了」。

然而，「戰爭是最大的社會革命」。英國在過去幾年被轟炸中，客觀上遭受了很大的物質損失，舊秩序蕩然無存，自然引起人們的新思想與新觀念；加以戰時的經濟完全是政府控制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在戰時既然有效，人們自然想到在平時亦未始不可行。至於說到如果工黨執政，就會實行秘密警察制度，剝奪人民的自由，則澳洲紐絲蘭工黨執政的結果是現成的有效反證。難怪穩健的「經濟學家」雜誌也指摘邱吉爾的這種論調爲「惡毒的語言」了。

第二，邱吉爾在競選時曾宣稱「如果工黨勝利，不僅英國會赤化，整個歐洲也會赤化」，其意思是說蘇聯在歐洲的勢力現正如日方昇，只有保守黨政府可以與之對抗；如果保守黨下台，必然會使整個歐洲受着蘇聯的支配。這種恐嚇，在以前或許有些效用。但是英國人民在這次戰後，已經不如往昔一樣，那樣視蘇聯爲洪水猛獸。第一，他們在大戰中深深感謝蘇聯的英勇抗戰，減少了他們的犧牲，拯救了他們的垂危局面（據紐約時報說，英國人的感謝蘇聯，遠過於美國人。）第二，他們在以往飽受保守黨的宣傳，說蘇聯的社會經濟制度，完全違反人性，所以建設毫無成績，不堪一擊。在這次蘇聯的英勇抗戰中，他們看出那些宣傳都是謊話；反之，他們相信假使蘇聯今日所實行的還是舊制度，那真會如同第一次大戰時一樣，「不堪一

整」。

第三，英國人民在這次大戰中，一方面改變了對蘇聯的觀感，同時則更加憎恨德國。由於憎恨德國，他們回溯到希特拉得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保守黨過去的錯誤外交政策。他們記得希特拉的重整軍備，佔領萊茵，合併奧國，發動西班牙內戰，奉行慕尼黑會議以侵吞捷克，是這次大戰的前奏；他們又記得保守黨對這些事件的一貫政策是縱容，綏靖，甚至鼓勵。固然，他們承認保守黨領導抗戰有功，但是他們不能因此而忘記當日養虎遺患，招致他們在大轟炸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禍之罪魁。所以他們對於保守黨的領導抗戰有功，至多只認爲是「將功折罪」，再以國事交託他們，則殊非所願。競選時，工黨的一句口號是「我們沒有過去的壞歷史」！這句口號是很能引人回憶與深思的。

第四，保守黨在過去既然有那麼臭的外交歷史，對於戰後的許多內國重大問題又無旗幟鮮明的解決方案，其唯一的廣告是邱吉爾本人。但是英國民衆的政治教育，已經進步到了把原則放在人品之上的程度，尊重法治超過尊重人治的程度，所以邱吉爾的金字招牌，也喪失了號召作用。

第五，英國人民誰也承認邱吉爾的雄才大略，誰也感謝他的領導抗戰，但是一般認爲他是十八世紀的政治家，他的頭腦陳舊和奔馳的二十世紀太脫了節，不足以擔任今後的艱巨。記者相信每一個英國人聽到了邱吉爾辭首相的消息，看到他搬出唐寧街十號，沒有不嘆一口氣的，但是這也如同孔明揮淚斬馬謖一樣，淚可以揮，斬還是斬。他們會衆口一辭說：「我們很崇拜這位老英雄，可惜他太不識時代了！」

第六，據上述紐約時報訪員麥克唐努爾的報告，邱吉爾之忽然辦理選舉（邱吉爾原來主張在對日戰爭勝利以後。工黨因本年初邱吉爾某次演講，有把保守黨主張作爲聯合政府的主張之企圖，認爲係破壞政治休戰協定，要求於本年秋後舉行國會選舉。邱吉爾未允，於是工黨遂退出聯合內閣。邱吉爾一面另組保守黨清一色臨時內閣，同時宣佈於七月五日大選。）引起了不少英國人的反感。他們承認邱吉爾的這個行動，在法律上是無可訾議的，他們也相信選舉不是包辦，不會舞弊，但是他們覺得在事實上，邱吉爾是在利用對歐戰爭方纔勝利，政府黨所處的優勝地位，使反對黨猝手不及應付，未免有違「公平競勝」的原則。抱這種觀念的人都反而因此投選工黨了。去年英國的大選，社威廉刀殺法限制兵士投票，但是最後能夠投票的四百多萬兵士以及其他兵士的家屬都因此而大都投選羅斯福。「不平則鳴」，大概是人性吧。

＊　＊　＊　＊

這次英國大選的結果，於國際，於本國都有很重要的意義，現在分述其要點如次：

（甲）就國際方面說：

（一）對日政策的澈底　這次保守黨及工黨都以澈底擊敗日本爲政綱，邱吉爾於選舉揭曉後宣稱下野唯一的憾事是未能完成對日的勝利，阿特里宣稱上台的「第一件重要工作爲擊敗日本」，工黨執行委員會主席拉斯基教授也宣稱「工黨政府雖有許多的內國設施亟待進行，但首要是履行英國對遠東的最高義務」，所以英國政權的更替，於其在遠東的對日政策似乎不會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保守黨政府以前一向對日勾搭，注意到邱吉爾對歐的政策是維持所有反動的王室，並因此而得有「收集王室的古董商」之稱，便知今後聯合國中如有主張維持日本天皇的地位，使他們仍成爲日本的最高統治者，恐怕第一個舉手贊成的，就是邱吉爾。工黨勝利後，一再宣稱「不支持腐舊的政治組織」，「不贊助獨裁的君主制度」，就這一點說，工黨的勝利，會使英國的對日政策更爲澈底，更使人放心。

（二）英蘇關係的增進　固然保守黨現時也主張對蘇親善，而且英蘇二十年同盟就是邱吉爾和艾登的傑作；但是我們知道：第一，保守黨過去的反蘇政策，未能使蘇聯全然忘懷，因而時常招致許多不必要的磨擦。第二，大部份保守黨人的心坎深處，還是認爲英蘇兩國不能

並立；只要有適當的機會，他們仍然會積極進行反蘇活動。第三，邱吉爾在這次選舉中毒罵共產主義，雖則他的目的是對內，但是因為過沒有在「共產主義」之上冠以「英國的」字樣，蘇聯聽着當然有點覺得刺耳。第四，假使英國維持一個內心裏反蘇的政府，蘇聯對於英國總不免要時存戒心。工黨對於蘇聯固然並不怎樣接近，以前卻常與共產黨發生激烈衝突，（克里勃斯爵士以前因為主張組織兩黨的「聯合陣線」而被工黨開除，至最近始恢復黨籍），但是他們不是站在「藍血貴族的立場反蘇，其程度也遠不如那麼激烈，現在起而掌握政權，其能增進英蘇邦交，是毫無疑義的。工黨執委會主席，拉斯基教授曾宣稱：「勞工黨的勝利會真正能夠增進對蘇友誼，」絕對不是誇口。

（三）促進各國民主運動的發展　工黨上台後，有些人以為英國的外交政策當大有變動，但是深知道英國人性情的人，並不是完全這樣想。蓋英國人遇有與大英帝國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問題，常不肯輕輕放過，在保守黨如是，在工黨如是，在共產黨恐亦如是。加之，英國人的行動，既以「遲緩但尚切實」著名，故我們要想工黨上台後，在有許多內政和外交方面，就可採遽急的行動，便非感到失望不可。有人以為工黨上台就等於佛朗哥內閣的末日，這種看法，亦未嘗不是。蓋工黨此次在英國選舉中的大勝利與其所以能夠得到這樣大勝利的原因，實無形中加許多反動勢力以一種重大的打擊，給各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以一種重大的鼓勵。

（四）對殖民地有一種比較進步的改革　邱吉爾曾經宣稱，他做首相，「不是為着主持了結大英帝國」，所以各殖民地想要在他的底下獲得解放，那是很難的。開羅會議時，羅斯福總統曾勸他把香港交還中國，他絕對拒絕，就是一個顯例。工黨對殖民地的態度，雖則是一向比較保守黨好些，但是我們要想工黨能使各殖民地獲得解放，那就大錯特錯。在這次競選中，紐約時報認為工黨的最大弱點，是選民懼怕他們的理想主義會把大英帝國斷送。該報這種揣測未免過慮，英國選民對於工黨的殖民政策是很放心的。印度國民大會首領尼赫魯論及印度問題時，就勸印度人不要信賴工黨，說工黨和保守黨都是一邱之貉。惟平心而論，工黨中思想比較開明的人既比保守黨為多，所以工黨今後對殖民所採的政策，雖不能冀其有徹底的變更，但是作成一種比較進步的改革，或不至全無希望罷！

（乙）就英國本國說：

（一）國營事業的擴展　工黨這次競選政綱中，主張國有國營英國的煤礦，鋼鐵工業，內國交通系統，英倫銀行以及若干土地。大選揭曉後，勞工黨領袖及新首相阿特里氏宣稱該黨「將以堅定之態度實現政綱中之許諾，以建立社會主義之不列顛」。當我們客觀分析他們的政綱時，我們知道該黨最後目標，絕對不是實現為蘇聯建國目標的共產主義，甚至以與蘇聯現行包羅萬象的國有國營之範圍相比較，也相去很遠；所以所謂「社會主義之不列顛」，實際上還不過是一句漂亮口號，工黨的目的只是國有國營若干事業而已；但就是這少數幾種事業的國有國營，也會很大地影響英國的經濟結構。至於英國一般人民的享受之因此而提高，社會安全之因此而增進，那是必然的。拉斯基教授說工黨的施政步驟，首先為國營英倫銀行，次為煤礦，再次為交通業，鋼鐵工業則因不願影響戰事之故，定為最後國營。他相信由於實現這個綱領，「一是英國普通人的世紀之開始」。「由於實現四項自由，我們希望美國人視此為我們對羅斯福所建的紀念碑。」

（二）資產階級的衰落　在別的國家，左派政黨上台並不一定就等於資產階級的永遠衰落，但是英國這次選舉，確實有這樣一個意義。英國的資本主義建基於國際貿易及海外投資。關於海外投資一項，據去年英國政府所發表的白皮書報告，為了數年來支付戰費，大量出售的結果，實際上已幾等於零。所以這些靠剪海外股票利息券，不勞而食的「藍血」貴族，久已成為「外強中乾」的局面。他們的希望是繼續控制英國內部的經濟機構，逐漸恢復輸出貿易，以至於恢復海外投資。現在工黨上台，決定國有國營上述重要經濟事業，就是其他仍可

私人經營的企業，大概也會多受政府的統制或管理；譬如就建築事業一項說，工黨政府決不會准許建築公司以其全部人力與物資專門建築少數人享受的高樓大廈，而會強制他們依着適當計劃，側重建築平民大衆的經濟住房。阿特里說：「工黨決不容許少數的特權者，繼續如以往許多世紀一樣，剝削社會的大衆。」所以英國的資產階級想要恢復戰前的經濟獨佔勢力與特殊優越地位，會是很難的。總之，在對外這麼一場大消耗戰爭及內國這樣一場不流血的革命雙重事變之下，「屋漏更遭連夜雨」，他們業已受了致命傷。除非在這五年中，工黨執政有很大的過失（事實上是不會的，因為工黨領袖在聯合政府中業已充分表現辦事能力與人格完整），就在五年以後的選舉，他們也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

(三)普通人地位的提高　根據上述第二個趨勢而來的會是普通人地位的提高。所謂提高，並不僅指第一個趨勢「國營事業擴展」下的經濟地位說，就在社會地位方面，也會有大大的提高。我們知道英國雖然是民主主義的發祥地，但是英國的統治階級，一向擁有特殊的地位；他們有特殊的學校（普通人不得其門而入），訓練他們怎樣穿戴峨冠博服，怎樣規行矩步……一句語，怎樣學習叔孫通所主張的「朝儀」，以便在大衆前表示他們是天生的統治者。

這一次（在已發表的閣員中，有七人係礦工出身，一人係印刷工出身，一人係汽車夫出身）工黨首次打破歷史紀錄，在國會中擁有幾及三分之二的議席，全部閣員都會以沒有「藍血」的普通人充當，這對於英國社會已經發生很大的影響。其次，勞工黨的政綱擬定改良英國的教育制度，掃除少數人獨享教育特權的弊病，所以今後的英國，會是大家的教育水準提高，而不會再專門訓練一個統治階級。

* * * * *

我們中國人在英國這次選舉揭曉後，也應當有下列三個最重要的認識：

第一，一國的外交應與一國的國策相配合，而一國的國策，一方面應有獨立的立場，一方面又應明瞭世界的大勢而作某種順應。合縱連橫和遠交近攻等外交手段，在今日都已早不適用；和各國相見以誠，熱忱合作，以求世界和平的奠立，實為今後外交應遵循的路線。其次在舊金山會議中，中國代表團的態度也顯然表示中國有獨立自主的外交，並不是某國的應聲蟲或傀儡。（在准許阿根廷加入一案中，中國並沒有跟着美國投票；在拒絕勞工代表充當永久觀察員一案中，美國雖然儘力運動中國代表附和，可是中國還是站在蘇聯捷克等國方面，投了反對美國主張的票。）而宋院長的訪蘇更增進了兩國的友誼不少。在英國工黨勝利以後，我們的國策尤其應當單純建基於英美與蘇聯必然繼續合作的大前提上面，一切希望它們分裂的幻想應當全部拋棄。

第二，本文上面引述紐約時報的消息，說邱吉爾忽然辦理選舉，想賴領導英國抗戰勝利的聲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擊敗政敵，這在法律上雖無問題，但英國許多選民卻批評其欠缺公允，反而投選工黨。中國人民的政治教育程度雖然不及英國人，但是「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今後我們的選舉，必然要辦得非常光明正大，參加的各救國政黨有極公平的待遇，方纔根本有異於民國初年北洋軍閥下的選舉，方纔能夠得到國人的心悅誠服。本年七月十九日國民參政會議決：「未召開國民大會以前，政府宜用各種政治方法以達到全國團結及統一；保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組織政黨自由，實行保護人權律，完成自由中國各省人民代表機關以期，鞏固地方自治之基礎。」上述議決案是極有眼光的。在另外一方面，英國政黨之未經武力革命而獲得政權，也是極值得我們效法的。只要中國真正實行民主政治，任何政黨有憑選舉票以獲得政權的機會，則與其由流血而實現自己的主張，不如由不流血而實現自己的主張。因為流血畢竟是痛苦的啊！

第三，思想是社會革命的動力。戰後的歐洲在思想上已在一致左傾，左傾的程度當然因各國國情的殊異而有不同，但是其為左傾則

一。工黨勝利以後，美國觀察界已在研究美國民衆是否會左傾一問題，美國大政客（前郵務局長）發利氏且斷定美國議員，今後在激烈思想方面而必須與英國議員競爭。這左傾的思想無疑也會傳播到舊秩序幾全被戰事摧毀或動搖的遠東去。

就中國客觀環境說，中國在今日應立使各政黨憑選舉票以獲得政權，將各黨所轄的軍隊改歸中央政府統率，而不能各置所謂「黨軍」，致國家陷於割據之局。國家的行政有了統一，然後方可言建設，以謀經濟復興。中國在今日，不僅不能實現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甚且也不能實現一切國有的社會主義，就是中國共產黨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中國多年來就需要實現「耕者有其田」，需要實現「發展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需要實現「改良農工生活，提高農工地位」；到了今日，這些要求只有更迫切，更堅決，我們再也不能單純研究，宣傳，或列入議案了。

總之，今日眞須「迎頭趕上去」；否則雷電奔馳的大時代不會再從容等候我們蹣跚其行了，我們會被它的巨輪壓成粉碎！可怕啊！睡在火山上的我們醒來吧！

中國人與英國人

儲安平

一

著者近撰「英國采風錄」一書，將由商務出版。該書所敍述者爲該書著者所知之英國，而該書之著者則爲中國之臣民。以一個中國人敍述英國事，當他行文之際，他之常常不能自已地將他所屬的國家和他所敍述的國家作種種比較，亦爲人情之常。但這種比較也僅是片斷而非全盤的，全盤而有系統的比較固有待於專書，而此非他目前學力之所能逮。

然而縱然是片斷的感觸，也究不能不有感觸的中心。著者常思及兩項問題：第一、中英兩國人民的性格，他們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無相同的相似之處？第二、多年以來，英國爲一強國，而中國爲一弱國，一強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就後者論，一國強弱的原因誠非一端，但英國的政治社會究爲英國人的政治社會，而中國的政治社會又爲中國人的政治社會，一個國家的興衰隆替，究不能說和這一國人民的性格習氣一無關係；故後一個問題的答案仍可於前一個問題中得之，而著者之感觸因之亦得納爲一點，即中英兩國人民的性格及社會的風氣究竟有無異同，其間得失又爲如何？

二

著者初初感覺中英兩國的民性及社會民氣，幾乎無一相似。但若稍加思索，這個答案顯然有欠謹愼。當我們說到英國人時，我們便會想到那爲世人盛稱的「英吉利典型」——那些英吉利典型的人民。但當我們論及中國人，論述他們的性格，生活及事業時，我們便不得不先辨別我們所論述的中國人究是那一類中國人。現代的中國人實已失去了他們共有的同一的民族典型。在今日的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至少可以大別爲兩類，一爲農民，一爲知識份子。這兩類中國人在性格上實大相逕庭。

英人性格中最主要的一點是務實重行。英人不重視抽象的理論，很少幻想，不尙辭令及一切浮面的虛文。政治家策劃國家大事，曾不稍涉遐思，他們密切注視現實。他們發言率皆明淺樸實，而其決策和

意見總是切合實際，力避好高騖遠。他們及一般官吏，總是集中精力於其職份內的工作，很少參加無關的公共集會，很少發表大而無當的演說。社會上華而不實的會議本就不多，會議而動輒發表冗長的宣言者，尤不多見。政府官員就職或新成立一個機關，不一定有隆重的儀式；人民對於一個官吏或一個機關的期望是他實際的工作而非他動人的辭令或輝煌的典禮。政府各部門總是盡量的在沉默中埋頭工作，而其工作亦都能按照計劃實事求是。在一般社會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英人也都實實在在。英人治學大都嚴謹而刻實，他們對於美國人愛編教科書的態度，總不敢苟同。英人經營事業大都脚踏實地，不誇大，不游移，不僥倖，並十分注意工作的效率。他們對於一件事業，孜孜不倦，有始有終，總要得到一個結果，決不半途中廢。在人與人之間的往還中，也很少用巧佞的辭令。英人通信總是直截了當地說自己所要說的話。見面接洽事務，也不先作寒暄，他們簡單扼要，對於數目則力求準確。以舌及權術為資本的職業政客在英國的土壤上殊不易滋生。大多數人都討厭抽象的理論，認無裨益的空談為一種浪費。他們喜歡行動，他們最大的愉快是從實行中實現希望，獲得成功。英人因秉性沉默寡言，他們遂得將其精力集中於行動。英人這種務實重行的精神使整個英國社會蓬勃有朝氣，使社會各階層各方面，都能結結實實，熱力充沛，潛有無限堅韌的力量。在承平時，他們虎虎有生氣；在危難時，他們能力抗狂瀾而不為狂瀾所撼。

著者以為中國的農民也頗務實重行，他們也是不長於抽象的理論的。在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大都脚踏實地，實事求是。他們有時雖因貧窮無告，不能自已地引起一些僥倖之心，但這僅是絕望中的愚念，初非運用想像的結果。他們生活裏的唯一要義是工作。農夫的耕耘，農婦的紡織，手藝工人的手藝，他們固無分寒暑，整年地自早至晚，孜孜不息。他們稱做工為「做活」或「做生活」，他們生活中除工作之外實無其他。中國古人本有勤儉起家之訓，儉為節流，勤為開源；開源之道，唯有茹苦耐勞，勤奮做事。中國農夫的勤勞是世人公認的。無論是大風大雨或者炎日當天，他們做活時從無畏縮懶惰之態。他們在施肥，犂田，插秧，戽水時，無不出心出力，與英人之在工作時既出全部精力(energy)復出全部能力(capacity)，實堪媲美。在大旱或大水時，他們誠不免有打醮求神之事，人之在絕望中轉而乞求於天，亦為可恕之情理，但他們也並不因此即袖手坐待神助之來臨，倘有努力之道，他們固無不盡其最大的努力。鄉村中的公共事務如造橋、築路、築壩、填堰，以及禦盜、防匪、打醮、演戲、敬神、賽會等，也都能出錢出力，一呼百應。所以在中國鄉村中，亦尚有說做即做的精神。鄉村中人情來往，送猪送布，也都能實實在在，不像城市中人送幾個空紙包，送者受者還要扭扭揑揑，推來推去。中國大多數的老百姓在他們的生活中，都務勞務實，克勤克儉。三家村上的長舌巧婦，究為偶有的點綴，而鄉紳先生喜歡在鎮上的茶館喝一杯清茶，也決不使他家裏的莊稼人覺得喝茶聊天較下田做活為逍遙；何況這些鄉紳上茶館也非一無正經，他們判斷曲直，介紹婚姻，接洽善舉，也正為農村社會中不可或缺之事。中國一般老百姓的物質主義也殊與英人相去無幾，他們的娛樂生活總是離不開有實體的東西，在農餘的陰曆年節中，他們演戲、舞燈、賭博、以及打鑼打鼓，固無一事要用抽象的思索力。

然而這種務實重行的性格，在中國知識階級的性格中，極其缺之；至少就今日我們所見者論是如此。今日中國知識階級最大的特點即為醉心於抽象的理論而好表面的虛文。中國知識階級之好表面的虛文，正如英人之好實際的行動，中國知識階級之不重視行動，又正如英人之不重視抽象的理論。今日中國政治上的人物好發表演說，並喜歡演說與他職務無關及與他所學無關的題目，而其演說常空泛不着一物，冗長而無一字足以震人的心弦。官吏就職或新機關成立，例有隆重的儀式，這種典禮既費人精力而又無甚意義，但竟不可省。新官總不忘記在就職時陳述他所抱持的理想及計劃。理想與計劃誠屬必要，但倘未發現的諸言固毫無任何實質上的價值；不幸無實際價值的諸言

又充斥於中國的新聞紙上。帶有全國性的會議閉會時總要發表宣言，起草宣言的人參考已往所發的宣言時，又何嘗不覺得那些舊宣言大可拿來再發表一下？但總要於變換字句以免文章的雷同後，再發表一篇。政治上的設施舉措，遇有改變時，必有一套頭頭是道的理由，實則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真正的理由。有些地方長官對於他本省的施政，定出一套理論，並繪成掛圖，張掛全省，其所用的名詞以及彼此相互關係，其系統的精密週詳，實充分表現了中國人的智慧，但實際施政常與掛圖所標榜者相去甚遠，有時甚至竟如風馬牛之毫不相關。無論什麼集會，討論章程或條文時，則雖一字一句，亦會引起熱烈的辯論，經久而無結果。報紙上的新聞記載或讀者投書有涉及機關時，那個機關總要備函更正，詳述如何如何與事實不符，但對於投書中所提的建議與批評，則缺乏研究的興趣。甚至強敵壓境，討論協助動員時，據報紙記載：「到會者均感情激動，以致發言盈庭而無結論。」至於一般私人生活之陷入於空浮而不知自拔者，更處處皆是。中國人寫信的那套虛文俗式成爲了一種特殊的文體，其昇華則爲「八行」。無論寫信或面談，總要先兜很大的圈子，眞正的事情放在最後才說。前方大捷常引起詩人墨客的詩興，使一個最最具有行動性的事實，在中國竟會成了一種最最缺乏行動的呻吟的材料！平心言之，今日中國人（以下言中國人係指知識階級）中又何嘗沒有做實際工作的人，否則我們這次戰爭中種種偉大的艱難的工程和事業焉有今日之成就？他們雖能出汗出力埋頭工作。但我們從大體着眼，看今日中國社會的通病，究不能不承認大多數國人之好高而不切實際，重虛文而不重實質，喜放言而不埋頭實行，以致我們有多少事，唱了多年而無結果，或僅有外表而無實際，化費了許多金錢，時間，精力，而與實際的民生一無裨益。中國人的抽象能力確是豐富，可惜中國人的生命力在抽象的理論上耗費得太多了，以致在實行時，使不免畏葸軟弱，缺乏力量。其結果，遂使我們的社會上祇是充滿了各種理論、口號、標語、宣言、計劃、報告、教規、條文、守則、演說、座談等等。單從表面上看，我們的社會也是蓬蓬勃勃的，但一究實際，祇是一股空氣。我們有時也確能振奮一時，但這種一時的振奮常是發乎感情而非出於理知，發於感情的祇是「衝動」而非「行動」，「衝動」祇能一時，「行動」未能持久。我們社會上各種制度和各種事業之常常更弦改張，也可歸之於中國人抽象能力之太強和感情之易於衝動。做事的人已較放言的人爲少，再加上制度的時時更改，使社會的基礎益更變得游蕩飄浮而不着實。中國人的生活也總不夠緊張，不夠認眞，不夠嚴肅。譬如在這次戰爭中，除了一小部分如與軍事有關的工程、工礦、生產的人員及在前線實際作戰的部隊外，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依然是非常鬆弛的；戰爭僅影響了他們生活的程度，而未嘗激動起他們生活的熱忱。一般機關裏的辦事效率也依然如故，甚至有較戰前還鬆懈者。茲舉一事言之：有一個時期在後方許多城市裏，地方政府常規定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四時爲疏散時間，不論有無警報，迫令人民疏散：強迫商人閉戶，強迫居民出城，禁止鄉人入城。在這時間中，全城罷市罷課罷工，整個社會陷於停頓的狀態。（許多人在無聊之餘，於是大打麻雀，以發洩其精力。）這種政策，美其名曰避免犧牲。假如全中國都是這樣「避免犧牲」，則我們的國家社會，無需外敵進攻，也會自趨崩潰！我們看英人，當一九四〇年希特勒對英倫發動空前的空中閃電戰時，倫敦的人民依然行其所行，無所畏懼。卽使在警報中，工人依然做工，百貨公司依然交易，公共汽車 電車、出租汽車依然在街中行駛，醫生依然看病，機關職員依然辦公；直到敵機已臨上空時，始入地下室躲避。Vera Brittain「在英倫前線」一書裏有一段描寫倫敦的火車，大足代表英人在戰爭中的士氣：「從倫敦開出去的列車，並沒有受警報的阻礙，票房依舊售票，乘客也依舊安坐在車廂裏……就在高射砲聲隆隆不絕，戰鬬機正在車站上空盤旋之際，開車的信號笛仍照常吹着，車守照常揚他的信號旗，而駛往海岸的列車也照常開出去……這個火車站，也像英倫，也像被轟炸的民衆一般，是決不受威脅的，決不聽其業務停頓的。」英國在「不列顛之戰」及「倫敦之戰」裏竟能

挺得住，一大半應歸功於英人，特別是倫敦人的不屈不撓。著者深信，本文的讀者當將這種情形和我們自己的一比，必不勝其慚愧。同時亦必能同意：假如我們平時能實事求是，行重於言的話，我們也許可以避免這次的浩刼，至少必可減少我們這次所受的災難的程度。

中國知識階級之重言不重行，好虛文而不好實質，是中國社會的可怕的慢性肺結核症。幸而中國的農民務勞務實，克勤克儉，又幸而克勤克儉的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假如沒有他們的勤勞汗血，我們眞不知我們的國家，更要貧窮虛弱到如何程度。但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在國家的治理及國家的進步上，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而統治的權力則操之於華而不實的知識階級手掌之中。賴有這樣的好農民，今日中國雖虛萎衰弱而尙未解體，正因中國士大夫不像農民那樣務實重行，所以中國社會總不能弄得結結實實，成爲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

三

公共生活中的事業，依賴人人的羣策羣力。在簡單的原始的社會中，以一二人的力量即可舉辦一件公共事務，而獨善其身的人也可「一簞食一瓢飲」地過他獨善的生活。但今則時代改變，近代社會的內容越來越複雜，人與人之間的組織及合作，在公共生活公共幸福中所佔的地位，也就越來越重要。有組織能力合作能力的社會，必定征服無組織能力合作能力的社會，近代的歷史擺在我們面前，事實昭彰，不容否認。但「組織」與「合作」却又爲中英兩國民性的一大異點，亦卽兩國一弱一強的另一原因。重行的英人有高度的合作能力及組織能力，而其主要原因則應歸之於英人的能自我約束(self control)。公共事業不可避免地要經過集體的行動，而在集體生活集體行動中，必須人人能自我約束。英人都非常眞實，都能盡其本份，都有強烈的服務感，並有自省的習慣，所以他們在團體中都能成爲良好的份子，各盡其職，各盡其能，他們不需要他人的監督，他們也不甚有以個人爲中心的自私意識。同時，英人不長於抽象能力，缺乏抽象能力的英人旣重行而不重理論，故人人能以團體爲重，而願犧牲他一己的意見。因爲英人缺乏抽象能力，所以他們也缺乏妒忌的心理；妒忌實爲公共事業的最大的敵人。英人重行動，祇要對方也是行動之人 (man of action)，彼此卽可組織起來。他們的人生觀念大體相同，他們的做事傳統也大體相同，再加上人人能約束自己的意志和感情，所以做事易於一致。行動一致則效率自然增高，效率高則事業自然蓬勃而能成功發展。

不重行的中國人組織和合作的能力都非常缺乏。中國人缺乏合作能力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抽象能力太強。每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和辦法，而每人的理想和辦法又都是那樣精細，以致在團體行動中，意見總不易一致。在公共的集會中，總是辯論熱烈，有時且不免發生劇烈的爭執。人人都要貫澈他的意見，人人都不願犧牲或放棄他全部或一部分的意見。意見上的爭執又常常影響到私人的情緒，以致在行動時不能獲得和諧的精神和一致的步驟。在大多數的情形下，爭執的結果使一部分人消極退出，退出的人且會作反對和消極的行爲。有者則討論多時而一無結果，使最初的熱情都烟消雲散。抽象能力豐富的另一結果是妒忌心理的尖銳，人人不願他人成功而樂見其失敗，領袖慾強烈的人更不甘接受他人的指揮，因此在團體生活中不是明爭就是暗鬪，這些都易使公共事業受到致命的傷害而常中途夭折。

中國人不能合作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人無論在做人做事各方面都缺乏一種同一的傳統 (tradition)。包爾溫嘗言：「一律是一件壞東西」 (Uniformity is a bad thing)，實則英人在做人做事的基本習慣上，差不多是全國一致的。工業社會中的英人，人人都是積極的，前進的，現實的。說話誠實，做事負責，遵守時間，講求效率，尊重他人的自由，生活富有規律等等做人做事的基本習慣，是全國普遍的。中國則完全缺乏這種情形。中國人有些做人很認眞，有些做人很隨便。認眞做人的人，他的生活態度一定很嚴肅，不苟且；隨隨便便

的人則有酒且醉，得過且過。做人的精神根本不同，做事的方式自然大相逕庭。因之有些人講信義，守諾言，重效率，有熱忱，又有些人則有諾不守，有借不復，約時不到，借錢不還，應做的事情一天一天的且推且過，一切馬馬虎虎。做人做事的根本精神沒有最低限度的同一標準，要彼此合作共事，實極苦痛，而事業之不易順利進行，亦勢有必然。中國人的私生活也極不一致；私生活本來無須求其一致，假如人類在私生活上尚不能自由自在，則人生更將缺少樂趣。但在英國，第一，至少在工作、休息、睡眠、飲食等一般生活上有大體相同的習慣；第二，假如參加團體生活時，各人必能約束個人的私人習慣而適合團體的公共習慣。在中國，很少人在公共生活中能約束他個人的意見，約束他個人的感情，約束他個人的習慣與嗜好，想到自己以外的他人及團體。所以在中國，一切關於公共生活的組合如公共食堂，公共宿舍，以及公共廁所等，最難管理，最難得到圓滿的成績。你要睡眠，他偏唱戲，你愛清潔，他偏不顧公共衞生。中國人無論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盡量放縱他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而毫不知有所約束。中國人祇知一己而不知他人，祇知獨行其是而不知與他人協力合作，所以中國的社會散漫而不凝結，鬆弛而不嚴密，祇有一時的集合而不易有經久的組織，祇有小規模的經營而不易樹立大規模的企業，人民的能力總是分散而不易集中，不能發揮出龐大的威力。

在中英兩國，都有幾句諺語，這幾句話實可充分表示兩國的民性。英人有言：

一個英國人：一個獃子，
兩個英國人：一場足球，
三個英國人：一個不列顛帝國。

中國的諺語則爲：

一個和尚挑水吃，
兩個和尚擡水吃，
三個和尚沒水吃。

四

中英兩國民性的另一個不同是理性在兩國社會生活中所佔的地位的異殊。理性是英人政治生活及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唯一的出發點，若沒有英人那種重視理性的性格，則今日之英人固無今日之英國，而今日之英國社會亦必爲另一種社會。

英人重視理性的結果，乃有英國的法治。英國的法治，一方面是自君王以至庶民，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無一人得自處於法律以外；另一方面則官吏及人民都須依法行事，重公法而不重私情。就前者言，既自君王以至庶民，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故官吏並無特殊的地位，也無法律以外的權力。官吏的權力由法律所賦予，官吏行使權力而超出法律所賦予的範圍，即爲濫用權力，濫用權力爲違法的行爲，違法的行爲即應受法律的制裁。官吏既無特殊的地位，故官吏違法時，亦受普通法律的制裁而由普通法院受理，一如平民所受之待遇；自首相以至巡警，法律法院對他們固無所寬假。就後者言，官吏及人民既須依法行事，故官吏行事固不能越出法律，人民的行爲也不能違犯法律。這種守法的精神發揮到了極點，於是無論在政治生活或社會生活中，處處是大公無私，循規蹈矩。官吏既不能濫施權力，故人民亦無須畏懼官吏。官吏的進退升降既悉有序，下級官吏祇要無失職違法之事，他們亦即無須趨奉其上峯。人才的選拔既不復依賴私人的援引，而社會各種事務又照章辦理，則大家亦即無須鑽營奔走，託人干求。人人可以節省許多精力，社會可以減少許多不平。法律原是經過審愼思慮而製訂的。（所謂「法律不外人情」，指此而言，非謂法律以外另有人情。）但是不僅法律的本身是理性的產物，而要服從法律遵守法律，尤須出之理性。唯有訴諸理性，社會始能在合法的軌道中循序前進。

英人重視理性的另一結果是一切糾紛用理性來解決而不訴諸武力。英國的政黨制度就是一種合理的政治競爭的制度，用公開的方式，

使政治上不同的意見都能得到他們合理的排洩的軌道；政見不同的各方面，不訴諸武力而訴諸人民的裁判：為人民所擁戴者，上台執政，實現其政策，不為人民所擁戴者，掛冠而去，以順民意。英國歷史上純粹感情用事之事，除一六四九年之查利一世被弒外，幾不多見；而用流血及武力來解決政治上之衝突者，亦較他國為獨少。民主政治本就是一種理性政治。假如人民不善用其理性，他們不會選出好議員，假如議員不善用理性，他們不會組織成健全的國會，假如人民及議員都不能善用其理性，則國家不能產生好的首相及健全的內閣。在君主時代，祇要有一個人（君主）開明講理，也會政治清明，民安國治。但在民主時代，則非人人或大多數人能善用其理性不可，否則即難望有合理的上軌道的政治。依麗薩伯女王雖然在感情上敵視其大臣塞西爾爵士(Sir William Cecil)，但關於國家大事，則又無不聽從其計。維多利亞女王一生中，雖然憎惡某些大臣，但為了國家，竟不能不請他們出而為相；她和她的首相之間，常常發生爭執，但當她的抗議堅不為其首相所接受時，她也不勉強他接受，因為英王在憲法上的權利祇止於商議與警告，而最後的決定，其權固操之於首相。愛德華八世既不顧有負其鍾愛之女子，亦即唯有自動遜位，以解決因其婚姻問題而引起的憲政危機。近代英國的保守黨所以能自存於民主的新世界中，實得力於狄士累利(Disraeli)的激勵，狄氏曾變易了保守黨的性質，「他要上等階級誠實地接受國內已變的狀況，要他們不再因特權的失却而坐在家中發氣，要他們走入通街大道，以愛國的熱忱及帝國的利益來博得民衆的歸從。」英人愛稱一六八八年的革命為「光榮革命」(The Glorius Revolution)者，即因不經流血、內戰、屠殺、放逐或報復，即能變換一個朝代，並使多年不能解決的宗教的及政治的糾紛，竟得基於大衆的同意而得到圓滿的解決，而革命後的最初幾月中，「托立」「輝格」(Tory, Whig) 兩黨，亦無不平心氣和，各自讓步，各棄宿怨，竭誠合作，以渡過當時外有法蘭西之戰，內有愛爾蘭之失及蘇格蘭之分裂的危急存亡的局面。大至宮庭國事，小至民間糾紛，英人固無一不訴諸理性，以覓取最好最合理的解決。著者在英時嘗目覩兩車相撞，兩車的車主很安靜地下車檢視自己的車身，遠處的警察也走了過來，抄錄汽車的照會號碼，肇事人的雙方都不出一句齟語，又各分頭開車而去，靜待一二日後警廳的傳審。賴有英人這種理性的修養，英人社會始得和平安定，而各種事業亦得蒸蒸日上。

並世各國，論社會的公道，固無有逾於英國者，而公道(Fair play)則純為理性的產物。英人愛好直道(love of justice)，是非公私，分明清楚。有才有智有德之士，總有人頌揚他，愛戴他，鼓勵他，酬勞他，而出賣公共利益的人，則必為衆口所不容。所以有能力抱負的人，不須短氣，祇要在正道上努力奮鬪，不怕不能成功，而且成功之人也無須中途引退，他可效忠國家，死而後已；而想作惡的人總不敢再稍存作惡之念。英人之公道固不祇止於有是非，英人的公道精神的最高表現在他們之能容忍異己，尊重對方。賴有這種精神，英人才能保持他們千百年來的種種政治的及公民的自由；賴有這種精神，在政治上才能完成兩黨制度，在社會上才能和衷共濟，融融洽洽。為英人所最喜愛的拳擊(boxing)，在以力勝之中固帶有以德勝的原則，在各種運動比賽中，無不須遵守一定的規則，而勝者敗者亦恆能於比賽畢事後握手互敬。一八三三年國會通過「奴隸解放法案」(Ac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Slaves)，廢止各殖民地的奴隸制度時，且自動以二千萬鎊之巨款津貼奴主，以彌補其放奴的損失。在當時為英人天字第一號敵人之拿破崙，被英人拘於厄爾巴島(Elba)時，竟有成千成萬的英人在倫敦示威，抗議以這樣一種待遇加之一個赫赫一世的大英雄，以致百日之戰後，英人重將拿翁困居於聖赫倫島(St. Helena)時，竟不得不保守祕密而不敢宣爲人民所知。蒙哥馬利將軍在戰地公開對德國隆美爾將軍及倫斯德特將軍表示傾服，他盛稱倫斯德特的知兵善將，甚至說：「我常常想，假如我能夠置身在倫斯德特將軍頭腦中一兩分鐘，我也將引爲終生幸事。」尼赫魯有一本著作，大不利於英國，然英國的出版家仍爲之出版，英政府亦未加以何種干

涉。近兩三百年來，英國政府在其外交殖民政策中，殊不乏有失自尊的行爲，但是也祗有英人有不直自己的政府而爲被欺侮的人民申冤的雅度。這種公道的精神，實爲人類生活中可以大書一筆之事。這樣一個社會必然充滿了友愛、融和、直道及光明，而一切霸道邪道曲道都在正道的氛圍中不易抬頭。

回觀中國，中國人非無理性，但中國人的理性，至少在今日是如此，大都僅見之於文字及辭令之中，在實際的政治生活及社會生活中，理性的痕跡極其微弱。有一個高級黨政的負負人曾親對著者說，人世間有三件事沒有理性，其一爲戀愛，其二爲宗教，其三爲政治。這種從事政治而可以不講理性的論調，至少可以代表目前中國一部分人的作風。多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實以強力爲核心。我們即使不能說沒有一個中國的政府是建築於人民出於衷心的支持以上的，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中國，當政者若無足夠的武力，其政權必不易穩定存在。依賴強力而不依賴理性來解決人與人之間人與團體之間及團體與團體之間的衝突，在中國社會上實到處皆是。一般說來，兵士對於老百姓的態度總是很強橫的。他打了老百姓，他還要傲然說：「打了你又怎麼樣？」我們在郵局寄信，銀行取款，車站買票，海關報單，去衙門接洽公事，在水陸碼頭受軍警的檢查……我們除默默地忍受他們的蔑視，沒有禮貌，欺侮，侮辱，甚至虐待外，我們竟無法可想。因爲普通的無告的人民之無法對抗他們，其理由正如一個單身漢之不能同時抵禦十人或二十人同樣簡單。團體與團體之間的衝突也悉憑彼此勢力的大小，所以在中國，軍人及軍隊到處都是有勢有力。中國內戰之多，實開現代國家之最高紀錄，而眞正的「政黨政治」在最近將來的中國也似乎很少希望。無能力使用刀劍以解決衝突者，至少也必拍桌大罵；受過高等教育的或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在衝突中所表現的解決衝突的態度，殆無太大的不同。

中國人不以理性而以感情獨馭一切的另一個現象即爲好講私情。英人的社會以法爲中心，中國人的社會以人爲中心，大如國家的制度，常常以一人爲轉移，小至買一張車票，也視有無人事關係而定買到之先後或有無。中國實是一個人情的社會，無論大事小事，苟有人的關係，總會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所以即使是一封八行或一張名片，在中國社會上無不有它的效用。在中國，既無事不講人事關係，能鑽營的人總要比不能鑽營的人多佔些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際、請客、聯絡、接納、奔走、趨奉上用功夫，大部分時間耗費於應付人事，而份內的事務反無充分的精力去照顧。一般說來，顧私總不免要損公，所以我們的社會遂到處充滿着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一個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會，自然是一個不健全的病態的社會。

人人重私的結果是社會無是非，無公道。利害已成爲今日中國社會判別是非的最大出發點；是非而跟着利害走，則所謂是非者亦早就不是眞是非。在中國社會上，越是有才氣的人，越容易見忌招禍；事業越成功，所受的災難風險越大，有時竟會使生命的安全也將因事業的發展而終至不保。至於尊重異己的雅度，在中國更缺乏，一個重私情重利害而缺乏理性的人，焉能希望他能容納與他相反的敵人！中國社會從不積極鼓勵人繼續向善，所以我們民間乃有「功成身退」，「得意不宜再往」一類的戒條，而事實亦恆能證明這些戒條不失爲金玉之言。中國人未必都無良知，但有良心的人也殊不易不敢或不願出頭說話，因爲不法之徒總不免要互相勾結以作惡，而政府及一般社會都不能給主張公道的正人君子以有效的保障，所以正人君子祗得獨善其身，不能出而領導發生一種正論的作用，而道義也就日見湮沒而不復申昌。蘇三起解中那個解子的幾句開場白：

我說我公道，
你說你公道，
公道不公道，
自有天知道。

很可代表中國社會上的公道觀。無是非無公道的社會必是一個黑暗的混沌的退步的社會，所以我們的人心總是不能振奮，而我們的國家社

會遂亦總是停滯而不能前進。

五

「政治」在中英兩國社會上的重要性，也是兩國社會風氣的另一個不同之點。在英人心目中，「政治」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在中國人心目中，「政治」是主要的，抑且爲唯一的。因爲「政治」在英人心目中不是唯一的，所以人民的努力是多方面的，社會的發展也是多方面的。平均發展的社會自然要比畸形發展的社會來得健全。議員及政治家在英國衹是一種職業——這句話有兩層解釋：一指議員及政治家在英國衹是許多職業中的一種職業，另一指議員及政治家在英國衹是一種職業而非一種權勢。就前一層言，在英國，並非每一父母都希望他的孩子從政，英國的青年也並不認從政是他們唯一的出路，他們活動努力的範圍極其廣闊，殖民、探險、武功、文學、藝術、科學、工業等等各方面，都有年青人遊闖的前程。假如晉封爵位在英國就算代表一種事業上或學問上的成功的話，則固人人都有獲取爵位的希望，初不問其是士是農或是工商。就後一層言，從事政治的目的也無非是替國家出汗出力，而非爲一己謀權謀勢。除了法律所許可者外，一個官吏固不能有更多的權力，而當他卸除職務後，他亦即退而與衆民無異。中國的情形異是。在中國，官吏與庶民之間總不免有或多或少的距離。官吏將隨處受人迎奉，並發現自己的言語有許多重量與權威。在中國，唯有取得了政治地位才算是眞有了地位，政治地位以外的社會地位，終不爲衆民所接受。不僅如此，在中國，一個人若無政治地位或政治關係，他且不易從事其他事業；沒有政治關係而欲從事事業，常會遭遇不可想像的困難。政治在中國既有這樣的威力，焉得使人不思與政治結緣？中國早有「學而優則仕」之言，讀書人自己固視從政爲他當然的出路，一般社會亦抱同一的看法。而又「天下唯有讀書高」，讀書人成爲了四民之首，這不啻間接承認，「仕」是中國社會中最高的職業。社會上的傳統觀念既是如此，其結果，一方面向政界鑽營的人越來越多，國家的政治也就終於不免因此趨於混亂，另一方面則人才都集中於政界，在全國各種職業的分佈上便失却了平衡，以致社會的各方面不能平均發展，今日中國生產技術及生產組織的不能日新又新，就是全國人才不能平均分配的一個最明顯的後果。

不僅是一般人民重視「政治」，即執政的人，在他們的施政中，也總特別重視「政治」——我們並可以說他們唯一重視的就是「政治」。多年以來，國人對於「自由」的意見，常彼此格格不入。有一部分人認爲今日中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之多，在並世各國間幾無其匹；另一部分人又以爲今日中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遠較歐美各國人民所享有者爲少。著者山居之餘，輒思及此一問題，感覺兩說均有非是。因爲這種說多說少的論點，實嫌籠統含糊，難獲正確的結論。「自由」祇之一個總稱，其內容尙可別爲種種不同的「自由」，如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財產自由、職業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著者常思對此問題作一比較科學的答案，因將今日中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大別爲「政治的自由」和「社會的自由」兩類，而其結論則認爲今日中國人民所享有的「政治的自由」太少而享有的「社會的自由」太多。著者之作此結論，固非徒憑空想，我們實可舉出許多實例以明此說。以言人身自由，許多違法作惡殺人越貨的惡棍盜匪，常得逍遙法外，（各地常有招撫收編土匪之事，其實就法律而論，土匪犯案累累，早已一死不足抵償其罪。）而在思想上稍爲激進一點的人，其生命常不能得到合法的保障。以言言論自由，對於那些隨便揭發他人秘密，破壞他人名譽，刊載荒誕奇離不合人情的文字的報紙或印刷物，它們在社會道德上所發生的影響，政府常漠然視之，但一個報紙或印刷物若發表了在思想上有「問題」的文章，則該報紙及印刷物之編輯人、發行人、及該文字之著作人，俱將遭受不可抗拒的壓迫、威脅或制裁。以言信仰自由，則信仰種種荒誕不稽的教義，決無人加以阻止，所以民間還是燒紙屋、紙錢、紙箔、雇道士

巫人打唱，這一切反現代的費錢費力的迷信行爲可以行之如素，一如在一百年前一樣，但一個人的信仰若一涉及「政治的思想」，則他即將常受到注意或監視。以言職業自由，辦學校、開書店、出刊物、發行報紙，均須受特殊的管制，因爲這些職業都是傳佈思想的職業，至於一般與政治思想無關的職業，政府不甚干預，所以殺人的庸醫仍得高枕無憂；貧窮無告的父母將其子女鬻賣爲奴婢爲娼妓，絕對自由；十歲左右的兒童挑了二三十斤的煤炭往來於官道之上，絕不受禁止；至於人民之有職業無職業，自然更無人過問。以言集會結社的自由，則抽頭聚賭、私家堂戲、結夥械鬪、鄉間香會、下級幫會，均不受眞正嚴厲的限制，但政治性質的集會結社，即使明文不禁，實際上是不易自由舉行的……大體言之，在中國人民的行爲及一般生活中，凡涉及政治的，處處受到限制；祇要與「政治」無關，極盡自由。英國的情形正巧相反。在英國，結社和集會，無論是政治的或非政治的，祇要不違法，政府概不干涉。言論祇要不妨害公共的利益及私人的利益，政府亦絕不限制；正如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內相約翰·安特森所頒布的備忘錄中所述：「在我們這個國家內，凡屬僅僅抱持一種意見的行爲，決不能作爲觸犯刑網而受刑罰。」無論對政治理論、政治設施、或政治人物陳述意見者，俱不構成犯罪的行爲；因發表政見而犯罪者，是謂「意見罪」，在英國的法律裏是沒有「意見罪」的。但享有甚大的「政治的自由」的英人，却又未必享有甚大的「社會的自由」。買車票戲票，均須排隊，不得搶先。在公共場所，吸烟者必須在指定的地方吸烟，不得踰越——在「地下車」及火車中，不得在Non-smoking 車廂中吸烟；在公共汽車中，坐在下層的乘客不得吸烟；在公共建築中，吸烟須入特定的吸烟室(Smoking-room)。政府對於戲院、旅館、飯店、圖書館、博物院、橋樑等等公共建築物的建築，特別嚴格，用以保障公共的安全。在這次戰爭中，當敵機來襲時，人人均用黑絨或其他布料將窗子遮住，絕不許有光線外洩，致成敵機的目標，執行極爲徹底。物價在政府的控制下，未生波動。有一個雪茄烟商店寫信給邱吉爾首相，告以新到了一批雪茄，歡迎邱氏惠顧，邱氏告以他已儲足法律所允許購儲之數，假如再購，即變成囤積而觸犯法律。邱氏七十歲壽辰，英國糧食部通知邱氏，謂邱氏以後所用茶葉，每週可以增購一兩，因照定量分配法規定，七十歲以上之高齡人民，每週得多購茶葉一兩。就是英王英后每週的牛油及糖等的定量，亦與庶民無異。言論固然自由，但不得損害私人之名譽及其權益，法律對於此點限制極嚴。人民雖有選擇職業之自由，但行使此項自由時，不得違反國家所以承認人民此項自由之目的。故一切違反「優性發展」的原則的職業如終身奴工或短期奴工等，均在取締之列，國家並對於最高工作時間、最低工資、以及童工女工等，均有法律明文規定，人民不得私有簽訂，有違國定標準之各種工作契約。……英人享有的社會自由，有些是由政府以法律限制的，有些則不是；但即使不由政府以法律限制，至少政府中人能以身作則，倡行於上，故能全國景從，蔚爲風氣。英人認爲：人民若無政治的自由，則民意不得申，民意不申，則國家的政治即失去了根，同時國家亦即不能發揮其潛在的活力。在另一方面，人民的社會的自由若不限制，則一部分人行使無限制的自由，勢必另有一部分人因被其侵犯而傷失其自由。故在英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應大者大之，應小者小之；和中國的情形一比，這個對照是相當強烈的。

六

就「政治」的本身論，中英兩國也有極大的不同。從制度上論中英兩國的政治，固可作許多不同的比較，但著者論中英兩國政治的不同，不欲從制度上着眼，而仍願從性格上及傳統上，研究兩國執政者的心理及作風，而他覺得：人民在兩國執政者心目中所佔的地位，大大不同。近代英國任何一個政府都是建築於人民的同意之上的，人心的向背成爲政府能否在位的唯一的決定因素。中國執政者固無一不希望得到人心的歸附，但在實際上，政府的政權鞏固與否，常常看它所

擁有的實力大小而定，至少我們可以承認，人民的愛戴與否不能成爲政府在位與否的決定力量。自表面觀之，這似乎也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但實際上則仍爲一個性格上及傳統上的問題。英國任何一個政府，如其倒行逆施，違背民意，他固將不容於人民而被迫去職，但從反面看，如若英國人民在一個失治的政府之下，不能眞正起而反抗，起而作一種有力量有實效的反抗，則那個政府也許眞會因人民對他無如之何而戀棧不去。但是一部英國的憲政史告訴人們，凡是遇着這樣一種情形，人民固未有不起而作廣大的反抗者，他們可在各方面（如拒絕納稅等）反抗政府，初不一定僅在選票上始能表示其反對的意志。千百年來，英人卽保有一種政治上的傳統，卽政府的職責乃在保障人民之自由、生命與財產，並使人民能獲得更多更大之自由、財富與快樂。英人的政治傳統既是如此，所以執政者上台以後，他們總是兢兢業業，尊重人民的意見，並思如何造福於人民。英國歷史上不知有多少大事都是政府順從民意的結果：一八四六年穀物法 (Corn Law) 的取銷是人民多年反對的結果；一八三二、一八六七、一八八四、一九一八、一九二八等次的選舉改革法，也是出於人民多年的要求；在拿破崙戰爭中因國庫窘急而爲庇特(Pitt)所創於一七九八年實行的所得稅，當戰爭結束之後，全國城鄉各處的公民，紛紛上書國會，請求廢止徵收，政府在羣情憤激之餘，不得不於一八一六年加以廢止——歷史家稱此爲「民衆得以左右政策的首次」，雖然不幸從今日看來這是一次錯誤的行爲；華爾坡爾 (Walpole) 雖然傾向和平，但終不得不順從民意而與西班牙作戰（貞琴茲的耳之戰），他的拔刀雖屬勉強而竟不得不拔；作戰失利的人也常因民衆的公憤而不得不加以應得的處決，一七五七年英政府之槍決先一年失守米諾卡 (Minorca) 的海軍大將約翰丙(John Byng)卽爲最好的例子。在英國，政府有似一個靈氣針，人民對於國事的反應，它都能記錄無爽。判麥斯吞任外相時，他常以爲他自己對於輿論所負之責多，而君主所負之責少，卽對其同僚的所負之責，也不及對其人民所負之責大。人民的意見都如此重視，人民的自由權利自然更受重視，在英國，法律的目的卽在保障人民之自由與權利；保護大多數人民的合法權利而限制少數人的不法的專擅的權力。英國之所以祇有一種通常法者，卽因法律的目的既無非保障人民，則通常法固已勝任而無須另立他法。英國之所以不若法國之有行政法及行政法院者，卽因法律之目的在保障一般人民，官吏亦爲人民之一部分，官吏與人民並無特殊分別，故官吏與人民受治於同一法律及同一法院。英國的法律既在保障大多數人民而限制少數分子的不法的專擅的權力，故在政治上握有權力的人，常卽成爲法律所限制的對象，因爲他們既權力在握，唯恐其行使權力時超乎法律以外，因爲他們若濫用權力，勢必侵及人民的合法的自由權利。在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中，英人因詹姆士二世之蹂躪法律而逐之去位，故當時英人的行動亦可謂一種護法的行動。在十八世紀大法學家布拉克斯吞 (Blackstone) 時代的英國，法律對於統治者的權力，限制極嚴，「公民所可得的保障既多而又有力，政府絕對不能奈何他。」在英國，從歷史上看，常常是人民要求政府守法而非政府要求人民守法，這一點至可注意。人民的意見　自由、權利都如此受到尊重，人民的生命之被國家保護，自無待論，故一八一九年發生於孟徹斯德的屠殺案 (Manchester Massacre)，死者僅十二人，已爲英國歷史上少有的慘案，當時「不僅激烈派及工人憤激異常，卽安居鄉宅的自由及高坐華屋的商人亦爲這殘殺同胞的暴行所震驚。」將上述種種和今日中國的情形一加比較，當非絕無意義之事；但這種比較固不須依賴任何理論，祇須依賴事實，而事實則固一一呈現於吾人目前或記憶之中，故此種比較，讀者可自行爲之。

「民意」「民權」，雖爲著者所關切的問題，但終非著者在本節中所欲主要申論的問題。著者在本節中所欲主要申論者，乃爲喀來爾 (Carlyle) 所稱之「人民狀況問題」。從這一點實最可看出中英兩國政治作風上的基本不同。喀來爾嘗稱「人民狀況問題」爲英國內閣及國會的主要問題，英國的執政者總是心中念念不忘如何改善人民的日

常生活而使之日近康樂富強之境。「人民狀況」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需要實實在在的解決，初非空洞好聽的辭令所能改善，所以英國的執政者對於人民各種日常生活總能切切實實加以注意而作盡心盡力的改善。在英國，整個的十九世紀可說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改進時期。威伯福士、克拉克孫（Wilberforce, Clarkson）等人所領導的禁奴運動，在十八世紀即已取得全國的響應，而「禁止奴隸貿易法案」(Act for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s) 亦終得於一八〇七年通過，二十餘年後（一八三三）復有「解放奴隸法案」之通過，使帝國境內之奴隸，一律得到解放。在一八三三年及一八四七年，先後頒布兩次工廠法 (Factory Bill)，規定工人工作的時間：前者規定九歲以下之孩童不得雇用，女工及不滿十八歲之男工每日工作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後者規定十八歲以下之工人每日工作不得超過十小時，星期六不得超過八小時。一八七五年復有工人住宅法 (The Artisans' Dwelling Act) 以改善工人的衛生；其後又實行註册工人 (Registered worker) 之制，以減低工人失業之威脅。貧民的救濟遠在一六〇一年即有貧民救濟法 (The Poor Law)，一八三四年復有貧民救濟新法 (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救貧經費年達八百六十萬鎊之鉅。公共衛生則有一八四八年及一八七五年先後頒布的公共衛生法，與疾病宣戰而抵抗因貧窮而引起的災難。自一八七〇年初等教育法 (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通過後，教育遂大大的普及於全國，「它給貧民區域中無數失養的兒童以一種訓練及紀律，它也發動了此後半世紀中偉大的教育進步」，而一九〇二年的教育法通過後，英國的國民教育益臻發達。新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會所制訂的關於改善社會生活的法案有養老年金法，礦工八小時法，兒童身體檢驗法，都市設計法，小工業法，失業保險法，疾病保險法，小營業法等。在英國，無論是保守黨，自由黨，或是工黨，固無一不以人民的狀況為念，他們上台後，總是念茲在茲的對於人民的生活謀種種改善，重行的英人改善社會生活固不以僅見之於文字為滿足，他們確能實事求是，使全國人民的生活真能改善。舉例言之，當一八三三年工廠法頒布後，政府且派有視察員分赴工廠監督執行，而視察員亦確能克盡厥責。在這次戰爭中，英國政府一面從事戰爭，一面仍未忘情於人民生活的實際問題，國會除已先後通過了「教育法案」及「社會保險法案」，「工業損害保險法案」等法案外，報載尚有「國家健康服務法案」，「城鄉設計法案」等法案在待審之中。抽象的政治原則之爭在今日英國已成過去，人民的實際生活狀況則越來越受執政者更大更切實的注意；無論保守黨或工黨，都接受這同一的趨勢。著者希望讀者能大大注意一點，即英國的執政者實最懂得民富即國富的道理，知之並力行之。除上述內政上的措置外，在外交及殖民方面，尤為明顯。前述愛好和平的華爾坡爾首相在人民基於自由貿易的要求所引起的舉國若狂的感情之下，不得不和西班牙從事戰爭一事，即足以說明英國政府總是用外交或武力來保護人民的海外經商，在近三百年來，不論那一黨執政，這個基本政策總是不變的。人民因國家之保護而得在海外自由經商，因自由經商而成巨富；從表面看，賺錢的是人民，賠錢的是政府，但一究實際，人民不富，國焉能富？人民沒有康樂，國家焉能繁榮？所以英國的執政者總是心心念念，無論內政外交，總以使人民康樂富強為最高目標。

在中國，我們即使不能說人民在執政者心目中毫無地位，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執政的人對於「人民狀況問題」，不是不知如何着手，即是不能全神貫注。幾乎沒有例外，執政的人上台後，最急切的工作就是儘先利用執政期間所特有的種種優越，放肆的擴充其權力或鞏固其政權，凡是一切足以加強其「政治控制」的，皆不惜耗費鉅大的金錢及動員衆多的人力。但不幸「政治控制」既無邊際又無盡期，以致「人民狀況問題」永遠無法佔有它應佔有的重要地位。平心言之，假如多年以來，政府能將它在「政治控制」上面所耗費的人力物力，用之於人民生活之改善，以它對於「政治控制」那付全神貫注的精神來作種種社會的改善，則今日人民所受的痛苦至少可以大大減低其痛苦

的程度。社會也不致仍舊那樣停滯不前進。自從清末變法圖強以來，前後忽忽垂五十年，而人民的狀況依然如故。我們實未見到一般人民的健康情形及衛生知識有何長足的改進，保健事業毫不發達，公共衛生的設施幾等於零。民間的死亡率依然很高。國民平均壽命下跌的趨向中，一般人民飲食的材料及方法也還是與一世紀前無所分別；建築房屋對於日光及空氣的觀念依然墨守陳法；優生的理論僅見之於一二學者教授的論著之中，政府對於國民體格的品質問題似乎從不發生任何興趣；老弱殘廢仍得不到國家的救卹，乞丐仍到處皆有；無論城市鄉鎮，房屋的建築依然不合市政的原則，街道湫狹，火巷很少，沒有隙地；土地制度未見作合理的改革；耕耘的方法及工具一仍其舊；宴會的方式仍是費錢費時而又浪費物力，但始終缺少革命性的改革；旅館及澡堂裏的陋習，迄未禁絕；郵政的效率未見進步（年來且大大退步，爲郵局所特有的種種良好的傳統，日見消失，郵局漸有成爲一個普通的行政機關的趨勢）；報紙在數量上路有增加，但在公民教育及道德的效果上，貢獻仍少；交通除軍事的及政治的以外，純粹關於人民生活所繫的道路，甚少改善，無論城鄉，一經下雨，無不泥漿四濺，民間的交通工具還是原始的轎子，板車及小木船；民衆教育因於經費及人才，僅有其表，而無眞正的效果；人民的娛樂方法及內容無新的充實；種種迷信仍流行於民間；匪、盜、竊賊仍遍地如毛，人民於完納各種賦稅後，無論旅行家居，仍未能獲得合法的應有的安全保障；一般人民的道德觀念及自尊心越來越淡薄，其發生的影響似乎從來不爲執政者所關懷。……凡上所述，俱極瑣碎，但最瑣碎的常常是最有關人民日常生活的；這些瑣碎的事情對於他們實遠較抽象的主義對於他們爲更實在，更切迫。近二三十年來，中國人民中的一小部分有資產的知識階級，他們的生活，至少在物質方面，確大見改變。這個改變當然是一種舒適的、豐富的、並是現代的改變。但爲國脈所寄的大多數老百姓，他們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環境，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觀念，與一世紀前相較，固無其改善的痕跡。郭嵩燾嘗謂：「西人富强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強，固自有在。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爲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郭氏曾將此意語李鴻章，然自曾國藩以後，解此語者已不多，更遑論行？重私利重虛文的執政的人們，祇知擴充權力，舖張門面，而不知實實在在的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民既不裕，國焉能富？大多數人民的知識、能力、及生活不能改進，我們的社會焉能有蓬勃發展蒸蒸日上之望？所以這幾十年來，我們一般國民的生活力總是越來越貧困，而我們國家的國運也就越來越窘壓。

戰後南洋華僑經濟的展望

何啓拔

中國遷民之在南洋，不但歷史久，人口多，而且他的經濟基礎也比較的穩固。故欲對戰後南洋華僑經濟作一透視，對於戰前南洋華僑經濟先有解剖的必要。否則，捨本求末，不能獲得問題的眞相與全貌。

南洋華僑經濟的重心，雖因時因地而殊異，但一般來說，最初華僑經濟的基礎是建築在包商制與稅吏制上面，現在却是商業農業礦業與工業。今逐一簡述於后：

（甲）包商制　南洋各地的政權，自由土人的手中轉讓給白色人種

後，各種社會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制度都爲之煥然一新；單就經濟制度論，白人爲充裕地方財政的收入，各種租稅制度因之相繼設立。承辦這種租稅的人，稱爲包商，南洋華僑也有稱爲霸碼的，即由英文"Farmer"一字音譯來的。包商制創立後，承辦租稅的人幾乎盡是我們華僑。因爲當時白色人種之遷移南洋去的寥若晨星。且他們大都是地方行政人員，即使不是官吏，他們因不熟悉當地的情形，不能從事這種職業，於是只有土人與華僑了。可是土人又不如華僑，因爲：(1)華僑的資本比較的雄厚，(2)華僑比土人有強大的組織能力，經商的本領，與遠大的眼光。

包商的種類繁多，主要的爲巴殺、屠宰、賭博、鴉片、煙酒、當舖、劇場……等。華僑中能承辦各種租稅的人，往往是在該社會有相當勢力的人。承辦租稅是以區域爲單位，稅額由殖民地政府規定，承辦者以政府規定的稅額一次納足。至對於某種租稅的緝私與徵收問題，完全由承包者自己去調度。當時白人對於當地社會情況不甚了解，致釐定各種稅額很輕，於是包商莫不獲得重利。這種制度殖民地政府早已實施管制與取消了。至於近來流行的代理制度與工頭制度，雖類似包商制，但其本質却大大的不同，因他沒有包商制的壟斷性與非人道性。

(乙)稅吏制　南洋稅吏制度的普設，與其說是因華僑方言習慣的不同而設，以司裁判曲直與處理有關僑胞的一切事情，不如說是利用華僑方言的不同而分化華僑與「以華制華」的政策。這種稅吏，荷印分爲三等：(1)瑪腰，(2)甲必丹，(3)雷珍蘭。這些官吏原是義務職，政府不給薪俸，但是在於他所經手徵收的稅額中，却給以百分之二的辦公費。法屬越南設有幫幫(幫長)一人，以處理各幫的稅收。英屬馬來亞初期也設有甲必丹的官制，現在已廢除了。菲列賓在西班牙人統治時亦嘗行此制。這些官吏因常與殖民地政府人員接近的關係，因而獲得經濟上種種便利。大凡承租稅或請辦他種須經政府特許的事件，他們不但得風氣之先，且亦有左右的能力，或自己承辦，或請他人出名承辦，自己暗中主持，因之莫不獲得厚利。

(丙)商業　商業是南洋各地生活活動的重心，尤其是仲介商與零售商。南洋華僑商業，以菲列賓最爲發達，經商者竟佔全島華僑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三。菲島華僑商業大別爲三類：(1)頭盤商(批發商)，(2)二盤商(仲介商)，與(3)零售商。在此三類中，以二盤商與零售商的勢力爲最大。在菲島無論窮鄉僻壤差不多每二十五家即有華僑零售商一間。以前岷尼拉市所有零售商店十之八九均由華僑經營，後來經非政府極力獎勵非人經營此業後，華僑零售商遂日趨衰落。從菲島華僑在商業上的投資額方面看，更覺得菲島華僑在商業上的重要，據一九三二年菲島農商部統計，我華僑在菲島之商業投資額爲三九七、七四七、〇七一批索，其中投資於零售商者爲最多，達二六九、一四三、六二二批索，出口業投資達七〇、一六八、八二七批索，入口業投資達五八　四三四、七八三批索。

馬來亞華僑的商業也很發達。據馬來亞一九三一年人口普查的報告，在全馬來亞一、七〇九、三九二華僑人口中，我華僑有職業人口共九四〇、九七二人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五，其中務商業金融的人有一四六、八八二人，佔馬來亞華僑有職業人口百分之一五・六，或總人口百分之八・五。又據一九三五年星嘉坡華僑籌賑會的調查，星嘉坡一地，我華僑從事商務的品別有一百一十一種，共六、七五六家，其中以雜貨店爲最多，計五八三家，佔總數百分之八・五，其次爲咖啡店計五四五家，佔總數百分之八・〇。荷印華僑的商業也很發達，他們所經營的商業，其性質非常的複雜，上至士庫(洋行式大公司)下至亞龍(即小資經營的零售業)都有華僑的資本。一般說，荷印華僑的商業，大資本的固然不少，但是中小資本所經營的商店，却佔最大多數。可以說每一個城市，華僑的商店總佔大多數，至於散佈在各村莊的亞龍，更是到處皆是，其有統計證實的，據一九三〇年荷印人口普查的報告，爪哇在一八二、八八四的華僑生產者中，從事於商業的有一〇五、四五五人，佔總生產者百分之五七・六，外島二八七、

〇五一的華僑生產者中，經營商業的計有六六．五三四人，佔總生產者百分之二三．一。又據荷印中央統計局之報告，一九三七年華僑擁有二萬五千盾至一百萬盾之資產者，計有三千零七十九人，共有財產二萬四千二百萬盾，一九三八年減為二千五百八十四人，財產總額亦減為二萬二千萬盾，此種數字，雖指一般華僑，然其大部份屬於務商者，可斷言也。

暹羅華僑的零售商，仲介商都有，出口商以米為大宗。輸往祖國者計一九三一年達一六、五七二噸，其他土產如牛皮、燕窩、本材為其次，入口商以經營雜貨布疋為大宗。據一九三〇年的調查，華僑米商一四一家，輸出入口商八四家，保險公司一〇家，木材商二〇家，機器商二一家；木器商一八家，雜貨商一、三三五家。此外據我們在曼谷的觀察，曼谷華僑尚經營有糖業布業海味業與酒業等。曼谷的商店百分之九十幾乎為華僑所經營。曼谷之三聘街與中國內地沒有什麼兩樣。

越南華僑商業，以米，布疋業，雜貨店與土產輸出業為重要。關於華僑在商業上之地位，據日人土方成美在所著亞細亞的羣衆·文（原載改造雜誌譯文載東方雜誌二十八卷十三號五十一頁）中說：『在印度支那的華僑大部份是商人。他們為商業上的需要，招雇國內親友前往。華僑入印度支那大都以這種需要為根據。他們集中在一處作商業上的活動，在印度支那經濟界中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同時法人符郎索氏在覺醒的亞洲一書中謂：交趾支那之對內對外貿易，五分之四是由華人經營。這一個說法未免有過譽之嫌，但華僑在越南所佔的商業地位，其重要的程度，不難窺見其概了。

緬甸華僑的商業，零售商仲介商與批發商都有。零售商緬甸華僑稱為雜貨店，華人資本固遠遜於印人，然其普遍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仲介商華僑稱為粗貨商，這種店大至通都大邑，小至窮鄉僻壤，莫不星羅棋布，舉目皆是。批發商歐人的勢力最大，華人與印人的勢力大約相埒，但內地販運的大權，獨操於華人，外人幾無插足的餘地。緬甸華僑商業上尚有一特點，即是華僑有一種小商人，散居緬甸各市鎮村落，以貸款為牟利的手段，這種制度華僑謂之『放青』，因了『放青』致跟着產生了中人（放青）的一種制度。務此業的華僑最少有數千之多。關於緬甸華僑，興商總會二十五週年紀念刊中的統計，緬甸華僑土產商計有三七四家，洋雜貨商八一〇家，米穀商一二一家。從這一些統計數字看來，這個調查遺漏必是很多的。至於英屬北婆羅洲的華僑商業分為市鎮商與鄉村小販兩種。北婆羅洲的商業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二三．八。（註一）

（丁）農業　一般來說，農業是南洋經濟的主要命脈。暹羅、越南、緬甸以米為農業經濟的重心，馬來亞與北婆羅洲以樹膠為主要，荷印以樹膠、蔗糖、煙草等為中心，菲列賓的農產品以蔗麻，椰子與煙草等為大宗。至於南洋華僑的農業基礎比較穩固的，首推英屬馬來亞，因為英屬馬來亞有二種獎勵農業的政策：（1）凡小農願領地墾荒者，免其地租三年，請領在二十五英畝以下者，徵收請領費叻幣五角，領二十五至五十英畝者納費一元，領五十至一百英畝者納費二元，領一百至五百英畝者五元，領五百至一千英畝者十元，超過一千英畝者二十五元。三年納稅期滿後，並且得優先向政府請領此地之權。（2）獎勵大農制度，即凡請領地至千畝以上者，聲明其農作業之宗旨，或採用新方法種植咖啡樹膠等，政府可優給以最低額之地租，并減免若干年之租稅，以示獎勵。

馬來亞華僑農業，單就樹膠一項來說，據著者估計約有八二一、〇七四英畝，佔一九三五年馬來亞膠園面積百分之二十六（見拙作南洋華僑第四章），其餘的農產品莫不與我華僑發生密切的關係。再就農業投資一項說，一九三〇年馬來亞華僑農業投資計二萬萬四千四百餘萬元叻幣（見福田省三：華僑經濟）。荷印華僑的農業基礎，亦頗穩固。就投資說，華僑資本有二〇六、五八五、〇〇〇荷盾（見福田省三：華僑經濟），占總投資的百分之十一強，居各國在荷印農業投資的第三位，再就農業人口論，在爪哇一〇八、〇〇〇的華僑總人口

中務農者二萬人，佔總華僑人口的百分之一八·五，邦加華僑總人口九萬六千，務農者七千六百，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七·九，寥內華僑總人口三萬九千，務農者六千五百，占總人口百分之六·六。(註二)北婆羅洲華僑農業的勢力亦頗大，參加農業的人口占華僑總人口百分之七九·八，其中耕種稻田者百分之二一·五，耕種其他穀物者百分之三三·一，地主的僱工百分之二六·二。(註三)至於暹羅、越南、菲列賓與緬甸等地方華僑的農業經濟基礎，并不若馬來亞與荷印那樣的穩固，且直接參加農業的人也不甚踴躍。但上述各地的農業經濟權多操於華人之手，故法人丹尼利(E. Dennery)說：「中國人不參加生產，但能控制生產，不耕種田地，但能支配農業。讓別人種植，自己收獲別人耕作的成果，與別人勞力的利益。」(註四)

(戊)礦業　礦產是南洋各地第二條經濟生命。馬來亞與暹羅以錫為中心，荷印以錫與石油為重心，緬甸以錫與鎢為重心，越南以無煙煤為大宗，英屬婆羅洲以石油為重要，菲列賓的礦產則不甚豐富，比較有價值的是金，將來比較有希望的是鐵。凡南洋各地中礦產與華僑發生直接關係的要算是馬來亞。在馬來亞各種礦產中與華僑發生關係最密切的首推錫業。因為(1)馬來亞的錫業華僑開採最早，(2)馬來亞錫業的勞工中，我們華僑的人數為最多。且世界錫礦產量最多的地方以馬來亞為第一。據英國內政部礦務局出版之一九四〇年礦務年鑑統計，一九三九年世界錫礦產量為一八一、〇〇〇長噸，馬來亞竟產五四、九一四長噸，佔總產量的百分之三〇·三。在馬來亞的錫產量中，據達夫說：「華僑錫礦出產者約有一半」。(註五)若就錫業投資言，計有五千萬元叻幣(見福田省三：華僑經濟)，其他各地礦產，我們華僑雖有經營，但其勢力至為式微，而遠不如間接勢力之大。所謂間接的勢力，即是指華僑礦工而言。例如一九二〇年萬里洞在二四、〇〇〇可能工作的華僑男子中有二一、〇〇〇人為錫工；一九三〇年二一、〇〇〇可能工作的華僑男子中，有錫工一九、〇〇〇人；一九三二年一〇、〇〇〇人中八、〇〇〇從事錫工；一九三三年六、〇〇〇人中四、〇〇〇人為錫工。(註六)至於荷印華僑直接投資礦業的僅有八十五萬盾，其數甚微。

(己)工業　南洋資源豐富，可供工業製造用的原料甚多，依理其工業總應該是發達的。而事實上却不然。其重要的原因，不外是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一種經濟政策，即是吸收殖民地的原料及繁榮本國的工業，然後將製成的商品，傾銷於殖民地以吸收其金融。

南洋工業基礎比較穩固的要算馬來亞與荷印。馬來亞的工業基礎是由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奠基的。馬來亞的工業及具規模的有樹膠工業，煉錫工業，黃梨罐頭業製油等等。馬來華僑工業的種類至為繁多，但經濟價值比較高的即是樹膠工業與黃梨罐頭等。馬來亞樹膠工業導源於荷蘭裕德普爾札公司在星嘉坡開設之星嘉坡樹膠工廠(Singapore Rubber Works)。繼之而起的有華僑經營之張永福平民樹膠廠與陳嘉庚樹膠製造廠，尤以後者規模為大，在南洋有數十家分廠。然不幸於一九三三年因主人陳嘉庚先生宣告破產而停業。至於現在馬來亞製造樹膠的工廠幾乎尚為華僑所有，規模較大的有李光前先生所經營之南益公司。黃梨罐頭製造業亦是馬來亞重要的工業。這種工業幾乎都為我華僑獨佔。據一九三七年馬來亞的統計，黃梨製造廠共有十六所。完全由華僑經營其中規模較大的為南益黃梨廠(Lee Pineasple Co. Ltd)。馬來亞榨油工業較重要的為棕油、椰油、香油等工業。棕油工業最大的工廠即是華僑經營的和豐油廠，資本三百萬叻元。椰油廠在馬來亞不多，但所有的規模都較大。華僑經營椰油廠較大的為和豐椰油廠。青油工業盡由華僑獨佔，出品以尼楠油(Patchouli Oil)為主。至於其他之工業如糖菓餅乾等幾為我華僑所經營，工廠較大的為和和餅乾有限公司，環球餅乾廠，和中華餅乾廠。火柴業亦為華僑所經營，但所產數量不足應當地之消費。肥皂等華僑經營的亦頗多，但規模小，不能與外人競爭。南洋製造肥皂的原料頗豐。此業前途頗有可觀。

荷印華僑工業較具規模的要算糖與木材。米較也頗有經濟價值。

爪哇糖業與我華僑的關係頗深切。一六三七年我華僑根居有大規模的製糖計劃，荷印總督狄曼(Antinie Van Dieman)允減內地生產稅十分之一以示獎勵。此後華僑援糖王例繼而經營的頗多。據一七一〇年巴達維亞(Batavia)有糖廠一三〇所。大半爲我華僑經營。後來荷印華僑黃仲涵有糖王之稱。近來糖業多由荷人經營了。我們看看這一幕今非昔比的情景，未知作何感想。荷印的木材業私人經營的佔爲外島的木材業。據荷印統計年鑑，一九三五年望加麗華僑木材業有二四家，產木材一四〇立方米，薪材華商一五家，產薪材三五一五 S. M.(S. M. 等於四立方碼)。木炭商五九家有窯一六一個，產額一一、二五七公噸；同年廖內華僑木材業有二〇家，產額六七立方米，薪材華商七八家，產薪材九二、三五三 S. M.。木炭華商一二六家，窯二一五個，產量一六、一五七公噸，至於米較，荷印華僑共有五〇四家，分布三〇多家。

菲列賓的華僑在工業的經濟地位很高，其經營的種類也頗多，但最重要的爲鋸木業。據菲島林業局年報統計，一九三六年菲島鋸木業總投資額達二九、三八七、二〇〇批索，伐材總量一、九二七、九五二•〇一立方米。中國人投資額三、八六七、五〇〇批索，佔總投資額之一三•一六%。此外我華僑與菲人聯合之木材投資額二二〇、〇〇〇批索。至於其他之製造業如椰油煙草與糖等，都有相當的經濟地位。暹羅因煤鐵等資源的缺乏以及民族資本的短細，故其工業不甚發達，工業經濟價值較高的恐怕要算爲鋸木業與米較了。鋸木業我華僑雖有份，但大部給英人壟斷。至於米較即多在我華僑掌握中。據一九三八年曼谷要點的統計，曼谷一地，我華僑米較即有著要者七〇家。但暹羅政府爲挽救這一個權益外溢的狂瀾，除訂定法律來約束外，尚組織了大規模的泰國米業公司(Thai Rice Company)。這不外是說明華僑米較業之受到相當的打擊了。越南之米較業華僑的經濟地位亦頗高，緬甸華僑的工業，據緬甸華僑與商總會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統計，計米較一〇七所，鋸木場二八所，電器廠一〇所，其他製造業三七所，內中船廠一所，油廠三所，米粉廠一所，布廠一所，紅煙廠一所，棉草廠一所，冰廠一所，醬油廠三所。

關於華僑的經濟活動已略加敍述，現從經濟投資方面歸納起來，列表示之如下：

南洋華僑投資概況（一九三〇年）（註八）

類別	馬來(單位千叻元)	荷印(單位千盾)	菲列賓(單位千批索)	越南(單位千[illegible])	暹羅(單位千銖)	緬甸(單位百萬[illegible])
貿易品及物品販賣業	一五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一、八三〇•四
農業	二四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一二六	一五、〇〇〇	……	九〇〇•五
金融業	一五、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七、九二六	一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三
工業	二三、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四〇、六九二	四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二八八•八
礦業	五〇、〇〇〇	八五〇	二七七	……	—	一〇三•一
其他	一一、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	六九、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	二四一•一
日金換算合計	百萬元 九九五•九	一、三五七•三	三八四•一	四七八•九	九四八•〇	四、〇六四•二

以上所述數點除商業的經濟比較穩固外，其餘的莫不受到打擊；包商制與稅吏制都已先後廢除，農礦業也已開始了相當的限制，并且有的地方已頒佈不利華僑的經濟法規，而施以[illegible]士人的經濟，在政府積極扶掖士人的經濟政策之下，暹羅與菲列賓士人的經濟已萌著的

抬起頭來。因之，華僑的經濟莫不受到相當的威脅。並且世界經濟已經走上工業化的階段，已經完成新經濟的改造，而華僑依然墨守成規，不知踏上經濟革命途徑，改造自己的產業，只依賴刻苦耐勞的精神努力去保全祖先遺留下來的產業。因此第一次歐戰後歐美各先進國家挾其雄厚的資本及政治優越的勢力與南洋華僑劇烈的商業競爭，很快的而且很輕易的戰勝了華僑經濟勢力。試舉華僑所開創的樹膠業為例，從一八七七年起，因華僑首先種植樹膠事業；並且發展的非常迅速，故佔馬來亞樹膠業的絕對優勢，然而根據英官方一八三九年的統計，全馬來亞大樹膠園中歐人所經營的面積已超出華僑所經營面積的四倍以上。馬來亞的錫業現在也是每況愈下，今非昔比的。據馬來亞教育局長溫士德(R. O. Winstedt)說：「一九一三年華人鑛山所產錫砂佔產額百分之七四，一九一九年減為百分之六八，一九二〇年更減為百分之六四，」(註七)最近的統計似乎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了。至於商業方面最受打擊的首推菲列賓，次為暹羅。就拿菲列賓來說，一九一二年菲島華僑批發商有三、三三五人，佔全島之冠。零售商八、四五五人，且該年華僑出售之貨值達三三二〇、四九四、九〇二批索，占全菲貿易五分之三。現在卽今非昔比了。據日人濱野末太郎說：『一九三四年岷尼拉一地有華僑商店二、五〇八家，菲、零售商店只有一、五二一家，但至一九三五年，後者卽增至二 六〇六家，前者卽減至二、二九七家』(見最近的菲列賓 (P. 248)。由此可見華僑經濟危機的四伏了)。

南洋華僑種下了如此的歹運，完全由於：(1)華僑僑化水準的低下，(2)華僑傳統的經營方法，與(3)缺乏國族的威勢而與祖國經濟脫節的關係，於是便束縛了華僑經濟的發展，而造成華僑經濟的脆弱性。所以這一次戰爭後，我南洋華僑希望恢復戰前的經濟狀態，如果仍然墨守成規，以及單靠華僑自生自滅的自然發展，是絕對的幻想。戰後的經濟戰爭，各國資本家尤其是輕工業方面的將以猛虎撲食的姿態，到南洋角逐，所以第一次歐戰後，南洋華僑經濟的逆流，很有重演的可能。同時，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南洋首當其衝，生命財產損失最多者，自屬華僑。、與白色人種所遭遇的情形，卻有多少不同點。大抵敵人至一地，必拘禁白人與沒收其財產，華僑則不然，所以戰後欲恢復，倘比較容易，我們為着挽救華僑經濟過去的狂瀾，以及創造華僑的新事業與新前途，我們應有未雨綢繆的華僑經濟政策。

解決戰後華僑經濟問題，我以為有幾種事我們必須認真的去把握。第一卽是要藉國家的力量。戰前中國移民的到海外去，向不藉國家的力量，只是依憑他們的意志，毅力去與野獸鬪，去與外人爭，去披荊斬棘，去創造他們的生存空間。然而，戰後的移民運動，完全要靠國家的力量，如果沒有國家的力量為後盾，中國移民之到海外去，必然是行不通的。就是戰後我國海外移民運動，應該列為我國建設事業之一。同時，戰後華僑經濟也應列為我國經濟建設之一。其實華僑經濟實為我國國民經濟之一體二面，只有事業的分工不同，并無生命息之各別。這種政策應該趨於積極化與組織化，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恢復戰前的基礎。第二華僑本身已擁有雄厚的財力，也卽是說，已擁有華僑復興的經濟基礎，所以今後計劃華僑社會進步的問題，不是怎樣措籌資本的問題，而是怎樣打破幫派主義，團結幫派，而使之羣策羣力，如何去集合資本，採用進步技術，完成新的商業組織，使分散的華僑經濟力集合，而成康采爾(Konzern)的大企業經營的問題。

戰後復興華僑的原則，我們既已認清，現在讓我們談談戰後我們應取的步驟。戰後的步驟除原有的經濟基礎加以改良外，下面數種事業，我們是必須經營的。

(一)參加農業　農業是南洋各地經濟的主要命脈，欲鞏固華僑的經濟基礎，與貫徹康采爾的有效辦法，農業的參加與重設是首要的。在南洋各地中，華僑農業勢力大的與農業人口多的，首推馬來亞，次推荷印。暹羅、越南、菲列賓、緬甸等地的華僑農業人口殊少。在過渡的時期中，雖然不參加農業而能控制農業。一旦土人的經濟基礎在政府的獎掖之下或民族自決的努力之下鞏固起來，那時不但參加農業

的是土人，即是左右農業的亦必為土人了。所以為着鞏固我華僑在南洋土產貿易的基礎，先應奠定農業的基礎，更應該利用科學方法去經之營之，而使之繁榮發達。沒有參加的即應依據土地權的獲得去參加各業，尤其是暹羅、越南、緬甸諸地。

（二）組織出口貿易業　在南洋各地的商業市場上，中國人零售商與仲介商的地位是比較穩固。然而欲控制南洋的商業市場，我們應進一步去控制貿易出口業，以使各種業務有一種聯繫性，欲完成這一個應行的計劃，華僑應發策羣力，在我政府的指導之下，集中資本，利用科學方法，去從事經營這種大的企業。也只有這樣，才能使華僑與祖國的經濟聯繫起來，合作起來，而趨於一元化。

（三）提倡漁業　南洋一帶是一個良好的漁區，不過，中國人從事漁業的都是墨守成規，利用舊法，故不能獲得大量的純益。華僑的漁業依其規模的大小分為二類，就中以櫓坪(Djermal fishery)漁業為重要，所謂櫓坪，即是利用很多的漁網與木柵，用巧妙的排法，沿岸安排，深達海底，有時竟無間斷的延長至數英里之處，埋成一個廣大的漁陣，儼若天羅地網。這種方法與日人之大資本經營利用科學知識與新式蒸汽漁船，不啻天壤之別。魚類在商業市場的價值很大，且漁業又是一種很好的職業，這種職業在戰前多操於日人之手，所以我們應謀漁業的發展，以代替戰前日人的勢力。我們欲提倡漁業，使在輸出貿易上得佔一種重要地位，必須利用科學方法，集合巨量資本及利用新式蒸汽漁船(Trawler)，同時尤不能沒有漁港，冰庫，漁乾製造廠罐頭廠等設備。因為採取新式漁船後，其產量一定比帆船在淺海所得的增加，可見除供本地的消費外，須藏於冰庫以便製造罐頭等之用。總之，只要集合大量資本，利用科學方法與機器去從事這種職業，將來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但我們又知道新的規模事業必須有新的知識與新的人材，所以在謀振興華僑經濟的前提下。應努力促進華僑教育的發展，以提高華僑的文化程度。華僑教育是維繫華僑經濟的工具，是維繫華僑與祖國的紐帶。正因為教育對於華僑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陰謀攫取華僑二千年來的經濟利益的人，首先摧殘華僑文化，停閉華僑學校。總之我們要保存祖先留給我們的利益。我們必須發展華僑教育，以保存我們祖先在南洋二千年慘淡經營的偉業。

（註一）見 Letter from 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Jesselton British North Borneo-to Bureau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Peiping, July 4, 1928.

（註二）見 Cator: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Netherland Indies.

（註三）見同註一。

（註四）見 E. Denvery: Asia's Teeming Millions pp. 141–142.

（註五）見 D. R. Taft: Human Migration p. 468.

（註六）見同註二。

（註七）見 R. O. Winstedt: British Malana.

（註八）本表係姚楠千先生所供給之資料，原著見藤田省三：華僑經濟。

附註　（一）荷印華吏除已述者外，尚有甲必丹大(Kapitan Tua.)一職，我僑呼曰「老僑長」。

（二）據一九三八年荷印政府公佈，是年荷印華人繳付當地政府的入息稅，即指純利及薪金，計一一三、七六二、四四八盾，屋업稅計一六、八八九、〇三〇盾，兩稅合計凡一三〇、六五一、四七八盾，等於全荷印總入息稅和屋업稅八五一、二五八、八四一盾的六分之一强，荷印華僑經濟地位的重要可知（見荷印中央統計局統計年鑑）。

（三）據一九三六年菲政府商務局所調查的菲律濱小資商店，除菲商人外，有如下列：華人商店一三、八一八家，日人七七五家，英人一六一家，印人一六〇家，其他二二五家（見昭和十六年三月一日之經濟知識）。

（四）馬來亞華人與歐人的錫礦生產量之百分比有如下列（見 Report upon the Mining Industry of Malaya, 1940）：

年份	歐人錫礦(%)	華僑錫礦(%)
一九一〇	二二	七八
一九一一	二三	七七
一九一二	二〇	八〇
一九一三	二六	七四

一九一四	二四	七六
一九一五	二八	七二
一九一六	三二	六八
一九一七	二九	七一
一九一八	三二	六八
一九一九	三二	六八
一九二〇	三六	六四
一九二一	三九	六一
一九二二	三八	六二
一九二三	四四	五六
一九二四	四五	五五
一九二五	四四	五六
一九二六	四四	五六
一九二七	四一	五九
一九二八	四九	五一
一九二九	六一	三九
一九三〇	六三	三七
一九三一	六五	三五
一九三二	六六	三四
一九三三	六六	三四
一九三四	六六	三四
一九三五	六六	三四
一九三六	六七	三三
一九三七	六八	三二

張護千附誌

司法官之素質與數量

桂裕

——司法問題之二——

戰時中國有種種之經濟問題正待解決。人民急需較多之糧食，衣服，及房屋等等。政府應付此諸問題甚感困難。在司法方面，需求與供應問題亦尖銳化。法院中案如山積，需要更多之人員處理。如此局面之造成，其原因不難推究。資深之司法官在日寇佔領區內者，頗多參加僞組織，以自斷喪其前程。若干人已因戰事而犧牲生命。又有若干人則脫離法院，理由不一，無從細述。新進者訓練尙未成熟，雖儘量縮短其受訓期間，亦難立時任用。此種情形目前已甚嚴重，他日淪陷區內之法院收回時，勢必益形惡化，蓋可預言。

應付此種局面，有兩途徑：其一，徵召現已脫離而尙堪任用之舊人員，提高其待遇，使之重回法院。其二，加緊新人員之訓練。前者爲必然之步驟，不待詳論。後者則有牽連之問題，須予注意。彼實業家處此，或將趨向於大量生產之一法，以爲救濟。但司法人員之訓練，是否亦可援用大量生產之原則，不無疑義。蓋大量生產之結果恆使貨品價値低落。以言司法，縱作理論上之比喻，亦覺有損於其尊嚴也。

司法之效能於司法官之能力見之。司法官良好，法院亦隨之而良好。司法官蓋爲司法之人格化也。西洋各國之司法官往往由年高德劭者任之，不特法律學識豐富，而於人情世故亦體驗甚深，人民敬之重之，出於自然，而非懾於威力。人民知所以尊重司法則亦知所以尊重法院及法律。但良好之司法官非旦夕所能造就，必須予以培養。中國古語云：『十年樹人』，此於司法官之培養尤然。故西洋各國之正式司法官，鮮有以年事極輕，甫自學校畢業者充任，如我國目前之情形者。

我國現正需用數量更多之司法官，此爲不可否認之事實。且需要極爲殷切，竟不容吾人有充分準備之餘地。同時吾人又斷不可忽視司法官之素質。此事殊覺進退維谷。若兩者未可兼顧，自宜捨量而重質。蓋司法官素質之低落，即爲法院及法律地位之低落，理至明顯。

司法人員之訓練不容稍弛，自不待言，否則他日人才短絀，必自食其果。惟素質應予提高，尤關重要。換言之，大量生產之原則在商品之製造可用之，而在司法官之訓練，則斷然不可嘗試。

資格較好之司法官恆爲能力較強者，此語初聞之似覺近於武斷，但實際確是如此。幹練之司法官，如專心一志以從事，一人常能擔當新進者數人之工作。『改良』一語係指準確及不浪費而言。人力之不浪費其一端也。同時再就現在法院之實況加以研究，而將無關實際之方式及手續予以廢除，蓋時間及精力之不浪費其又一端也。如人稱其職，則事多人少之問題已解決一半，如人稱其職外，而辦事又簡便順利，則問題之其餘一半亦完全解決矣。故爲解除目前之困難計，更有一法在，即將訴訟程序儘量簡化是也。但稍稍變更一二種程序，於事仍無大補，必澈底修改繁重之手續法，以求效率之增進而後可。

美國士兵補習教育

汪家正譯

這一篇文章的原題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計劃」(Greatest Education Project in History)，作者爲赫爾(Gladwin Hill)，原刊佈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的紐約時報雜誌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本篇譯稿則係依據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的美國文摘。

在巴黎的南邊，距巴黎市區九十英里的地帶，有城名朱格奈(Joigny)，該城有一所法國大革命戰爭以前的法國式的營房。在這一所古老壯麗的營房中，有一位名叫凱辟突 (John Oapit) 的士兵正在那裏埋頭攻讀，他那一種孜孜兀兀的情形，委實是頗堪詫異。凱辟突原籍是塔克薩斯州的波蒙特（Beaumont, Texas），他目前是第十三空運裝備師 (Thirteen Airborne Division) 第五一七降落傘步兵團的一個士兵，該師曾經轉戰於意、法、德三國的疆場。凱辟突究竟在那裏學習些什麼呢？他正在那裏研究廣告學。在大會堂的另一端的一間屋子裏頭，也有一大羣的士兵在那裏靜悄悄地傾聽着簿記學和會計學的功課。同時，在附近的一塊農場裏頭，也有一小組士兵圍繞着一頭牯牛在談論着，他們並不只是看看牯牛而已，實際上，他們是在那裏很有系統地研究着農業畜牧學(animal husbandary)。

美國軍隊開赴歐洲作戰的，一共有六〇師，第十三空運裝備師便是這六〇師之一。自從歐洲戰場的戰事勝利結束以後，這六〇師的士兵的精良的作戰技術便沒有機會表現，同時，連他們的基本的戰鬬職能，也就無須負擔了，因此，他們便享有很多的空閒的時間。除非他們被開往另一戰場作戰，除非他們被指定爲佔領軍，或者，除非他們

返美退伍，他們機會要失掉這許多空閒的時間。

美國陸軍當局預料到會有這一種情況，因爲，他們就決定利用這一種空閒的時間來實施士兵教育。因爲陸軍當局早經製訂了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偉大的士兵教育計劃，所以，士兵凱辟突和他的袍澤們乃能夠獲得求學的機會。

在本年八月一號，這一種偉大的士兵教育計劃，將要逐步地在歐洲戰場付諸實施，並且，還希望：在推行這一種計劃一年以後，必須使一、五〇〇、〇〇〇位士兵都能夠受到教育。——據統計，截至歐洲戰詩激昏勝利那一天爲止，駐紮在歐洲各地的美國士兵，一共有三、〇〇〇、〇〇〇人。依據陸軍當局的教育設施計劃，士兵們可以學習到各式各樣的功課：瑣細到像士耳其式的農業，高深到像莎士比亞的研究，他們都可以隨意選修。在各個駐防營地，在英國和在法國的麗菲拉 (Riviera) 新近創設的美國式的大學中，在許多「地方學校」(local schools) 裏，在私人工廠裏，在各個陸軍裝備站中，他們都可以學習到各種課程，並且，他們還可以利用函授的方法去研究各種學術。這一個士兵教育計劃，極其偉大，單單是視導員和指導員，就準備招聘二五、〇〇〇人來充任，這二五、〇〇〇位視導員和指導員將被派到各地去輪流施教。

普通所謂「教育」一詞，差不多已經變爲一種空洞無味的，和實際無關的東西了，但是，在目前，陸軍當局却把它變成一種生動有趣，和富於實用性的事業，同時，所有的士兵們，也是心甘情願地來接受這一種生動而實用的教育。士兵們都已經認清：這一種教育設施，乃是從現狀達到戰後生活的必經的，過渡的「踏腳石」(Stepping stone)，因爲這一層原因，所以，這一種教育設施，雖然絲毫不帶強迫性，然而，却已經有三分之二的士兵都願意充分利用這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

跟第一次大戰中的士兵比較起來，這一次大戰中的士兵的教育程度要進步得多了，客觀的統計數字可以給予我們證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參戰的士兵，大學生只佔百分之五，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大學生却已佔百分之一三；在一九一八年，美國的軍隊，只有百分之一五曾經受過中學教育，在今天，受過中學教育的美國士兵，却已經有百分之五一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在美國士兵當中，有百分之八〇的人沒有讀完小學功課，在這一次大戰當中，沒有讀完小學功課的，却只有百分之三六。

這的確是很值得興奮的一樁事：這一個士兵教育計劃，是在今年春天由一個工兵團團長擬訂出來的，他是一位矮胖活潑的三十九歲的軍官，他的名字叫做湯姆孫 Paul Thompson)。湯姆孫統率美國第六工兵特務團登陸諾曼地 Normandy) 的時候不幸受傷，返美醫治，創傷痊愈以後，他就留居在華盛頓。一九二九年，他畢業於西點(West Point) 軍官學校，目前，他是一位勇敢善戰的團長。他雖然不是一位教育家，可是，他却指示出：要在幾個月以內替一百萬人建立起一種教育制度，同時，並創辦三所完全大學，——這一種理想，大部分是屬於工程設計問題，而不單單是教育問題。凱撒(Henry Kaiser)曾經證明：縱然不是一個造船匠，也可以造成大批的船隻。在歐洲戰事緊張的時候，在英國的反攻訓練營中，在短短的幾個月以內，湯姆孫把十萬人訓練成強大的工兵勁旅，他們不但抵禦住納粹的猛攻，而且，又給予德寇以致命的打擊。在工兵訓練事業中，湯姆孫已經享有赫赫的威名，目前，他又以同樣的工程專家的精神和氣魄，來解決美國士兵的教育問題了。

在美國，關於士兵教育工作，實際上，早經具備相當的基礎，還藉過去的各種教育經驗，美國陸軍當局乃能夠替士兵們擬訂出詳細的課程和教學法。陸軍當局又鼓勵美國各種教育協會和學術機關來參與這一種新穎的教育事業，請他們對士兵教育計劃多多地表現些積極性的建議和參加。

湯姆孫團長的第一步的建議和工作，就是設法調查：對於這一種自動的學習，究竟有多少士兵感覺興趣？戰事停止以後，士兵們不只

需要教育設施，同時，也需要各種消閒的娛樂活動。一九四四年的秋天——那時候，戰事還沒有完全停止，曾經做過一次測驗，其結果表示：大多數士兵都願意學習各種娛樂活動：運動學，旅行，手工，戲劇。願意學習娛樂活動的，在官佐當中，約有百分之五七，在士兵當中，約有百分之六六。

推行這一種教育計劃的時候需要大批的教師。作爲這一個教育有計劃的中心和基幹的，乃是一些「指揮學校」(command schools)，所謂「指揮學校」就是在各駐防區所創辦的教師訓練班，它的主持人和指導員都是從本防區的官佐當中挑選出來的。一切訓練課程都依據已經擬訂的課程標準，不過，大多數教師都缺乏教學經驗。這一種訓練，是按期輪流調訓的。因爲沒有那許多時間使所有的士兵教師都來直接受訓，因此，就在巴黎和英國創辦高級師資訓練，每一期調訓百餘人，使他們在巴黎和英國的學校中研讀幾個星期的教育學科，然後再分發到各地去主持教師訓練班。

預計在本年六月和七月中，每一個星期都將有一千人接受這一種教師訓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將要訓練出二二、〇〇〇位軍隊教育行政人員，二一、六〇〇位教師，以及數百位教育視導員和專科教員。同時，並設置助教若干人，凡士兵對課程某一方面具有特長的，都可以被選拔出來充當助教。

這一種教育計劃的最大的一個特點是：把全部課程劃分爲許多單位，每一單位包含二〇個鐘點，有些課程只包含一個單位，最長的課程包含十六個單位——即三二〇個鐘點。因爲課程的鐘點或長或短，所以，假使一個士兵爲了工作繁忙而空暇無多的時候，或者，爲了軍事任務而掉換防地的時候，他都可以有機會去學習適宜的科目。

每一個防區的士兵教育課程表，都是依據着一張總課程表加以删減編定，刪減的標準是依據該防區士兵的特殊需要。作爲一切課程表的基礎的總課程表包含一七一種科目，這一七一種科目可以區分爲四大類：農業類，機械工藝類，商業類，普通教育類。牠們的名目繁多，範圍極廣：專門到美國森林學，棉花種植學，瑣碎到法語，戰後事業，無不應有盡有。每一科目的下面都註明該科指導員應有的資格和職業背景，並列舉該科的參考書和教科書。據聞，已經有四〇〇〇、〇〇〇册教科書由美國運往歐洲。

各軍隊單位的司令長官或各級將領，都應該負責考查士兵教育的課程編製，同時，並考查：各種基本科目是否真能夠被士兵們所選修而又能不和作戰任務相抵觸。在將來，住在醫院裏的傷兵，也可以選讀各種課程，並且，對於各種步兵，空軍，戰鬥機駕駛員等等，我們也正在準備替他們設置各種課程。

第九航空隊(Ninth Air Force)一共有五十多個學校，他們共計容納二一、〇〇〇位學生。每一轟炸大隊的全體人員共有一、〇〇〇人，目前，這一、〇〇〇位士兵，已經被分編爲八三班，他們所研究的，一共有三〇種總目；在一個戰鬥機大隊中，一共有六二五位駕駛員正在努力攻讀。直到目前爲止，最受空軍歡迎的科目是：法文，建築繪圖，攝影術，與基本英文。

大家都認爲：每一期每一個士兵頂多只能夠選修三種學科。不過，假使有些士兵甘願選修三種以上的學科，那末，他們就可以被減免掉一部分軍隊裏的日常工作。我們打算設法提高各種學科的內容，使它們符合於美國正式學校的課程的水準，士兵讀完一種學科的時候，陸軍當局就頒發給他一種修業證書，等到將來回到美國以後，美國的大學就可以根據這種修業證書，並參照該校的學分制度，分別的予以追認。

據估計，到了一九四六年五月，將要先後建立起二、二〇〇所駐防區的士兵學校，每一駐防區約有士兵一、〇〇〇人。二、二〇〇所士兵學校共總可以容納一、二五〇、〇〇〇位學生。這些學校的程度，大部分都和中學及職業學校的程度相彷彿，士兵們讀完這些學校的課程以後，可以升入「士兵大學」，從事於學術性的或職業性的高深研究。在國外，美國陸軍當局爲士兵們一共創設了三所大學。

第一所美國士兵大學設置於法國麗非拉的比亞里芝 (Biarritz)，它的校舍是一些已經倒閉的旅館和荒蕪的別墅，在過去，歐洲的富豪家們常常在這裏消磨歲月。第二所美國士兵大學設置在英國的西銳芬漢(Shrivenham)，校址是利用英國軍官學校(British Military School)的校舍，該校校舍係一九三七年建築，富麗堂皇，爲英國的最新式的教育機關之一。第三所士兵大學是一所技藝專科學院，設立在英國的華屯(Wharton)，靠近利物浦，校舍是借用一所大工廠的廠屋，在該廠中，美國空軍曾經設立過最龐大的軍需庫，該廠不但是現代化的生活設備，一應俱全，並且，各種理化儀器，也是應有盡有。

每一所士兵大學可以容納四、〇〇〇名「士兵大學生」(Soldier students)，各種學科的修習期限均以兩個月爲度。士兵大學的教師不外由兩部分人員所構成：一部分是陸軍將官，一部分是從美國去的教育家。華屯技藝專科學院的教師一共有四五〇八，他們大都是些軍事專家。西銳芬漢和比亞里芝的兩所士兵大學的教員大概不出兩種人：一種是陸軍官佐，一種是大學教授，牠們的教員大概都在二五〇人左右。目前，我們已經開始把三〇〇名大學教授和三〇〇名陸軍將官從美國運往歐洲，以便他們可以擔負起即將開展的士兵教育的工作。

士兵大學學生名額的分配，將依據各駐軍單位士兵人數的百分比加以決定。學生入學資格的取得，是依據於各駐防區司令長官的證明書，該項證明書證明該員曾經中學畢業或具有與中學畢業的同等學力。當然啦，一切學費都是豁免的。每一個大學的全體教職員，大約一共需要一、二〇〇八，至於學校的清潔，整理，搬運等等卑賤的雜役，我們將要儘可能的利用戰俘去擔任。士兵大學的經費，大部分都將依靠着償還租借法案的款項。

另一個士兵教育計劃是大學旁聽和商店實習，——那就是：凡是希望得到專門訓練的士兵，可以到普通大學——例如英國的牛津，劍橋等大學——裏選修三個月的功課，或者，就到私人企業機關裏研習一個月的學程。據估計，在今後十個月以內，這一種教育計劃，將要徵調二〇、〇〇〇名士兵去進英國的普通大學，同時，並徵調三〇、〇〇〇名士兵到私人企業機關裏去學習。

除此以外，還有五〇、〇〇〇名士兵將要利用經常的軍事活動而獲得一些專門化的教育，他們將要被派到軍需庫或機器廠裏去，在那裏，他們會受到一些專門化的教育。這一種教育，完全是一種學校式的，而不只是普通的軍隊工作。

除掉這種種教育形式以外，還有一種常備兵的函授學程。這一種函授學程雖非新創，但陸軍當局却已經把它當爲士兵教育計劃的一部分，而且，把它稍加改良。已經加入函授學校的，共有一〇〇、〇〇〇名士兵，目前正在紛紛陸續報名加入的，每日均約有五〇〇人。

究竟這些士兵們願意學習些什麼學科呢？對於這一問題，要想詳細解答，必須等到舉行大規模問卷調查以後，不過，就已有的一些材料看起來，士兵教育設施的結果，恐怕會養成大批的商人，至於農人，恐怕只能夠養成極少數。根據最近一次測驗的統計：有百分之六九的士兵希望研究軍事學科，百分之二〇的士兵情願選修商業管理，百分之一五的士兵企圖學習一般的學術，百分之一五的士兵表示想學工程，百分之一三的士兵希望學習其他各種專業，至於希望研究農業的，一總只有百分之六。

假如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在朱格奈的第十三空運裝備師的學習的情況，那末，對於士兵的求學的旨趣便更易於明瞭：在簿記學和會計學班裏，班長范柯 (John Fanko) 選修這一學科的目的，是打算在退伍以後，到塔克薩斯大學去專攻簿記學和會計學。班長馬歇斯 (Charles Myers) 在戰前原肄業於辛辛那替大學，因參戰而輟學，目前，他想把簿記學和會計學複習一番，以便將來復學。中士溥羅霧 (Fred Provo) 認爲簿記學和會計學對於他所喜歡研究的廣告學極有裨益，在他沒有入伍以前，他曾經在華盛頓大學專攻該科。士兵凱辟突在入伍前是一個出售傢具和紙烟店的老板，他目前選修簿記和會計的目的，是打算在退伍以後專攻廣告學。至於班長喬託(Claude Choato)

選修英文文法的用意，則是企圖在退伍後研究新聞學。

在初級電學班上，有三個士兵希望將來成爲電學家，有兩位士兵希望成爲無線電技術專家，有一位士兵打算在選習電學以後再去研究鎔接術，有一位士兵想把電學學好以後再去學習鐵路管理，有一位士兵希望進一步去研究無線電傳眞術，另一位士兵則是打算把這一種初級電學做根基，將來再去做高深的研究，以便日後可以成爲電氣工程師。

實際上，值得注意的一樁事，倒並不是他們目前學些什麼，而是他們將來的學習的志願，並且，爲了達到這種志願，他們儘可能地努力去準備一切，——在一個偉大的教育計劃中，他們盡量地利用這一個求學的機會。這一點，正猶如他們的制服和方踏一樣，十足地可以表示出他們是道地的美國人，他們雖然是遠適異國，可是，他們却依然充分地顯示着美國人的精神！

原子彈與將來

美國 Bruce Bliven 作　方九皋譯

原子彈製造的成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凡是負有責任的人，在講到或寫到此物的影響時，莫不措詞很爲愼重。就種種可能性而論，原子彈無疑地是許多世代以來，人類歷史中最有意義的事情。故時至今日，我們簡直可以說，全體人類如不想試度和平的生活，就是非要遭到無情大規模的毀滅不可。當然原子彈的廣泛使用，決不至把地球上的人類一掃而空，但是在未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中，雙方旣都要持此爲武器，那末，交戰國的所有大城市，都要被消滅，人們的工業與技藝，都要遭停頓，今後這個有生命的世界，只有讓住在那偏僻不値投彈的中立國裏的零落的人民來支撐，如果有什麼中立國的話。這是什麼一個景像。

要了解原子彈的一般原理，就得先把若干基本事實再講一下。所有物質是極渺小的物體所構成。此項物體叫作原子。在有一個時候，世人以原子旣爲一種極渺小的物體，故把它當作是宇宙間最後的不可分的物體。但是相反的，我們現在知道生物並不是一種固體的微粒(particle)，卻爲一種很像太陽系的雛型(miniature)。它有一個核(core or nucleus)，是合質子(protons)和中子(neutrons)而成，和太陽系裏的太陽相似，在這個核的外圍，又有旋轉極其迅速的電子(electrons)圍繞着，和太陽系裏的行星相似。在這個雛型太陽系裏，太陽和行星的距離(即空間)，就他們的質量(mass)說，當然是很可觀，雖則原子本身是渺小到使我們難以置信的程度。

一個原子的若干部份，是具有電荷作用的。質子具有正電荷，電子具有負電荷，惟中子於此二種電荷，則一無所有，此觀其命名，就可知道。就正負電荷與電子運行速度所表現者而觀，禁錮在原子中的能，自極鉅大，正如現在原子彈所揭示者。

宇宙間之元素，現在我們所知道者，計有九十二種。我們的原子表，是按照各元素的原子所具複雜程度，列爲順序作成。最單純的元素是氫，最複雜的是鈾。在過去三十多年中，科學家對於破裂原子的試驗所作的種種方法，是有不斷的進步。一九一九年洛德福勛爵(Lord Rutherford)，設計以鈾光照射氮原子核，使其成爲氫原子。此後用撞擊的方法，使一種元素成爲他種元素，並改變其構造，使成爲實驗室裏很普通的工作。惟至少是一直到此次大戰開始時，撞擊元素的運用，以耗費過大，還不能有什麼實用的價值。

迴旋器 (cyclotron) 的發明，以美國加州大學勞倫斯博士 (Dr. Enest O. Lawrence) 的貢獻最多。此器的功用是用於破裂原子，並使其碎屑來撞擊及分解其他原子。在此種過程中，鉅量的原子能遂得釋放出來，並依被撞擊之物的性質，產生程度不同的臨時的放射作用。此種人爲放射物質，在科學上是極其重要，尤以在醫療方面爲然。施治深藏在人體內的癌病，乃其種種功用之一，因爲癌既位於人體深處，使用尋常的鐳和X光線，皆不易達到。人爲放射物質的另一功用，是使人們或動物吞食該物質，則該物質便在體內循其應循的路線而行，以作一種最重要的生理學的報道，在幾年以前，有幾個國家的科學家，當他們作原子破裂的研究時，發現某種鈾元素，最易受到撞擊，並分裂爲兩個大致相等的部份，但是性質已和未分裂時不同。此種性質的改變，是與一種極鉅大的能相伴而來——約相當於百萬電子伏。但是只有在鈾原子受到速度減低的中子所加的外界撞擊時方可如此，而中子，如使之經過石蠟或甚至水（即含有氫的水）則速度因以減低。此次德國人在諾威實驗室裏所試驗的「重水」(heavy water)，大概就是想以含氫豐富的水來減低中子的速度。重水本是美國科倫比亞大學郁萊博士 (Dr. Harold Urey) 所發現，他曾獲得諾貝爾的獎金。在此次大戰以前，有人發明一種產生原子反應 (atomic reaction) 的「引發器」(trigger)。自原子彈造成的消息發表以來，非官方的人士就揣測，與引發器有關的種種事實，又被應用。以鐳用於撞擊鈹 (beryllium)，鈹受撞擊後則發出中子，中子因有石蠟或水的加入，遂速度減低，乃得用來撞擊鈾。於是鈾原子分裂爲兩個幾乎相等部份，和少數浪遊的中子。在以石蠟或水使此等遊的中子的活速度減低後，則此項中子又可用於分裂續增的鈾原子，如是繼續進行不已。惟除非到了規定的爆炸時，不能讓鐳光通到鈹，當然是有必要。但是這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我們知道，美國科學已經把此問題解決了。

我們在報紙上讀到有些關於原子能所具可怕威力的幻想的敍述，都是假定原子可以完全爆炸爲根據。而科學家在戰前關於原子能所作的種種試驗，皆爲分裂鈾原子，其所得能量，以與今日相較，眞是小巫見大巫。

據官方稱，投於廣島的原子彈有二萬噸 TNT 的力量，但是它的相對力量，當然是大得多，因爲原子彈所含的爆炸元素，重不到一噸，恐不過只有幾磅而已。有人計算，一磅鈾的能量，是等於八百噸柴油的能量云。

原子彈在使日本的求和上所具的作用大到什麼程度，殊不易斷定。因爲在第一彈投在廣島以前，日本的抵抗就有難以持久之勢。蘇聯的參戰顯足以使這個戲劇的最後一幕稍爲提早演完。然而原子彈確爲使日本投降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此物加於廣島和長崎的可怕結果，日本人已經嘗到，安敢再使美方再以此物施於它的其他城市和戰地的軍隊。一座廣達四五英方里的城市既可爲美方一顆彈夷爲平地，日方要想不斷運送糧餉與軍火接濟他們在前線作戰的軍隊，便成爲不可能。縱令兵工廠可設在很深的地底裏，然而是否不致被炸壞，卻爲疑問。至於所有運輸線要被切斷，那就是一件無法避免的事情了。以原子彈轟炸許多軍事目標，皆不必需要十分準確，在十二英里以內投一彈，足可完成使命。

現我們既以維護世界和平爲號召，則此項鉅大威力的原子彈之將來的使用，顯不能操於一國或一羣聯盟國之手。而應由人類社會來共負控制之責，即由全體人類對此項新武器的控制來負聯合的責任是。不問那一國的人民，如果他們是聰明的話，當然不願把這個重大的責任擱在自家的肩上來。阿克頓勳爵 (Lord Acton) 說，權力會被濫用的，絕對權力會被絕對濫用的。這更是一個確論。人們既有知道此項新武器的秘密者，不久必將此項秘密洩漏，即使能嚴守秘密，然而甲國科學家所能成就者，乙國科學家亦必能成就之。何況原子彈的創製本具有國際性質乎！若言此物的來源，則美、英、法　德及其他國家的科學家皆是致力很多。德國的猶太人也作有重大的貢獻，故希特勒

如不迫害彼等，則希氏當比任何國家的科學家先獲得此項秘密，此是衆口一辭的說法。

今日我們對於原子彈並無眞正秘密的可言，我們所持爲保障的，實端賴鉅額款項，巨大機器與數萬工人。英、美、坎三國於原子彈的製造，耗款達美金二十億元之鉅，歷時數年之久，參加工作者達六萬五千人之多。在今日世界中，有作此種活動資格的國家，實屈指可數，然而一國無此種資格則已，如有此種資格，則定要設法去製造無疑。故新成立的聯合國世界安全會議應以此物爲其所有最理想的唯一武器，而不能由他國競相製造。就今日世界發展之階段言，聯合國是可對於一個擾亂國際和平的國家，以原子彈數枚相要，卽足以使其屈伏。

惟聯合國憲章現尚未爲出席舊金山會議的許多國家批准，故此項聯合機構的成立，自尙有待。竊意在目前應使知道此項秘密者祇以極少數人爲限，以不超過現有人數爲最合宜。任何私人組織，如曾經參加製造原子彈的一些廠家，如再任其從事於此，實爲不可理解之事。凡是戰事研究開始以前所頒發的專利權應收歸國有，或歸如杜魯門總統準備向國會建議設立的特種控制委員會所有，並給原有業主以相當償金。

此項新武器對於陸海軍的戰略究有何種影響，大概在短期內尙難分曉，但就廣泛的臨時觀察而言，似可使其發生徹底的革命。在過去守勢常爲用於應付攻勢者，今旣有原子彈的使用而仍有守有攻，則戰略應爲如何改變，殊不易言。我人唯一的希望，大概是對於挾有原子彈的敵人，應先還以原子彈。在二十年前，富於想像力的著作家曾講到什麼「兩小時的戰爭」，在此種戰爭中，城市上空忽有敵方的飛機蔽天，並肆行向下轟炸，使全國立陷於絕境。此種預言，就此次戰爭而論，固未證實，但在今日已較作此言時近於眞相多了。此後不問戰艦是如何建造或設計的，如果爲原子彈所命中，或有原子彈落在附近，決無倖存之理。此後一架載有原子彈的飛機已可當過去數千架飛機之用，在此種新武器侵襲之下，高射砲或天空防禦物皆歸於無用。我們現在想像，如果日本的自殺飛機有了原子彈的裝置，則太平洋戰爭的形勢，將要嚴重到如何地步！當火藥發明時，所有身穿鐵甲騎在馬上的戰士皆從此把過去的軍事技術結束，來從頭學起；今日有了原子彈的發明，我們對於軍事技術，也非從頭學起不可了。

那些抱悲觀的預言家說，有了原子彈，我們的全部文化現在皆勢非鑽到地底下去不可。他們以爲人們的城市全部，將來皆須位於地底下數千英尺的深處；市內居民僅能在短期內，爲了作一種好奇的娛樂，方露到地面上來；故只有在戰後戰前，有同插戲的很短的安全時期方可如此，倘使果有此種安全時期的存在話。不過我們眞正的問題，是原子彈究竟是不是容許我們作此種妄想。因爲原子彈的潛在力旣這樣鉅大，我們就是向地底下鑽入很深，能不能獲得安全，還是大有問題。當此戰氛的消泯還在未定之天的時代，人們的自殺動機旣這樣地熱烈，不惜以原子彈爲他們可採用的最輕易的方法，亦爲意中應有的事情。

講到原子彈在平時的應用，科學家所發現者爲何，此物的平時潛在的功用爲何，除了他們間有幾位所發表的含糊的初步說明外，我們還不能充分知道，總之，人們終究是作儉約的打算的。縱令原子彈的力量可以駕馭的話，除非每馬力或每瓩的成本是比煤，比油，或瀑布爲低廉，決不至去利用的。原子彈是在戰時製成，所以人們對於成本問題，遂不暇顧及。最初的兩枚原子彈是每枚成本達十億美元之鉅，最初的十枚是每枚達二億美元，以下照此例推。但是與大衆所知相反的，科學家對於原子所發現的鉅大爆炸力，現固不能在充分小的單位內作有控制，使其具有實用價值，然而彼等終有一天會把幾粒原子分裂，並引導所產生的能，充一切實用目的所需的取用不竭的動力。故此種努力所發生之影響，定甚重大，絕非吾們現在所能想像。人們全部工業的規模，當大爲縮小；美國油業廠家發言人曾聲明，彼等的市場將要失去一半——卽使用動力的市場，現只能希冀保其餘的一半

——即使用擦機器油的市場。此種聲明似失之過於樂觀，因爲一個擁有鉅量煤或水電資源的國家，今後將非喪失了它所享的天惠不可。不過，假定鈾礦與他種必要的天然元素成爲國際化，則此部份世界將與另一部份世界成爲一樣的富有，工業中運用的動力必成本僅佔總成本的一部份，在過去因爲人們的汗血很低廉，所以機器的使用不能盛行，今後人們很費氣力的任務，當歸有不能用機器去替代的了。如是我們就可把經常每週四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大爲減少，來把我們的生活水準抬到任何有益的高度。至於好致力於創造的人們，如發明家，科學家，著作家，藝術家等，爲了想要完成某種產品，還是經常每週繼續工作到一百六十八小時，雖則他們本人未嘗不感覺到痛苦，而自怨自艾。惟我們對於將來所做的燦爛的迷夢，並不是因爲原子彈的製造成功這個新聞，而爲之雀躍不已。據華盛頓方面報告，這個首都裏的人們聽到消息傳來，爲之心緒不寧者累日。我們相信這正是一種普遍的反應。每個美國人都願意看到對日戰爭的早日結束，今因原子彈的使用，居然達到目的，能無欣慰；但是他們想到此物在廣島及長崎不到一瞬間便把日本的平民，男女老幼，消滅了十萬到十五萬之多，則又鬱鬱寡歡了。我們本人道主義的立場，不問對於這許多無辜喪命者，是如何憐憫，然而因爲有這一大批無辜者的化爲灰燼，遂迫使日本的瘋狂統治階級投降，戰爭得以提前終止，還有更多的人民不致再受犧牲，故想到此點，又衷心稍慰，把悲感減少很多。竊意一般人對於原子彈所抱的憂慮，是關於對日作戰者少，而關於此物將來在他處，尤其是對我們自己，或我們的兒輩使用時者多。我們不能不坦白承認，就人類歷史來說，我們想希望爲造福而非貽禍於人類的目的，來控制此項新武器，並開發其種種可能性，是不易如願的。如我們回溯過去，便知道人類自從蒙昧以躋於文明以來，每次所作與此相類成就，不過是增加流血與恐怖而已。但是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應該設法把原子能的奧蘊如何方可成爲造福而非貽禍於人類的東西這個問題解決。

（註）本文原名 The Bomb and the Future。 載本年八月二十日 The New Republic。

漢里名考

施子勉

漢時里名，見於載籍者衆矣，非止許冲上說文表一見召陵萬歲里也。

勞榦居延漢簡考釋序，漢代戶籍是以里爲基本的，現在只有許冲上說文表的召陵萬歲里公乘臣冲一個孤證。現在居延有大批的名籍都著上爵里，使我們看到漢代軍籍和保甲制度有密切關係的。

沛豐有中陽里。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同書，盧綰傳，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

長安有戚里。

史記萬石傳，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索隱，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爲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

有函里。

水經渭水注，長安城，第三門名、，本西城門，亦曰雍門。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

有張里。

文選張衡西京賦，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李善注，張里，里名也。

有尙冠里。

漢書宣帝紀，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曾孫時會朝請，舍長安尙冠里。又，光奏議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奏可。遣宗正德，至曾孫尙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師古曰，尙冠者，長安中里名。王先謙曰，通鑑注引黃圖，京兆尹尙冠里。

茂陵有陵里。

史記萬石傳，建元二年，萬石君徙居陵里。索隱，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茂陵邑中里也。劉攽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案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置茂陵邑。三年春，賜徙茂陵者。顏說陵里在茂陵當有據。萬石君蓋於建元二年，自長安中戚里徙居於此者，劉攽之非。

有顯武里。

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云，此下奪遷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案自序，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考史公本夏陽人，而云茂陵顯武里者，父談，以事武帝，故遷茂陵也。（史公父子於元朔二年徙茂陵，詳太史公行年考辨疑。）大夫者，漢爵第五級也。漢人履歷，輒具縣里及爵，扁鵲倉公列傳，有安陵阪里公乘項處，敦煌所出新莽時木簡，有敬德亭間田東武里士伍王參是也。或并其年，敦煌漢簡有新豐興盛里公乘□殺之，年卌八，又有□□中陽里大夫呂年廿八，此云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三十八，（當仍原文作二十八，王改二爲三，誤，詳太史公行年考辨疑。）與彼二簡正同。乙卯者，以顓頊曆及殷曆推之，均爲六月二日。由此數證，知博物志此條，乃本於漢時簿書，爲最可信之史料矣。

有成懽里。

後漢書馬援傳，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又本傳云，援與公孫述同里閈，相善。）章懷注，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懽里。

同書，公孫述傳，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章懷注，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

魯有闕里。

後漢書郡國志，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

同書儒林傳孔僖傳，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魯有孔里。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或者孔里，至漢猶存，故附記於此。

有奄里。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

時，嘗與魯穆生，白生，中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奄里人。

齊有章武里。

史記倉公傳，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

有遝丘里。

後漢書郡國志，齊國西安有遝丘里，古渠丘。

臨菑有元里。

史記倉公傳，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又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

有汜里。

史記倉公傳，臨菑汜里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

有召里。

史記倉公傳，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

潁川有西豪里（又號高陽里）。

後漢書荀淑傳，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章懷注，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

有養陰里。

後漢書郡國志，潁川襄有養陰里。

水經，汝水注，養水自南陽魯陽來，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

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陰里。

陽武有庫上里。

史記陳丞相世家，里中社，平爲宰。索隱，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也。

御覽五百三十二，引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曰，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勉定天下，爲右丞相。孝明之世，虞延爲太尉。熹平中，延曾孫放，以宰相繼踵，咸出斯里。雖有積德修身之效，亦斯社所相，乃樹碑云。

元城有委粟里。

漢書元后傳，王賀字翁孺，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爲武帝繡衣御史，以奉使不稱免。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

湖有泉鳩里。

漢書武五子傳，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臧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又，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

南陽有步光里。

世說新語規箴篇劉孝標注，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光里人。

外黃有曲棘里。

後漢書郡國志，陳留外黃有曲棘里。

菑川有唐里。

史記倉公傳，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

安陵有阪里。

史記倉公傳，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

鉅鹿有東里。

漢書路溫舒傳，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

彭城有廉里。

漢書兩龔傳，龔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眞定有漆里（據郭皇后紀，漆里在眞定槀縣。）

後漢書劉植傳，時眞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眞定，納郭后，后卽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迺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揚擊筑爲歡，因得進兵，拔邯鄲。章懷注，漆園，卽郭氏所居之里名也。劉攽曰，案文無故忽有園字，蓋本是里字。

新野有阿里。

後漢書范式傳，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又，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章懷注，阿里，里名也。

凡斯里名，具見史漢各書，居延漢簡考釋迺謂止有召陵萬歲里，蓋偶有不照也。其爵里並著者，召陵萬歲里公乘許冲外，又有臨菑元里公乘陽慶，安陵阪里公乘項處，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亦不得謂爲孤證，因略考漢代里名，以諗學者，而袪惑焉。

北洋大學五十年之回顧與前瞻

——三十四年十月二日爲北洋大學五十週年紀念而作——

李書田

一

我國科舉取士，降及有清，爲弊愈甚，士習萎靡，兵無鬭志。鴉片起南兩役，相繼喪權辱國，並啓強權窺伺之心。有識疆吏，嗣雖奏設馬尾造船廠，及江南製造局等，惜祗仿洋務之皮毛，未能奠立物質建設於科學教育基礎之上。而慈禧禍國，卒釀甲午戰敗，國運益危。遠識廷臣，始悟銳意圖強，必須廢科舉，興新學。翌年乙未（卽前清光緒二十一年），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　中山先生廣州舉義，康有爲公車上書，袁世凱小站練兵。在此一劃年代之大事中，最可紀念者，莫如北洋大臣李鴻章據津海關道盛宣懷之稟陳，奏設天津大學堂於天津小營門外之創舉，是爲我國教育史上廢科舉之先聲，與新學之第一頁，開辦現代大學之先銘，幷奠立法學科學與工程教育之始基。

二

天津大學堂於光緒二十一年陰曆八月下旬創立，經費由津海關解部庫款，逕行撥充，延聘美籍名教育家丁嘉立博士爲總教習。大學堂內分設頭等學堂及二等學堂，由伍廷芳及蔡紹基兩氏分任總辦。頭等學堂卽大學本科，二等學堂卽大學預科。頭等學堂復分設法律學門，土木工程學門，探鑛冶金學門，及機械工程學門，均四年畢業。課程編排，講授內容，授課進度，教科用書，均與美國東方最著名之哈佛耶魯等大學相同。創設伊始，卽分在天津、上海、香港招生。國際名法學家王寵惠博士，名鑛冶學家王寵佑先生，均係分在頭等學堂法律鑛冶等學門第一班畢業者。名外交家王正廷博士，名煤鐵實業家李晉先生等，亦均係於此時受業。其他社會名宿，在此北洋開創時期曾肄

業於北洋者，茲不贅述。當時一切官費，月考優異者，額外獎以銀兩。此時教授大抵悉爲美籍碩學鴻儒。我國大師吳稚暉先生，曾於此時擔任國文教授，迄至此次大戰爆發以前，日內瓦國際聯盟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始終向其吳委員以北洋大學教授恭稱之。在此開創時期，因其程度，已與美國哈佛耶魯等大學相伯仲，故北洋畢業生自第一屆起，已可逕行進入美國各著名大學之研究院。此自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成立時起，以迄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止，是爲北洋大學創始時期。

三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義和團變起，八國聯軍進入平津，天津小營門外大學堂校舍，悉被德軍強佔。翌年簽訂辛丑條約。復劃天津小營門外爲德國租界，大學堂校舍亦淪爲租界之一部分。是爲北洋大學有史以來所遭第一次大災難，亦我國首創之大學橫遭帝國主義鐵蹄蹂踏之第一次。美籍總教習丁嘉立博士，深痛五載興學，夷爲異國營房，爰親赴柏林，向德政府力爭賠償，卒索到賠償費海關銀伍萬兩。迄次年光緒二十八年，計此兩年，爲北洋大學第一次中斷時期。

四

光緒二十八年，政府將天津西沽武庫全址及所有房屋，撥作大學堂校舍。至是正名爲北洋大學堂。復應用該賠償費伍萬兩，添築偉大校樓一所，上建四面鐘塔，高聳津沽，巍然學府。白河堤畔，武庫舊址，遂一變而爲大學講學之所。房屋逐年添建，設備愈益充實。夾道桃堤，南接西沽，數年成蔭，蔚爲名勝。是時法科工科各學門，除機械工學門外，均繼續辦理。大學本科，改爲三年畢業，法科仍須四年畢業。投考大學者，必須先在各省高等學堂畢業。嗣爲適應外交需要，北洋大學添設俄文班及法文班。更爲造就中學師資，復增設師範班。政府於此時復賦予丁嘉立博士以直隸全省中學督導之權，儼然如後來試行之大學區制。北洋大學之聲譽益高。其在中南各省，嚮往尤般。然始終重質不重量，教學謹嚴，風格獨存。丁嘉立博士慘淡經營，不遺餘力。北洋之得於庚子後復興，而蔚爲東方有名學府者，皆丁先生之功也。故以外籍教授，得膺清廷紅頂大員。嗣奉命代辦北京美使館，改由早年留英研究海軍科學卓著聲譽之王劭廉先生，繼任總教習。王氏學問淵博，治校嚴明，校章所定，貫徹始終，不惟學生敬畏如神明，而且外籍教授莫不心悅誠服，不敢有半分之違誤。北洋功課愈以森嚴聞世，望門躊者愈多，良風所播，直迄今茲。光緒末葉，需才益亟，時袁世凱任北洋大臣，先後資送北洋大學未畢業生全班赴美留學者數次，赴日留學者亦數批，成材甚夥，多爲民國以還，國家社會所倚畀。我國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名醫學家劉瑞恆，名數學家秦汾，鹽政名宿鍾世銘朱庭祺馬泰鈞等，名銀行金融家錢永銘，名冶金學家溫宗禹蔡遠澤等，名法學家趙天麟馮熙運等，名軍事家溫應星，交通名宿劉景山，名工程教育家羅忠忱，名師範教育家李建勛齊國樑等，均爲此一時期所孕育之人才。其他尙多，茲從略。此自光緒二十六年以迄宣統三年，是爲北洋大學之第一次復興時期。

五

辛亥革命，除舊佈新，北洋大學堂更名爲北洋大學校。然北洋大學自成立以來，講習盡爲新學，教授均夙持民主精神，專制餘毒，自始未曾進入北洋，所有民元以前學生，咸富革命思想，多爲民元以來黨國先進，政府棟樑，社會中堅，外交司法工鑛教育之先導。民元以後，校內實際主持校政者，仍爲王劭廉先生。保定直隸高等學堂，於民元併爲北洋大學預科，分爲第一部及第二部，預科第一部畢業者，升入法科，第二部畢業者，升入工科各學門。本科預科均係三年畢業，法科本科仍須四年畢業。其他教學校風，一如往昔，直迄民國六年。民四以還，趙天麟先生繼長北洋，對於王劭廉先生之成規，善盡蕭規曹隨之道。自民元以迄民六，北洋大學漸由繼續復興時期而進入守成時期。

六

民國六年，北洋分科，發生變動。時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先生以德法大學編制，夙無工科，而且北京北洋兩大學，近在咫尺，法工兩科，相互重復，爰建議教育部，自該年起，北京大學工預科畢業生，悉升入北洋大學工科，北洋大學法預科畢業生，悉升入北京大學法科。於是民九以後，北大工科及北洋法科，同時全停。嗣後北洋專辦工科。此一變動，影響北洋匪細。光緒二十一年以來之北洋法科，歷史悠久，聲譽素隆，教學謹嚴，司法外交異才，相繼輩出。庚子以前固已產生王寵惠王正廷諸氏，而西沽初期，復有趙天麟馮熙運諸法學家之繼起，民九以前，徐謨、金問泗、吳南如等諸外交家，及名法學教授燕樹棠氏，又相繼問世。故北洋法科之停辦，論者莫不惋惜，北洋法科校友，今猶痛定思痛也。

北洋成立之初，悉沿美制。光緒末年，以迄民國六年，本科改爲三年畢業，法科仍爲四年畢業，係仿日本帝大制度。自民國六年起，仍改美制。本科均增至四年畢業，預科縮爲二年畢業。同時因法科之起始停辦，遂將礦冶工程學門，分爲採礦工程及冶金工程兩學門。筆者與孫輔世、林平一、王德滋、陳立夫、曾養甫、葉秀峯、周志宏諸氏，於是年考入北洋。歷趙校長天麟及馮校長熙運之治校，教授仍擬爲美籍名工程學者。雖校政趨於保守，教學依然舊風，或更較前加緊。民八以後，學生運動日烈，教授督課仍嚴。六載鑽研，歷經數百考試，咸有文憑難得，學問無涯之嘆。回憶投考者數千，祇百餘同時考入，六載淘汰，至畢業時，土木採礦冶金三學門，僅餘二十有五人矣。

趙校長天麟，受教於北洋復興之初，民初爲法科教授，民四以迄民八，長校四載，追溯成立以來，北洋之特殊風格，與特出精神，凝會四字「實事求是」，定爲校訓，永矢遵行。北洋每一同學一生之所不能忘，一生之所不肯須臾離者，爲此「實事求是」之四字校訓。歡千校友之共同風格，亦在其治事之莫不實事求是也。

馮熙運博士亦曾受教於北洋復興之初，幷亦於民初爲法科教授，其長校時期，最可稱述之一事，爲新宿舍大樓之建築，學生生活，由以前二十年來武庫舊房所隔建之式如包廂，垂簾藍布之宿舍，移進此空氣流暢，光線充盈之新宿舍，不啻出於幽谷，遷於喬木也。

綜計自民國六年學制變更與分科變動，以迄民國十三年馮校長之去任，是爲北洋大學保守時期。學風固依然舊觀，大學仍不失爲講習高深學術之所，在當時環境之中，亦屬難能而可貴也。

七

民國十三年，劉振華（仙洲）先生繼長北洋。自十三年以迄民國十七年南北統一之際，經費常常積欠，校務推行，至感不易。劉校長抱擴充北洋之大志，以限於經費，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然猶竭力將事，夙夜匪懈。北洋成立之初，即有機械工程學門，庚子以後，機械學門未復，劉校長以機械學者，於民國十四年奮力恢復機械工程學門。劉氏治校精勤，曾於公餘細心考證檔案，終將光緒二十一年陰曆八月下旬北洋大學創立之日，經多方之考據對照，證實國曆十月二日爲北洋大學成立紀念日，此後遂永定施行。劉校長任內，外籍教授漸少，本國教授漸多。此舉爲是爲非，論者不一。然而學術獨立，固亦學術進展之大道，未可厚非。當時本國名工程學者，如茅以昇博士，侯德榜博士，溫宗禹博士，以及石志仁等，均任北洋教授，時筆者亦於民國十六年濫竽土木工程教授。此一時期，自民國十三年以迄民國十七年，是爲北洋大學之艱難奮鬭時期。

八

民國十七年南北統一，大學院派員接收，指定何杰教授及筆者暫行維持。旋北平大學區成立，北洋易名爲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聘茅以昇博士爲院長。十八年春，不幸失愼，庚子以後所建之大樓，悉成灰

鑛。工鑛大部及地質全部設備精華，盡付一炬。比庚款會撥款補助另建。同年北平大學區制廢止試行，各校院獨立。教育部蔣部長夢麟，鑒於北洋大學歷史悠久，成績優異，特提請行政院會議通過，暫稱國立北洋工學院，同時籌備恢復北洋大學。嗣經教部依據行政院決議，聘請王寵惠、李煜瀛、王正廷、王劭廉、趙天麟、陳立夫、茅以昇等七人為籌備委員。茅院長以名工程學者兼工程教育家，且曾任北洋教授，來長北洋，本可大放異彩，奈正值多難，事與願違。然茅院長對北洋今後復興有一不可泯滅之功績，即在此時已埋下籌復北洋大學之種子。惟惜大學籌委會，嗣後八年之間，未得開會一次。十九年蔡院長遠澤（惠臣）以名畢業生，復曾任冶金工程教授及教務長，久以嚴師著稱，學望夙孚，回母校長院後，咸慶可以恢復王劭廉先生時代之勝況。乃以經費時欠，支絀異常，僅勉強大體完成比庚款補助之大樓。嗣因肺疾經年，堅決請辭，於二十一年經教部聘筆者繼任。計自十七年南北統一以後，迄二十一年秋，是為北洋多難時期。

九

筆者受教北洋，嗣後曾任專任教授，中間一度維持院務，旋仍兼授專門課程。北洋為筆者母校，蔡院長係筆者業師，辦學精神，固應舉步以相隨，力求充實，以完成蔡師未竟之志。於是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皆着重院務之安定與整理，并與其他九學術及水利機關，合辦中國第一水工試驗所於天津。二十二年起，土木工程系改招雙班，分為土木工程組，及水利工程組。同年停辦預科改稱之附屬高中，集中力量，專辦本科各系。二十三年教育實業兩部呈請行政院會議通過，由北洋與地質調查所，中國礦冶工程學會，及中華民國鑛業聯合會，共同舉行全國鑛冶地質聯合展覽會於北洋，此為我國有史以來鑛冶地質聯合展覽之創舉。閉會後標本模型及其他展覽品，頗多承贈於北洋，其中地質鑛物岩石鑛產標本尤夥，恢復火災以前之舊觀且有過之，蔚為全國各大學中收藏此類標本之最多者。旋復編刊「中國鑛冶地質要覽」，發行甚廣。斯會出力最多者，為曹誠克及譚錫疇兩教授。翁詠霓先生及李組紳先生各以聯合展覽會主任籌委及籌委資格，賜助尤夥。同年鑛冶工程系，分為採鑛工程組，及冶金工程組，并添設電機工程學系。二十四年機械工程學系，分設機械工程組，及航空工程組。同時開辦工科研究所，先成立鑛冶工程部，分置採鑛工程，冶金工程及應用地質三門，開始招考研究生，首屆於二十六年大戰前夕授予碩士學位。二十四年秋，建築工程實驗館，翌春完成應用。二十五年冬，因華北情形危急，筆者親自赴陝，勘定西京分院院址，正式承陝省府撥贈，嗣曾請款略建西京分院校舍，未邀部允。二十六年一月，奉教育部長面囑平津各校院勿遷移設備。旋完成籌備恢復北洋大學計劃及概算，於二十六年四月，送請北洋大學籌委會在滬召集第一次會議通過，由經籌委會王主任委員亮疇以公文送請教部核備施行。同年春，在火燒大樓遺址，建築可容二百人同時閱覽之圖書館，藏書量五十萬卷，建築用費大半係校友捐助，祇請政府撥發一部，三層甫完成一層半，即逢七七事變。此數年來，美庚款英庚款復相繼補助，且各贈設講座。此時教授，大部雖為我國學者，然猶有英美籍教授三人。教授研究，亦蔚成風氣，其中有創造性之論文選印為研究叢刊者十有六種。至七七事變之前夕，老校友李組紳先生，尚在平決定捐設二十噸試驗化鐵爐於西沽本校。正期繼續邁進，不幸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津沽淪陷，北洋奉令遷陝，數年奮力發展，不堪回首。然自二十一年以迄二十六年謂為北洋工學院之擴展時期，或尚不為過。

一〇

二十六年八九月，因津沽業已淪陷，北洋遭受其有史以來之第二次大災難，亦我國首創之大學橫遭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之第二次。於是北洋奉令遷陝，與北平大學，及北平師範大學，合組國立西安臨時大學。事稍定，因抗戰需要，即着手從事工程學術之推廣，對於改善西安飛機場，增闢陝西公路，多所協助，復派員生調查漢水流域沙金

蘊藏，期稍裨益國計。三校合作精神，較之其他聯合校院，有過之無不及。二十七年七月底，忽奉令由西北聯大工學院，與東北大學工學院，及私立焦作工學院，合併改組爲西北工學院。筆者奉命主持籌備事宜，深知各院校風不同，歷史各殊，事非易舉，而良果難期。北洋同人同學咸以抗戰方殷，本院願犧牲一切，恪遵功令，爲西北工程教育奠萬世之基。爰自九月間，積極籌備。北洋原有水利工程及航空工程兩組，均請准教部擴充爲系。合組四院員生，爲土木、水利、礦冶、機械、航空、電機、化工、紡織等八系。幷於工科研究所之外，另正式成立工程學術推廣部，測繪南鄭城區，測量設計改進玉門堰水利，調查鳳徽兩縣礦產。至十二月中旬以後，四院員生齊集城固古路壩，開學上課，完成一件不得已之舉措。嗣雖發生波折，終由北洋員生之爲國忍耐犧牲，得以奠立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礎。故自二十六年九月以迄二十八年春間，是爲北洋工學院不得已而脫胎換骨，爲國犧牲，奠定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礎時期，自此而後，以迄三十二年三月，又爲北洋第二次中斷時期。

一一

二十八年春，全國校友以北洋母校併組西工以後，校名不存，結果不良，校風不保，痛名實之俱亡，頓生獨立復校之思潮。於是詢謀僉同，高唱入雲。筆者與北洋有多年之深切關係，心不後人，但亦深知教部之困難，在水到渠成以前，難得有效之結果，固非敢忘懷也。此種忍痛情景，在西工員生與各地校友，固亦天涯同此心也。歷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以迄三十年，北洋一部教職員，既建立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於西昌，繼漢武帝置越嶲郡以後，首於斯地奠立農工醫高教機關之基礎，復繼葉秀峯同學之後，籌備完成國立貴州農工學院於貴筑之花溪，開以後貴州大學之先河。然在校員生，以及各地校友，復校思潮，仍與日俱增，有一發而不可復遏之勢。此自二十八年春以迄三十年十月下旬，是爲北洋校友忍痛醞釀復校時期。

一二

嗣於三十年十月下旬，中國工程師學會及各專門工程學會，舉行聯合年會於貴陽。各地校友，到者極衆。爰即舉行北洋校友臨時大會，一致主張復校，情況熱烈，已達極點。然教部仍不無困難，筆者提議私立復校，募款辦學，當經通過，舉定籌委。會龔甫孫越崎兩同學，分任正副主委，筆者以籌委而兼總幹事，幷推定筆者及茅前院長爲私立北洋工學院正副院長。是晚討論至午夜一時而後散。嗣即着手進行，至三十一年夏，筆者擺脫貴州農工學院院長職務，專事私立北洋工學院之籌辦，茅院長隨時協助，及至行將招生，國立議起。是年九月在渝籌委集議，決定額請國立。乃離筑來渝，一同奔走。至三十二年二月下旬，政府任筆者爲黃河水委會副長，然母校未復，不敢遽拜命。至三月下旬教育部提請行政院會議通過，浙江省立英士大學，改爲國立英士大學，其中工學院劃出獨立，仍照舊設置土木機電應化三系，幷以北洋校友捐款補助該院，定名爲國立北洋工學院，至抗戰以後，師生併入天津大學，設備仍留還英士大學，恢復其工學院。當時因政府不准增加預算單位，而在不得已之情形下，使北洋得以復校，以慰全國校友之殷望，辦法雖難稱澈底，而當時教育當局之苦心，實應爲全國校友所感諒也。筆者欣慰之餘，遂即飛往西北，良以母校既得再生，於心已安，正可另於水利事業爲國努力也。此自三十年十月下旬，以迄三十二年三月下旬，是爲北洋校友積極恢復北洋工學院時期。

一三

筆者於三十二年四月初離渝，視察甘青黃河上游水利情形後，於五月初，抵西安任所。方期專事致力治黃研究，稍補民生，而二十五年承陝省府邵主席力子准予撥贈北洋之西京分院院址百三十畝，首先觸懷。回憶承贈之時，曾允籌辦分院。蔣銘三先生主陝時，復承力子

保護校產。更思秦嶺以北陝、甘、寧、青、新、綏六省廣大地區，尚無其他工學院。建設西北，首重交通，次推水利；隴海寶天兩路，西北公路，及黃委會與陝水利局，皆近在咫尺，實習觀摩，俱各稱便。西安爲西北首府，迄今尚無任何國立高教機關。省府有意開辦之本專，前以預算而未果。北洋既承贈撥校址，義當及早辦學。雖既已復校泰順，西安仍宜添設分院。并爲充分利用校址，培植優良升學青年，爰又發動募款，籌創私立西京北洋中學。至三十二年底，校址復經熊主席哲民力予保全。爰決心實行八年前創建分院之既定計劃，於三十三年春，正式請准教育部，籌創分院，并積極籌爲私立西京北洋中學募款。至同年九月，教育部因遵照　總裁手著「中國之命運」，實施增加訓練技術人才，遂撥發經費，正式籌創分院、允先招兩班。十月底首次招生，報考者千人，祇收錄百零八名，仍本北洋過去重質不重量，「實事求是」之精神，選拔優秀，培植眞才。經晝夜籌備，於十二月中旬正式上課。復請准分設土木工程及水利工程兩學系，每系各一班。教授皆爲碩學鴻儒。師生奮力，免放各種例假，專事教學，至三十四年七月底，充分完成一學年課業。并一面闢地設校，建築校舍圍牆大門，至三十四年夏，規模設備，俱已粗具。各界紛以建築材料圖書機械獎學金等相捐贈。私立西京北洋中學，已承校友及社會各界募集數百萬圓，正擬開辦，以爲北洋大學五十週年壽。三十四年度北洋西京分院各項經費及招生系別班次，亦先後於同年五月底及六月初，悉奉經教育部核定。不意教育部突於六月六日(卽工程師節日)，電令北洋西京分院歸併西北工學院，同時泰順北洋工學院亦奉令歸併英士大學，當此國家正需大量專門人才之時，何以遽裁減工學院，殊屬費解。電令中所指北洋西京分院經費未充，基礎未固兩理由，前者其責在部，後者爲期尚短，理應扶植，豈宜拔苗。現姑無論北洋西京分院之師資與學生程度，是否在其他國立校院水準之上，但西北秦嶺以北，高教機關，有識之士及今教育當局，尚均嫌過少，更無裁併之理。且昔年北洋，曾一度併入西工，因彼此難以相處而分開，豈宜舊事重演！且北洋教職員多係抗戰後間關內來，苦撐八載，今逢勝利，遽令遣散，未免不情！縱然必須裁併，亦應俟北洋戰後提前在津復校之定案實施後，逕行併入天津本校，庶兒還母抱，各得其所。近據電訊泰順北洋工學院全體學生，堅決不願赴英士大學註册，北洋西京分院全體學生，堅決不忍離院，兩院學生聞均堅持到底，不忍離去其母校，而寄生於他校，尤不願因移併而使母校淪亡，更不願離開歷史悠久之母校，而被併於成立僅僅數年之校院，將來如何合理解決，祇待當局之洞察。然無論如何，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將永爲北洋籌創西京分院之不可磨滅時期。自茲以後，至北洋大學在津正式籌復以前，倘泰順北洋工學院及西安北洋分院，不獲繼續辦理，則北洋又將入於第三次中斷時期矣。

一四

北洋大學之籌復，十八年行政院已早有決議，并經當時教育部蔣部長夢麟聘請王寵惠、李煜瀛、王正廷、陳立夫、王劭廉、趙天麟、茅以昇等七位爲籌備委員。二十六年春，筆者完成籌備恢復北洋大學計劃及概算，遂請二十六年四月在滬召集之第一次會議詳細討論通過，并推定王委員寵惠爲主任委員，筆者爲總幹事。會議後入京，經王主任委員將通過之復大計劃及概算，送請教育部核定施行。旋抗戰開始，不得已籌備工作暫停。近來抗戰勝利前後，朱部長復迭次聲明，抗戰後北洋大學必當在津提前恢復，北洋大學校友總會亦函催籌委會積極進行。爰經籌委會在渝先後舉行第二次及第三次會議，代電教育部報告業在積極籌備進行，并請教育部迅行起始實施恢復北洋大學在案。

關於院系之分期設置計劃，業經籌委會決議，北洋大學除設理、工、管理三學院，以與教育部復員計劃相符合外，因北洋法科歷史悠久，成績優異，應請教育部准在第一期恢復法學院，依大學組織法之規定，可單設法律學系，更俟稍發展後，第二期添設醫學院，不分

系。理學院應設數學、物理、化學、地質等四學系，俾與工學院各學系相輔翼。工學院應恢復從前原有之各系組，爲土木、水利、採礦、冶金、機械、航空、電機、化工等八工程學系。管理學院應設財務管理、工礦管理、交通管理等三學系，以適應我國今後現代事業設施之需要。至第三期應擴充理學院爲文理學院，并在法學院增設政治及經濟等學系，均俟第一二期完成後，再行決定。此其一。關於校址分配，業經籌委會決議，理工兩學院，仍設於天津西沽北洋大學原址；法及管理兩學院，則設於天津小營門外庚子前老北洋舊址；將來醫學院，因有附屬醫院關係，亦應設於市區小營門外舊址，庶幾接近病人。此其二。關於物質方面：兩處校舍，八載慘遭兵燹，俱待及時修繕；戰前校友捐建之大圖書館，三層祇已完成一層有半，更待建築完成；水電設備，亟應整理；傢俱尤須大量補充；圖書儀器以及實驗設備，抗戰初起運儲校外者，即須覓運回院，并力加補充。此其三。關於教授之羅致：必須敦請戰前所有原北洋教導優良之教授以及畢業生中在其他校院擔任教授之有特殊成績者返院，始能保持北洋教學之一貫謹嚴精神，發揮過去五十年來「實事求是」之優美校風。外籍第一流學者，凡能長期來華專任教授者，并宜隨時羅致。此其四。泰順及西安兩院，爲北洋數千校友於抗戰期間費盡千辛萬苦始獲創復者；所有員生，均係北洋員生；一俟本校恢復，悉應還校津沽。此其五。戰前北洋已設有工科研究所，在津復交後，應即設置研究院，先設理、工、法三研究所，措籌研究經費，充實研究設備，以資發展學術研究。此其六。此後北洋招考學生，應在寧缺勿濫之原則下，期達質量并重之目標，俾能培植真才，適應廣需。此其七。德、體、羣、美各育，每多忽略，新北洋不惟應發揚原有優良校風，尤宜於生活管理，體育訓練，課外活動，美感哲學方面，循循善誘，造成人人不僅爲學術專家，以成於內，而且個個爲領導通材，以應於外。此其八。學術機關，必須由安定而力求邁進，過去多難，原因衆多，此後希望政府社會以及校內員生，能有長治久安之道，一致向學術真理，加速追求，達成大學之最高使命。此其九。任何事業之發展，須賴經濟爲其基礎，北洋過去之多難，不能自力更生，亦其一因。希望今後治校者，爲北洋造產，善爲管理，獨立會計，期達將來自力更生循序發展之理想境地。此其十。

筆者深信今後政府及北洋大學負責人，並以全國校友之協助，必有以不負北洋過去五十年之輝煌歷史，發揚光大此成立最早之大學。茲當北洋五十週年紀念之日，爰成此「北洋大學五十年之回顧與前瞻」一文，追述既往，展望未來，略爲母校誌壽，尚希國內賢達，北洋校友，有以教之。

佛教的聖城——伽耶

李樹青

——天竺遊蹤瑣記之三——

約在兩千五百年前，當釋迦佛出生時前後，恆河中游一帶地方由於新興的環境，產生了一些新興的國家（拘薩羅國與摩揭陀國等都是其中最強盛的）。這些新興的國家，大概都由於一些富有朝氣的新興民族所建立。就種族言，恐怕是即使還有雅利安血液的話，也是非常之稀少的，因而這些民族並不能完全接受建立於恆河上游的傳統的吠陀文化。他們似乎不願意接受雅利安民族以征服姿態所淛造的所謂婆

羅門至上與祭祀萬能等機械主義與教條主義。由於這種對於新文化的要求以及各國國王對於學術的獎勵，當時在這個區域裏面，學說蠭起，百家爭鳴，正所謂『各欲以其道易天下』。佛教不過是當時許多派別中的一派。與中國的歷史比較起來，釋迦生時雖約略與孔子同時而稍早，相當於春秋時代；但當時印度的狀況却十分相似我們的戰國。

這個區域的國家既然崇尙學術，愛好自由，故一切反吠陀的新興學派，均集中到這裏來。奧義書便是這種自由研究的產物。佛教當然也沒有例外。所以在佛修行得道與轉法輪的五十餘年中，大部時間均消磨在這些地方，而留傳到現在的佛教的聖地，也大都在這個區域以內。伽耶的成爲佛教的聖城，誠然不是如後來所傳：佛先登上鉢羅笈菩提山（此言先正覺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結果『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釋迦遂不得不南往菩提樹下的金剛座(見大唐西域記卷八)。實際上，佛的反品級 (Caste) 佛經上譯爲種姓反婆羅門的理論，也只有在這種新興民族後起文化中，纔能得到印證與感興。佛在決心出家修行以後，立刻即從他自己的迦毗羅衛向東向南跑到這個區域，可見並不是偶然的。

就地理方面而言，在恆河流域的平原上面，東起加爾各答，西迄德里，數千里間，全係一望無際的平原。只有在伽耶週圍這個約百里之間，纔有一點崗巒起伏的山脈。因而這個區域的風景，便較其它完全是平原的區域爲佳。修行與證道學人的麕集於此，山川與風景的引誘力，恐怕也不失爲一部份的理由。

我於七月十二日淸晨抵達伽耶車站。伽耶既爲佛教的四大聖地之一，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這個城市附近的佛教遺蹟也特爲繁夥。我們對於佛教思想與印度具有興趣的人，既然得到了來遊印度的機會，又安能不抽閒加以拜訪？下車以後，略事休息，便租賃了一輛脚踏東洋車巡視全城。本來，在印度的佛教聖城多數均已荒廢。在紀元後五世紀之初法顯法師來訪這個城市時，曾有『城內空荒』的記載。玄奘是在七世紀中葉以前來此的，大唐西域記載有：『城甚險固，少居人，惟婆羅門有千餘家。』（卷八）可見亦係一座荒城，可是今日的景象却與一千兩三百年以前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大概因東印鐵路經過此城的關係，城內絕不空荒，其城內繁華街道集中地，所謂四面鐘一帶，眞是市廛櫛比，人烟稠密，其熱鬧程度比較起我們的重慶來，也可謂不相上下。

在城內兜了幾個圈子以後，車夫便騎車繞出城外，向着距城二十餘里的佛陀伽耶 (Buddha Gaya) 奔馳下去。將一出城，有幾座孤立的山峯便闖入了眼界。靠近城市的一座山上還有一座廟宇與修了一條上山的石路，這恐怕不是所謂先正覺山吧？先正覺山是佛教的名山之一。據玄奘的記載：『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窣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華雨空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還』。足見當時的盛況。時至今日，佛教既早經湮滅，此山亦復荒涼。據加城友人謂：山上除亂石荒草以外，更無別物，因而我也未往朝拜。

出城不遠，即循着一條溪流上行。這條溪流即佛經所謂尼連禪河也。現當雨季，水流之小，沒脛可涉。但見兩岸黃沙滾滾，野草萋萋。據阿含經記載，釋迦證道前曾在此河沐浴，幾乎溺斃，天按樹枝始得攀援出池。今溪流的乾涸至此，不唯不能溺人，根本即無法沐浴。見此景況，覺得自然界又何嘗不在滄桑變幻，又豈止人事上的興衰而已。

所謂脚踏東洋車，係把人力車安放在脚踏車的後面。在平坦或下坡路上到是相當迅速，但是一經遇到上坡馬路時，便走得異常遲緩。有時騎車的車夫不得不下車來推行。所以從車站到佛陀伽耶這二十餘華里的路程，直走了約兩個鐘頭。沿路上有成羣的印度兒童，隨身奔跑，乞討零錢。一個小孩，看來不過是四五歲的光景，竟隨車跑了約三華里。口中還不住念着一些懇求與乞討的調兒。印度這個區域內農村的疲餓與貧困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最後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在一個崗埠上面，車夫便說佛陀伽耶已經到了。剛剛走進村去，迎面便是一座大塔，巍然聳立，古色斑駁，足徵多歷年所。據說：這個窣堵波的大部是從土裏掘撅出來的。在入門處須降下幾級台階，當門有一個石柱，高約八尺，直徑不到一尺，雕工亦並不精緻。導者謂係無憂王（Asoka 亦直譯阿輸迦王或阿育王）所建，我非考古家，對此石柱的年代不敢妄加推測。惟在法顯與玄奘的記載裏，談到佛教的遺蹟甚多，玄奘甚至提及無憂王所建的窣堵波及精舍，而獨未說石柱。因而吾人對此自亦不能無疑。

塔外院落雖不能謂小，但只存基址，並無牆垣，顯然是曾經過一番刼火，現在的遺蹟，均係從地下發掘出來的。碎瓦頹垣，荒涼滿目。一切景象，僅在供遊人以想像當年盛況以及憑弔的資料。玄奘對於這個地方的描寫說：『周垣壘甎，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華，連陰接影。細沙異草，彌漫綠被。』那裏是荒涼殘破像目前的樣子！

到窣堵波前，脫鞋入內。正面是釋迦佛像，左手平置膝上，右手指地，據說在昔日如來將證佛果時，妖魔要來纏繞，地神便先來告佛。如來說：『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便問有誰作證。佛便垂手指地說這裏便有證人，於是第二地神便自地下踊出作證。這個姿式的佛像，在其它地方也常見到，殆全係紀念佛在證正覺前這一段故事。入門後，向司閽人購買了一盤鮮花，獻上佛座。我雖非佛教信徒，亦不能作任何宗教的信徒，但對於我佛如來所倡導的那種『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以及十二因緣觀等哲理，比較起其它宗教的淺薄武斷及無識，終覺其值得景仰。瞻拜既畢，循階登塔。在大塔壁上有一平台，四周各有小塔，每小塔內有一佛像，或坐或立，均頗莊嚴偉麗。大塔高約三百餘英尺，以磚石疊成，不能攀登。

出塔以後，轉至塔後，那株最著名的菩提樹就在這裏。在法顯來時，這株樹據謂高減十丈。百餘年後玄奘來時，菩提樹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樹出石壁上二丈餘，合計亦不足五丈而已。現在這株菩提樹相當繁茂，枝幹凌霄，交柯蔽日，高度總在六丈左右。下面有一石砌平臺，象徵佛成道時的金剛座。台前樹下有一平石，上有二足印，長一尺數寸，寬有六七寸。謂係佛於成道後起立時所踏足印。此石前無記載，顯係贋物。此地僧人競以菩提樹葉贈送遊人及香客。有的係自樹顛所採青葉，有的係加以一番淘洗，去其葉綠素，只留脈絡，更易於保存永久。我也獲得數枚，將來用以贈送國內對佛教具有興趣的朋友。

塔後左右，全係屋宇基址，而從前的建築則蕩然無存。據玄奘謂『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矣！』言下不勝感慨。現在印度的佛法既已消滅六七百年之久，這兩尊菩薩像當然早已沒身不見。印度人創造了具有世界性的佛教，印度人却偏不相信，而在固執地維持婆羅門主義與種性或品級制度。正如猶太人創造了基督教，而猶太人却偏不相信，而堅持他們的種族偏狹主義的猶太教一樣。返觀印度的數千年歷史，在佛教盛時（例如無憂王與戒日王時代），全印幾乎統一。後來回教也曾統一全印。只有在婆羅門教興盛時期，始終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面。這裏面的道理，頗值得我們來尋釋與推敲。

婆羅門教與品級制度，最初是建立在戰勝與征服者之間，這一點似乎絕無疑問。所以品級（Caste）這一名詞最先稱爲 varna，係顏色的意思。婆羅門這一個社會階層，相當於人類學上的所謂 shaman，亦卽等於中國的士大夫。與中國不同的，婆羅門的權威完全建立在吠陀經典與祭祀上面，他們不知武事，也絕對不事生產，因而他們的地位就變得極不穩固。得意時，固然可以致君澤民，但一朝失意，便只好沿門託缽，乞討爲生。他們把耕種安排給吠舍品級，因而他們便完全沒有退路。經典知識固係他們的專利品，也是他們的生命線。釋迦佛的地位與作用，與我們的孔子有些相像，就是想把知識從婆羅門手中解放到一般平民中來。孔子的工作在後來大部份成功了，然而釋迦

佛却因遭受婆羅門的極力反對與攻擊，幾個世紀以後便完全失敗。其中原故之一，孔子是沒落的貴族，而釋迦却並不是婆羅門種姓，這等於以剎帝利品級的地位向婆羅門革命。釋迦的衆生平等一說，顯然便係最犀利的一種武器。

雖然如此，但佛教倘如當作一種社會思想來加以權衡的話，則其不能指導生活與安排制度，恐怕還是更重要的失敗的原因。佛教對於哲理，固然講得精湛透澈，但對於人生，似乎並不是面對生活而係背向生活。為佛所倡導的修行方法以及所希冀達到的涅槃境界，無論如何崇高，如何快樂，但在尚未能達到這個境界之前，便先得脫離生產，從事乞食。這樣，便等於在生計上面先失去了進退的根據。在社會上，既然不能每個人都信奉佛教以致全部生產停頓，因而就必然得分出僧俗兩種不同階層。僧人得依靠俗人的供養，俗人依靠僧人的指導。這樣一來，便和婆羅門教的區別即使還有也就極其有限了。佛教的終於為婆羅門教所吸收所消化的，這個理由，我以為應該列在首要的地位。

在印度，頗有不少人相信（包括大學校的學生在內），中國本身並未創造出任何文化，所謂中國文化，不過是和錫蘭、緬甸、泰國、安南一樣，全係佛教，都是從印度學習去的。這種看法，可謂完全不瞭解中國的歷史。佛教對於中國六朝以後的思想與學術的影響，固屬無可諱言。但是不要忘記，佛教對中國發生影響時代，也正是佛教的中國化時代。中國的最後吸收並消化了佛教，變成宋明的理學，正如印度婆羅門教並無二致。印度人把每個中國人當做佛教徒，就和加城的印人把每個華人都當做鞋匠一樣。都是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的。

一個人站在菩提樹下胡思亂想了一陣。這時有幾個中國僧人前來招呼，便和他們寒暄了一番。稍加問詢，纔知菩提場這裏有四位和尚一位尼姑。隨着他們去看了一下緬甸伽藍，印度比拉先生所建的大塔，西藏僧房。正在菩提場的後面，隔着一塊稻田，釋永虔所募建中華大覺寺，正在鳩工建築之中，永虔謂：現因經濟困難，只能建一間廟寺四間僧房，將來預備在後面再建築一座中國式的七級高塔，供奉觀音云云。物質建築，係國際觀瞻所繫，固不能謂全不重要；可是中國僧人的在此活動，尤須注意。法顯記載菩提場的僧人說：『戒律嚴峻，威儀坐起入衆之法，佛在世時僧衆所行，以迄於今。』現在雖佛法蕩然無存，但菩提場終係佛教最重要的四大聖地之一，各國佛教徒的朝拜與瞻仰的處所。而我們這幾位僧尼，在稍事談論之後，覺得他們對於盧比，比較研究佛法與朝拜聖跡，更有興趣。根據法顯與玄奘所記，菩提附近聖跡無慮數十處，他們一概不知。例如佛苦行六年處，佛入浴天按樹枝得攀出池處，佛受乳糜處，四天王奉鉢處等等，他們隨便推說在河彼岸幾里處。其實全在附近。足徵他們並未曾加以尋訪或朝拜，或許即茫然不知。阿彌陀佛！假如在我們的心裏還存有法顯玄奘與義淨諸大法師的影像，然後再來和這些僧尼接談，恐怕把我們的五內臟腑都要一齊嘔吐出來了。

關於玄奘所記遺跡中，只有南門外的大華池尚在。據謂係婆羅門兄弟所鑿。池中有少許荷花，並不繁茂。所謂『清瀾澄鏡，魚龍潛宅，』却早已不能想像。實際上不過一池污水而已。印度人的來此拜佛的，都急忙解衣跳下水去，在濁水內洗滌一番，希望能洗去身上的罪垢。印度人的拜佛，還是依照印度教的觀念。

自此南行約百餘里，便至屈屈吒播陀山，即雞足山也。那是佛弟子以戒行著名的大迦葉入涅槃的地方。法顯曾謂：『劈山下入，入處不容人。下入極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山既荒涼，又復遼遠，無法前往。在我們的雲南洱海之旁亦有一雞足山，並傳說亦有大迦葉遺跡，可見完全係抄襲印度，再加以穿鑿附會，用以吸引香客。

轉眼之間，日已過午。飢腸萬轉，不容再留。遂登上原車，返回伽耶車站。在歸途中，依然又逢到那些羸餒的農村與貧苦的兒童，想到佛在證道時的新環境與新文化，假如釋迦生在目前，恐怕也要到其它地方去證道了吧？！望着尼連禪河兩岸的滾滾黃沙，使人發生無限的今昔之感！

洪亮吉評傳

丁蘊琴

少漸慈訓　長乃薄游　契心五嶽　涉足八州
所資聞見，冀寡悔尤　暨乎通籍　登覽殆周
盤盤經史　復預校讐　庶幾一得　參乎九流
——卷施閣文集自敘

一　引言

亮吉詩文有奇氣，早歲與黃仲則齊名江左，人稱洪黃。兩人居同里，少同學，長同游，又同好爲詩，同爲當時名公鉅卿所激賞。仲則以津門召試二等，入貲爲丞，爲債家所迫，抱病出郡，卒於運城，蓋未嘗展其抱負。亮吉官京師時，因言事譴戍邊遠，龍沙萬里，憂患備嘗，雖百日賜環，而未竟其用，是所遭遇亦略同。仲則遊蹤周徧，行狀稱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亮吉放歸後，寄情山水，足跡所至，徧覽名山大川，益肆力於經史及詩古文辭，所傳北江文集，殆與仲則之兩當軒集，並垂不朽。予曩作仲則評傳（載東方雜誌三十四卷十四號），今復據亮吉年譜暨詩文集等，草成斯篇，以見兩賢皆天才亮特，好古樂道，在學術方面，貢獻良多；而亮吉於仲則之喪，經卹周至，歸櫬於其家，世有巨卿之目。高義之風，尤足矜式。

二　亮吉之傭書與從政

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江蘇陽湖人。乾隆十一年生（一七四六）。少孤，奉慈母之教，自力於學。十歲始就外傳，十三歲學作詩，二十歲卽在外家授徒，並與里中諸名宿共結詩社，所賦中秋減字木蘭花詞十首，同輩傳鈔殆遍，劉宸贈詩云：『才子清眠起夜分，新詞字字鏤香雲。何當共握琉璃管，寫盡羊欣白練裙。』邵齊燾主講常州龍城書院時，亮吉與仲則均從受業，齊燾譽之爲二俊。二十四歲應童子試，補陽湖縣學附生，以館穀不足養親，遂至安徽太平府，謁朱筠學使，學使久器亮吉，乃專使相延入幕。時仲則已先在署，學使嘗作書致錢大昕、程晉芳輩，謂甫到江南，卽得洪黃二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

四庫館既開，江浙搜采遺書。安徽省設局太平，聘亮吉總司其事。旋改就句容林光照大令之聘，館於其家。凡客句容三月，一時知名之士，咸慕與交游，文讌殆無虛日。越兩歲，亮吉奉弟北上，任四庫館謄校事。值乾隆南巡，諸臣例獻賦頌，亮吉爲梁國治尚書擬頌十八章，首邀獎賚，於是都下屬稿者甚衆。亮吉亦精力過人，日間校書，夜則製進呈册頁，每至三鼓方休，有傭書七律一首：

傭書生計尚淹留，並疊吟懷事校讐。獨鶴見人殊惘惘，饑烏得樹亦啾啾。雲和草色荒三徑，月與花光豔一樓。却厭軟紅塵裏送，放教愁坐轉忘愁。

翌年，應陝西巡撫畢沅之招遊秦。沅聞亮吉至，倒屣以迎，延入節署。簿書之暇，卽分韻賦詩，常至丙夜。及沅擢督兩湖，趣亮吉偕行，名流如章學誠、汪中、方正澍等，亦先後到署，談燕之雅，不減關中。

乾隆五十五年，亮吉再度入都，應禮部會試。榜發獲雋，授職翰林院編修。會開館校刊石經，令亮吉參預其事，兼詳覆官，故得以薈萃漢唐宋諸石經異同，釐正字體。未及半載，卽奉視學貴州之命。向例，未散館翰林，無爲學政者，有之，自亮吉及其同年石韞玉始，蓋異數也。

亮吉在貴州任較久，評隲試卷，積弊悉除。又歷試諸府，拔其尤者，送入貴陽書院肄業。一歲捐廉俸數百金，助諸生膏火。其在省日，每月必自課士，令高等諸生進署，講貫詩文，娓娓不倦，款以飲饌，獎之銀兩，由是黔中人士，皆知勵學好古。兩年間，書院諸生中式者，多至五十餘人。

貴陽任滿後，亮吉復返都門，散館一等，歷充咸安宮總裁，及教習庶吉士，並掌進擬文字，因得閱翰九朝日歷，周知掌故。嘉慶五年，以言事獲罪，遣戍伊犂，萬里荷戈，艱辛何極。幸不久得赦，賈入玉門。統計居伊犂，僅及百日。亮吉有『萬里荷戈集』及『百日賜環集』感事詩，各選一首：

暫離三木即身輕，忽綴元戎後隊行。天上玉堂虛想像，道邊金甲尙縱橫。預知前路應長往，從此餘年號更生。穩臥側輪車畔好，鼾聲幾夕夢難成(八月二十七日請室中始聞遣戍之命出獄紀恩)。

廣翻作逐臣，一世未賜環。縱有骨肉親，不敢期生還。聖恩直與天地參，投畀有北仍歸旆。鵂鶹怪啼魍魅笑，此客入關眞再造（庚申又四月二十七日特奉恩命釋回）。

又孫星衍、莊炘、陶煥悅等，均贈以詩：

秉燭論心已有期，尊前霜鬢認依稀。我傷駒隙三年速，君自龍沙萬里歸。折檻風流成盛節，埋輪心事有危機。不知此後方元白，可仗文章定是非（孫詩）。

璽書由來宥直臣，投荒旋見作歸人。重逢隴首飛黃葉，此去江南采白蘋。飲酒無多消歲序，吟詩何益費精神。扁舟我亦如張翰，相訪滄東月色新(莊詩)。

積水潭邊荷滿池，秋藤花下酒盈卮。京華春好詩中記，塞外風寒別後思。蘇軾愛君青史載，朱雲折角聖人知。望公豐采還如舊，萬里行歸鬢未絲(陶詩)。

亮吉自塞外歸，尤喜導揚後進，每有異才，必加獎許，其尤邀心賞者，至折輩行相交，請賚文字，纍纍常盈几案。至如羽士緇流，索工吟咏者，亦欲得一言以爲幸。歸休後著述甚勤，於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卒於里中，年六十有四。

三　亮吉之地學與詞章

(一)輿地著作

亮吉傭書食力之外，輒鍵戶誦述，研精覃思，於經深春秋，所著有春秋三傳古義，左傳詁二書，及春秋十論，於六書通諧聲，所著有漢魏音四卷，六書轉注錄八卷。尤精輿地之學，著有三國、東晉、十六國疆域三志若干卷，貴州水道考三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以及淳化、長武、澄城、涇縣、固始、登封等縣志，寧國府志，刊史記以下四史謬誤十二卷，又以宋李繼遷傳國逾百年，而事蹟闕略，復成西夏國志十六卷。

三國疆域志之裒輯，大致依據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志，樂史之太平寰宇記諸書，其體例略仿宋書州郡志，而於扼要之地，爭鬬之區可考者，則參用郡國志例，附見諸郡縣下。郡縣之廢而復置者，先後類從晉志，要皆有補原書，而不汨其實。東晉疆域志，據其自序稱，取材以晉書紀傳爲主，並詳求沈約之宋書，輔以魏收之地形志，及酈元、李吉甫、樂史、祝穆等之所撰，旁搜雜錄，間采方書，歷時兩載始成，對於山川邑里，臺殿園林等等，均條分縷析，悉著於編。十六國疆域志，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其附書山川宮闕，一如東晉志之例。上述三志，成於乾隆四十五至五十一年，迄嘉慶三年，始全部刊竣，於舊說之謬誤者，訂正不少。

貴州水道考，係亮吉視學貴州時所作，自序云：『夫貴州諸巨川，其旁皆高山峻嶺，非若東南之水可隨時易其故道。余以壬子冬，奉命視學此方，軺車所至，類皆沿流溯源，證以昔聞，加之目驗，既不信今，亦不泥古。兩年於茲，撰成貴州水道考三卷：以由湖南入江者爲卷首，由四川入江者次之，由廣西至廣東入海者又次之，各冠以表，庶後爲方志者，有所考鏡。』外此所修撰之府州縣各志，靡不博

考分疏，精到掰實，所謂『凡志方隅，必推今昔，稽乎古圖，準以今尺』是也。

(二)駢文與詩歌

亮吉工於駢體文，卓然名家，其文於綺藻豐縟之中，存宕逸清健之致。所爲雜文數百篇，多用偶語，音節遒亮，意味深長，擅漢魏六朝之勝。胎息旣深，神采自王，所以高標一代。吳穀人駢體文綺編墓表，載亮吉作品較多，錢文敏至稱之爲『昌黎復生』。袁隨園序亮吉文集云：『君善於漢魏六朝之文，每一篇出，世爭傳之。玆友人爲刊其乙集四卷，以予素嗜其文，請序於予。予前嘗欲錄亡友邵編修荀慈，胡徵君稚威，暨君數人之作，合爲一集，忽忽未暇也。今玉芝堂集及君此刻，並以刊成，老懷藉以稍慰，至其文之淵雅，氣質之深厚，世皆能知之，予不贅述。』玆錄其出關與畢侍郎牋一首，以見一斑：

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淩厲。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衖，塗危入棧。原林黯慘，疑披谷口之霧；衢歌哀怨，恍聆山陽之笛。日在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殯於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吟案，則阿嬭之遺牋尙存；披其繐帷，則城東之小史旣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藉，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鷙鳥將亡，冀留勁羽，遺棄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者焉。伏念明公生則爲營薄宦，死則爲恤衰親，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魂，感恩而西顧；返洛之旐，銜酸而東指。又況䩄生竟天，尙有故人；元伯雖亡，不無死友。他日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玆來祺，亦盛事也。……

亮吉詩風骨高騫，縱橫排奡，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其學綜貫百家，故能獨闢一境。袁隨園謂亮吉詩有奇氣，逢人輒誦之。蔣士銓贈亮吉詩云：『鐵崖樂府容齋筆，萬口爭傳洪亮吉。……新詩光怪森寒芒，萬鈞入手能挽強，月斧雲斤鏤肝腎，出入韓杜爭軒昂。』又伍崇曜跋北江詩話稱：『亮吉爲詩，涉筆有奇氣，精思獨造，遠出恆情，仿康樂，仿杜陵，仿太白，仿楊誠齋，然實嘔心鏤腎，總不欲襲前人牙慧。迨荷戈萬里，奇氣噴薄而出，益如天馬行空，不可羈靮。賜環後，枕葄墳典，嘗領湖山，當時詞人，咸推祭酒，嘗見其小印作「曠代逸才」四字，亦惟先生不愧此言。』亮吉賦有論詩絕句，凡所述及，多爲清初以迄乾隆年間詩家，雖有未玉微詞，然俱精確不磨，略舉數首：

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論力齊。山上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謂吳梅村，爲江左三家之一。)

鴛尾山人絕世姿，聆音先已辨妍媸。何應一代才名盛，只辦唐臨晉帖詩(謂王漁洋)。

只辦人間時世粧，名姝未稱古衣裳(査愼行)。不凡作事惟龍子，拍手先驚尉律光(陳維崧)。

晚宗北宋幼初唐，不及詞名獨擅場。辛苦謝家雙燕子，一生何事傍門牆(朱彝尊)。

遊戲詩應歸苦海，性靈句實迫香山(袁隨園)。同時老輩猶難及，只許錢程伯仲間(錢載程晉芳)。

至其評古人詩文，亦有獨到之見，如北江詩話曰：『詩文之可傳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曰格。詩文之以至性流露者，自六經四始而外，代殊不乏，其情之纏綿悱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樂，則三百篇及楚騷等，皆無不然。詩文之有眞氣者，秦漢以降，孔北海、劉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韓高岑諸人，其尤著也。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莊漆園、陶彭澤之作，可云有天趣者矣。元道州、韋蘇州，其次也。東方朔之客難，枚叔之七發，以及阮籍詠懷，郭璞遊仙，可云有生趣者矣。頭責之文，儻約之作，以及鮑明遠、江文通之涉筆，可云有別趣者矣。至詩文講格

律，已入下乘，然一代必有數人，如王粦之摹大誥，蘇綽之仿尙書，明李空同輩，一字一句，必規倣漢魏三唐，此與蘇綽等何以異。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簡之詩，亦不免此病。」誠爲不刊之論。

坊本北江全集，採輯甚爲詳贍，包括：(1)卷施閣文十八卷，(2)卷施閣詩二十卷，(3)附鮚軒詩八卷，(4)更生齋文八卷，(5)更生齋詩八卷，(6)更生齋詩餘二卷，(7)擬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內中以詩歌爲最多，計逾四千首，復析爲天台雁蕩集，黃山白嶽集等多種，表列於後：

分集名稱	寫作時期	古今體詩首數
附鮚軒詩		
機聲鐙影集	亮吉十三至二十歲作（一七五八——一七六五）	一〇一首
采石敬亭集	二十四至二十七歲作（一七六九——一七七二）	八九首
黃山白嶽集	二十七、二十八歲作（一七七二——一七七三）	五三首
長淮清潁集	同上	四一首
桐廬林壑集	二十八、二十九歲作（一七七三——一七七四）	五九首
鐙事蜀岡集	三十歲作（一七七五）	八五首
茅峯鍾山集	三十、三十一歲作（一七七五——一七七六）	八二首
天台雁蕩集	三十一歲作（一七七六）	六二首
卷施閣詩		
借書東觀集	三十二至三十五歲作（一七七七——一七八〇）	九二首
壓轍西行集	三十六、三十七歲作（一七八一——一七八二）	五四首
仙館聯吟集	三十六、三十八歲作（一七八一——一七八三）	七八首
官閣圍爐集	三十七歲作（一七八二）	三三首
太華凌門集	三十七、三十八歲作（一七八二——一七八三）	三八首
中條太行集	三十八、三十九歲作（一七八三——一七八四）	八二首
嵩山少室集	四十、四十三歲作（一七八五——一七八八）	一二一首
靈巖天竺集	四十一至四十四歲作（一七八六——一七八九）	一〇三首
西苑視旅集	四十五、四十六歲作（一七九〇——一七九一）	七九首
祕閣研經集	四十六歲作（一七九一）	八二首
五陵驂騑集	四十六、四十七歲作（一七九一——一七九二）	五三首
黔中持節集	四十七至四十九歲作（一七九二——一七九四）	三六八首
關嶺衝寒集	四十九、五十歲作（一七九四——一七九五）	九〇首
蓮塞消暑集	五十歲作（一七九五）	八〇首
冏寺百塼集	五十、五十一歲作（一七九五——一七九六）	一一三首
詩學三天集	五十二歲作（一七九七）	一四八首
全家南下集	五十三歲作（一七九八）	一一八首
單車北上集	五十四歲作（一七九九）	一四四首
更生齋詩		
萬里荷戈集	五十四、五十五歲作（一七九九——一八〇〇）	一四〇首
百日賜環集	五十五歲作（一八〇〇）	一九二首
山椒避暑集	本集至下列五集均爲五十六至六十三歲作（一八〇一——一八〇八）	本集及下列五集共得詩二一七七首
濯濯消寒集		
詹嶺授經集		
藝河偶逝集		
西園泉泉集		
北郊儼閣集		

觀上表列舉分集名稱，可知每集代表一時期，其劃分係以寫作時之所經歷或所在境地爲準，故間有同一年內之作，而分入於兩集者。（表中所記寫作時期，根據年譜。）

關於附鮚軒及卷施閣之命名，張遠覽有詳明之解釋；『學使北江先生少孤，其克自樹立，及學之有成，實稟賢母蔣太夫人之教，故其編詩也，以及侍太夫人所作者，爲附鮚軒詩八卷。漢書地理志：會稽鄞縣，有鮚埼亭。南越志：巢鮚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鮚取食，郭璞江賦所謂璅蛣腹蟹是也。先生十歲始就外傅，二十卽出授徒，負米所至，皆不越五百里外，一歲必兩歸，以慰太夫人，與莢蟹之早出暮入相類。及奉太夫人諱，讀禮於閭門者二年，繼又饑驅四方十年，乃獲升上第。官禁林逾一歲，卽持節視學黔中，人欣先生之遇，而不知先生以祿不逮養，每與人言之，輒泣下不止。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先生之名集，蓋以此乎。』（見卷施閣文集張序）

亮吉少喜填詞，中年後亦時時作之，其詞精思妙緒，宛轉環生，得深美閎約之指，有機聲鐙影詞及冰天雪窖詞二卷。至所爲樂府，則宗尙鐵崖，獨晢審音，獨彈古調，撰有擬兩晉南北史樂府一百二十首，屠紳跋謂：『洪君對嚴，才不患多，書能求間，以譚天之口，成擲地之聲。……事或未經人道，言無不獲我心。晉啓化龍，陳亡擒虎，三百年王氣將終；甥承冒頓，舅代宇文，十六國人情可見。易程畦而高如白雪，裁織史則穆若淸風，蓋筆有爐錘，胸無芥蔕矣。』

四　亮吉之遊歷

亮吉性雅好游，嘗登五嶽，涉四瀆，歷燕秦，入黔中，更遠度天山，長歌絕塞。中州金石記後序云：『亮吉於金石之學，素寡究心，而輿地之嗜，幾於成癖。……繼又周覽大河，縱觀崇嶽，南遊乎汝穎，北極於殷魏。……』誠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其年家子陸伯才曾爲繪製平生遊歷圖十八幀，前八幀爲南樓課讀圖，北屋泛槎圖，山墅訪秋圖，雲溪議月圖，黃山雲海圖，赤城煙月圖，湖風破浪圖，江綖甥潮圖，路寫亮吉游覽黃山、洞庭、天台、雁蕩諸處之勝迹；後八幀爲蓮峯日出圖，岱宗雪霽圖，雲呈五色圖，日麗三天圖，蕭寺哭臨圖，圜扉待訊圖，開廳學圃圖，黃港種梅圖，寫亮吉旅居秦晉，供職京師，與夫馳驅邊疆時之所涉歷。內中蕭寺哭臨圖，係記仲則客死安邑，亮吉奔赴展殯事。亮吉於每圖後各繫以贊，並詳敘本末。赤城煙月圖贊云；

日不赤，山乃赤，曦輪著山淡有色，我今得遊眞定識。同人攜手我獨前，瀑布千丈懸山巔，快覽人世方升天。自朝兮及夕，月初升兮日輪昃，金庭不死兮，我豈爲所惑。我之嗜山兮，若飢者之食。雁蕩欲遊兮，除用此策。

蓮峯日出圖贊云：

平生耽奇，借之天上梯，欲陟落雁，身與北斗齊。三更乍交，天海頓赤，滄溟洶洶，如釜底上突。穹靑竟蹙，地脈遽縮，千奇萬怪，炫此心目。巨響出海，紅輪礙天，杳杳冥冥，一世尙眠。

藏此可當臥遊。致仕後，嘯傲風月，歷訪江浙名勝，如西湖泛舟，鄧尉看梅，焦山避暑，秣陵訪秋，登山臨水，逸興遄飛，嘗言：『虎邱泛舟，以朱翠炫目勝；秦淮泛舟，以絲竹沸耳勝；平山堂泛舟，以園林池館稱心勝。若西子湖、鑒湖，則以上三者，春秋佳日，時時有之。又加以山水清華，洞壑奇妙，風雲變化，煙雨迷離，覺可以悅心志娛耳目者，無逾此也。外若鴛鴦湖之百重楊柳，消夏灣之十里芙渠，柳色花光，亦其次也。』不禁令人神往。

五　亮吉與黃仲則孫星衍之酬倡

亮吉二十一歲赴江陰就童子試時，遇仲則於逆旅中。亮吉攜其母所授漢魏樂府鋟本，暇輒朱墨其上，間有擬作，仲則見而好之，約共效其體，日數篇，遂訂交焉。亮吉與孫星衍亦爲同里，其後沈研經史，與星衍論學相長，人又稱孫洪。星衍延陵話舊詩云：『翰林仙人（謂亮吉）狂欲絕，自把孫洪比元白。五雲同看御園花，萬里獨踏天山雪。』北江集中，與仲則、星衍之倡酬最多，或爲同遊之作，或爲

投贈之篇，特分別選錄，附載仲則、星衍作品，以供省覽。

送黃景仁至都門

弱冠心期暫始終，故人江夏有黃童。數行書札來春半，一夕舟檣出雨中。雀鼠幾時仍共穴，馬牛誰信不同風。應憐楚越依郁徧，更向燕臺試轉蓬。

附仲則將至都門留別洪大詩一首

翮與歸鴻共北征，登山臨水黯愁生。江南草長鶯飛日，遊子辭鄉去友情。五夜壯心悲伏櫪，百年左計負躬耕。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

讀黃二綺懷詩漫和

小閣珠簾動影紋，別離消息悵初聞。徒教小玉燒心字，枉乞麻姑署手文。籠袖紙燈行怯怯，牽衣花刺觸紛紛。兒家一片橫塘水，只到門前派已分。

附仲則綺懷原詩之一

中人蘭氣似微醺，薌澤還疑枕上聞。唾點著衣剛半指，齒痕切頸定三分。辛勤青鳥傳空語，佻巧鳴鳩浪策勳。為問舊時裙衩上，鴛鴦應是未離群。

自雨花岡北攜酒至臺上與孫大痛飲復憩永寧泉

岡北岡南路，蕭蕭雨踏晨。大都饒落木，不復有居人。寒意欲侵骨，酒香思入脣。明朝騎馬去，無分乞閒身。荒岡千百轉，知有永寧泉。屋底亂流響，原頭野火然。村童供茗具，行漈臥苔甎。到晚逢僧語，憐余未解禪。

附星衍同遊之作

寂寞荒臺路，狂眠共子來。居人驚腐骨，行客看甃杯。無復侵袍草，空生貼徑苔。客心懷舊迹，交手步千回。路轉知泉近，冷然漱玉琴。額榜方列坐，危徑更幽尋。露肘天風冷，鈎衣竹翠深。原顛莫招手，正爾作鸞音。

九月初三日雨後偕黃二孫大遊薦福寺

薦福寺中秋氣陰，寂寥一叢愜幽尋。唐餘舊碣苦文暗，僧老閒送竹樹深。金碧樓臺清磬響，青蒼巖谷暮鴉沉。眼中歷歷皆千古，留與詩人劫後吟。

點絳脣（次仲則韻）

尺五荒墳，小桃一樹傷心豔，寄將花片，沒個人兒便。芳草多情，引他歸騎尋教遍，模糊見，月殘如線，霧隱傷春面。

附仲則原則

細草空林，絲絲冷雨撩風片，瘦小孤魂，伴個人兒便。寂寞泉臺，今夜呼君遍，朦朧見，鬼燈一線，露出桃花面。

六　結論

亮吉美才碩學，著撰等身，平生所為詩文，多至五千首，其他經史註疏，說文地理之作，亦不下三十種，洵為盤盤大手筆。袁隨園謂：『予幼讀荀卿子修身篇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出入不遠矣。……洪君吾不能諒其所至，庶幾可謂無暇日者矣。』其淬厲奮發篤學不倦之精神，斷非常人所能及，是以有偉大之成就。晚年戒子書有云：『……余早承先訓，門有素風，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壘遭家難，飽識世情，忍饑讀書，先大夫之遺語也。……今雖聞雞而起，尚擬著書；秉燭以遊，仍書細字。自念生雖無似，然不見屏於里閭，不見譏於長者，蹤跡徧於九州，姓字鐫於五嶽，官不達而齒胄以之為師，祿不加而問字豐其所贄，詩文至五千首，撰述至三十種，門生義故百人，著錄弟子三百，窮老盡氣，韜精斂魂，終此天年，從親地下，以此貽女，不亦多乎！……』又曹景先贈詩云：『平生學業尙淹通，解詁居然並馬融，聚米圖知評地域，生花筆更奪天工。萬言削牘人爭誦，五字堅城客敢攻。文苑儒林兼獨行，問誰能繼此宗風。』其志行氣節，可以概見。

商務印書館

初版新書

滬渝新書　每週出版　收復區內　上海供應

三十四年十月至十二月新書列下

蔣介石先生抗戰建國名言鈔　陳穎華輯　定價一元
新人生觀……羅家倫著　定價一元四角
做人做事及其他……王雲五講　定價一元二角
新原道（一名中國哲學之精神）　馮友蘭著　定價二元二角
英國人之生活與思想　與文訥著 王學哲譯（上）（下）定價三元二角 三元
Owen: British Life and Thought
中國的前途……孫科著　定價三元
三民主義新中國　孫科著　定價三元
中國國民黨史略　鄒魯著　定價四元一角
憲政要義……孫科著　定價二元
比較地方自治論……呂復著　定價四元
縣地方財政……彭雨新著　定價三元七角
刑法總則……趙琛編著　定價六元二角
如何控制戰後德日……蒲耀瓊譯　定價一元四角
Moulton and Marlio: Control of Germany and Japan
革命逸史（初集）……馮自由著　定價四元
朝鮮革命紀……葛赤峯著　定價一元四角
復興叢書 體育概論……王學政著　定價四元七角
復興叢書 軍事與國防……楊杰著　定價二元七角
第二次增訂本 王雲五小辭典　道林紙印 王雲五著　硬紙面精裝 定價六元
英文成語例解……鮑歷平著　定價六元八角
Bau: Correct Uses of Some Common Idioms

英漢軍用語詞典……田世英編　定價四元八角
S. Y. Tien: A Glossary of English-Chinese Military Terms
科學思想概論……何光淸著　定價四元五角
工商組織與管理　楊端六著　定價五元四角
工商管理一瞥……王雲五著　定價一元
蘇聯工農業管理　王雲五漢譯定價四元八角
G. Bienstock & Others: Management in Russia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土壤之冲刷與控制（國立編譯館出版）　張含英編譯 定價十二元
訪英日記……王雲五著　定價二元二角
英文訪英日記（學生版）…王雲五著　定價二元六角
Y. W. Wang: My British Diary
啼笑皆非……林語堂著譯　定價三元四角
民族正氣（五幕歷史劇）…趙循伯著　定價一元八角
野玫瑰（四幕劇）……陳銓著　定價一元四角
黃鶴樓（五幕劇）……陳銓著　定價一元四角
中華民族抗戰史……陳安仁著　定價二元四角
復興叢書 清代史（原名清史大綱）…蕭一山著　定價四元五角
國父家世源流考……羅香林著　定價一元
臺灣……李絮非著　定價二元四角
戰時英國……王雲五著　定價三元
蘇聯概觀……塲木琦譯　定價一元四角
Dobb: U. S. S. R. Her Life and Her People
第二次世界大戰五年大事日記　石坤琳編譯　定價（上）三元五角（下）四元二角

上列各書均按定價四百倍發售，外埠另加郵運包紮費

東方雜誌第四十一卷 第二十號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重慶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上海再版

每册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郵費

不許轉載

主編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六〇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九〇七五號